

目 录

- 三年抗日游击活动的片断回忆……………杜海荣 (1)
- 一九三八年春傅军反攻归绥……………新书科 (11)
- 日寇侵占归绥罪行片断纪实……………倩 影 (22)
- 同仇敌忾 共赴国难……………吴素洁口述 周一鸣整理 (26)
- 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抗日活动二则……………杜海荣 (30)
- 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在归包地区的活动……………赵相璧 (37)
- 记归绥市小学教师大罢课……………**全慎修** (43)
- 名言学校保合少分校及其发展概况……………张秀娟 和希克 (51)
- 托县县立第一完小的建立与发展……………杨立中 (59)
- 教坛勤耕耘 正气育英才
——回忆宋志刚老师……………王钰 赵甫 王姪丽 (64)
- 八十五岁溯往事……………田圃口述 张尔杰撰文 (78)
- 著名蒙医萨拉布朋素格……………王希舜 (90)
- 塞外名旦任翠凤……………邓孝明 (96)
- 托县第一高小刘琳校长……………刘继志 (101)
- 著名武师王美……………代 林 (104)
- 郭长清其人其事……………张尔杰 (110)
- 席力图召及其属庙普会寺概况……………扎木苏 (125)
- 绥远教区圣母圣心婢女会初学院简介……………罗 楹 张振英 (129)

第八战区战地工作委员会与党政总队概况·····	新卫国	(135)
竞选“国大”代表的丑剧·····	<u>仝慎修</u>	(144)
鸦片在归绥·····	王再平	(149)
四九年种大烟给托县人民带来的危害和灾难·····	白满良	(165)
状告李麟兆·····	杨立中	(168)
平息祁祥叛乱·····	云 贵	(171)
黑兰圪力更村史录·····	孟 良	(173)
民间社火——皇杠·····	李振富	(178)

小资料

观音寺·····	(25)
羊岗子·····	(42)
旧城名水井·····	(109)
允和成毡坊·····	(170)

三年抗日游击活动的片断回忆

杜海荣

—

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于一九三八年秋，参加了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新编骑兵第五师，任骑兵连长，驻防在伊克昭盟准格尔旗。一九四〇年在甘肃省天水“中央陆军骑兵学校”带薪学习一年。毕业返部后，前后任该师二团及三团副团长。一九四三年国民党中央军委命令前方各部队，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挺进敌占区，开展游击活动。马占山将军不愿派其正式建制部队过河深入敌后，为了敷衍这项命令，遂委我为“东北挺进军游击支队”上校支队长，并由新编骑兵第五师中抽调一些兵力，连同从和林策反过来的一部分保安团队，七拼八凑，给我编成一个三百多人的支队。起初，支队部设在准格尔旗大营盘（原准旗王府所在地），不时派些小分队，夜间渡过黄河，去和林、托县一带进行游击活动，夺取敌伪各种组合，袭击敌伪的小据点，给敌伪造成了恐慌不安的局面，收到了袭扰敌占区的效果。迨至一九四四年夏，为了扩大游击战果，我受命率全支队将近四百人，从准格尔旗防地，夜渡黄河，经托县杨喜梁、黑城进入归绥境内，通过三两村一带敌伪严密的封锁线，星夜兼程挺进到察素齐以北大青山万家沟。这里是绥远自卫军第三路的活动区域。通过该路王占元团要秉权连的向导，与曾在达拉特旗会过一面的王有功司令会师于卧龙岗（此地

原名“一步难”，王有功驻此后，为了保密遂改名为卧龙岗）。

王有功对我率部进山，首先与他会师，备极欢迎。他认为东北挺进军的游击部队上山，可以壮其军威，扩大他的影响，对他有利。所以让我和他住在一起，处处优礼相待，日夜纵谈抗战形势，甚是投机。又因王的胞弟王继功和我有同学关系，更加亲近。我一上山，他们马上送我大烟板子五十两，作为犒赏我的部队之用。住了几天，我的四个中队（连），即分头下山，到土默川开展游击活动。因我支队初入敌占区，对敌伪情况不大了解，活动的地区及路线等都很生疏，为此起初分别与自卫军三路的部队密切配合开展游击活动。马占山将军的游击部队来了的消息一经传出，给了沿山川底敌伪据点以沉重的压力。尤其我在过河前，石印了大量的宣传品，各中队分别携带，所至酌情张贴和散发。马占山将军先声夺人的名望，对敌占区伪职人员起到了攻心的作用。

部队分别下山后，我身边只留一个卫士带一挺机枪。我和王有功住在一起，每天陪着他不是榻畔吞云吐雾，便在清泉石上放怀聊天。

正在我们每日快意地观赏青山景色的日子里，有一天，突然遭到了袭击。一股敌伪骑兵从“一步难”东北山口上向我们疯狂地袭来，一阵猛烈的炮火向司令部倾泻，霎时间，司令部乱成一团。我们仓促应战，眼看抵挡不住。这时王有功在惊慌失措中，施展出一个脱身的解数，让我带警卫刘勇上山，以机枪火力，阻击敌骑前进。他对我说：“你放心阻击敌骑，万一司令部撤退时，我一定先通知你！”我信以为真，便带刘勇上山，架起机枪，对准敌骑猛烈射击。顿时，敌骑停止前进，立即以猛烈的火力向我射击。王有功这位卧龙岗的先生，便乘敌人火力转向我的时候，把我撇下不管，悄悄向大南山溜之乎也了。我因受敌人火力压制，屡次变换射击位置，一则避免危险，二则使敌人误认山上的

机枪不只是一挺，就这样支撑了一段时间，敌骑虽被阻止，可我也没法离去，还在等着王有功的通知。有好长一阵听不到司令部向敌射击的枪声，我便令刘勇匍匐到能俯视司令部的位置察看动静，不料司令部早已撤退，空无一人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和刘勇边打边退，但总是脱不了身。就在这紧急关头，王占元（二德子）团长率卫士三人乘马飞奔前来，冒死营救我脱险。他不住地痛骂王有功陷友于险境的卑劣行径。我们六人交替掩护，好不容易翻过南面小山，向马化龙坝（据说这是马化龙造反的根据地，坝上还有山寨的痕迹）撤退。天黑后，我和王团长等人才爬上坝顶。此时，王有功已躺在坝顶搭成的临时窝铺里对着玲珑剔透的烟灯，正刺刺地抽着大烟。当他看到我们来了，觉得很不好意思，想开脱他遇难弃友的行径，但唇蠕动而嗫嚅，一时说不出话来。在这尴尬的场合下，王团长没等他开口，便拉着我说：“走吧，咱们也找个休息的地方去！”于是，我随王团长到灌木丛中搭成的露天窝铺中，同样点上烟灯，吃着王团长所带的烧干羊肉，然后疲惫不堪地很快便进入了梦乡。

翌日上午，侦悉敌骑已全部撤离卧龙岗，司令部的草庐茅屋被付之一炬，只留下几间靠崖土窑洞尚可存身。我觉得王有功这个人笑里藏刀，很难共处，便想找个机会离开他。

二

不久，挺进第五纵队司令鄂友三派他的贴心卫士阎宝祥，把我从三路接到马厂梁，脱离开王有功的防地。鄂友三在一九三七年我到南京参观时，正住军校炮标。鄂友三等绥远籍的同乡都去看望我们，见过一次面，促膝畅叙，甚是亲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听说我率部上山，便以大青山之王的权威，派人持函把我接到他那里去。

我虽是“东北挺进军游击支队”的名义，但与鄂会晤后亦

须纳入其指挥系统。鄂指定马厂梁为我部驻扎区域，在我的部队没有回山休整期间，让我暂时随他行动。在这期间，遭到了敌伪两次“围剿”。一次是在马化龙坝上，我们利用敌人白天行动，夜间龟缩到村落中的规律，前半夜分散在敌人周围小村吃饭休息，并准备明天上山的干粮。三更后，即上山隐藏，以防敌人拂晓搜剿。在分头上山时，互相以学猫头鹰呜呜叫的声音，作为彼此取得联络的暗号，分别到达预定的山峰密林中隐伏。因为敌人“围剿”的兵力和路线等，我们通过伪军内部已经买通的官兵的预先通风报信，事先就有个约略的了解，再加上根据地各村的工作人员，都扮成侍奉敌人的老乡，把敌人的兵力装备及其所探询的路线等情况，秘密派人送出来，所以我们掌握着行藏的主动权，能够腾挪躲闪，避开敌锋，巧妙地摆脱敌人。我记得第一次是根据情报，敌人翌日要从大沟（马化龙坝西）南进搜剿，我们便在三更后攀登到大沟东侧的马化龙坝顶，隐伏在丛莽中向沟底俯瞰。日出后，敌军浩浩荡荡以战斗行军的态势，边搜索边南进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一看便知是训练有素的正规敌伪军，前卫、本队、后卫、侧卫以及搜兵、联络兵等，队形有序。我对鄂说：“咱们是在雄伟的阅兵台上（马化龙坝），检阅敌军的战斗行军序列哩！”鄂说：“这是伪蒙古军第七师的部队。”

另一次是敌军分驻各村进行逐村搜剿，使我们昼夜不能入村食宿，只好隐伏在深山密林（山背到处是桦树林和灌木丛），等到夜间，利用平时暗藏在山沟里的炊具及给养，各找避光的山坳处所，埋锅造饭。白天恐炊烟暴露目标，只好拔些可吃的野菜，冷啃些备好的干粮充饥。好在大青山到处有清澈的泉水和潺潺的小溪，总不至于挨渴。这一次，我们是在六道坝山峦中度过的。紧张的气氛，淹没了艰苦的感受，人人所想的只有“敌我”二字，毫无其它想法。这次只听到过敌军不时发出稀疏的试探性的炮声，我们始终没还过一枪。敌人出发后的村落，往往是我们

进入食宿的处所。敌军走的是明显的道路，在明处；而我们钻山时不走路是从沟底水中走，不留行走的痕迹，是在暗中。所以敌伪只能落个望山兴叹，连我们一个人影都没找到，只得扫兴退走。

我的四个中队从川底回到马厂梁休整后，我又率部从马厂梁北下山，出敌意料地进到一个距伪军盘据的土城子据点不太远的小山村住宿。一天，扮成拾粪老乡的哨兵报告说：有一个伪军骑马带枪向村里来了。我判定他是土城子伪军派出来催要草料的，等他一进村口，就被我们的伏兵俘住，吓得这个伪军战战兢兢，脸色苍白。我按鄂的规定，对其好言安抚，酒饭招待，给他摆上大烟灯，让他放心地抽。在他哀求饶命中，我对他讲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抗战必胜的道理。最后，我送他五两大烟，原枪马发还，安然地把他送出村去。当时我部官兵，都垂涎地看着还给他的那支崭新的韩林春七九步枪和那匹滚瓜溜圆的枣骝战马，一个个噤着嘴，不同意我的做法。这个伪军安然回到土城子后，第二天就托他的亲信人悄悄地给我送出五条联宝香烟，并捎话给我：“有什么委办的事，只管说话好了。”至此，我的部属才明白这种做法的妙用了。这仅仅是个小例子，各部大都是这样做法。鄂严格规定：凡是零星敌伪人员，到根据地外围村落，催粮要草被我们所俘，必须好言安慰，破格招待，详为开导，枪马交还，赠送烟土，安全送走。这样被释放的敌伪人员，就会成为我们的顺风耳、千里眼。事实证明，这种自下而上的策反办法，的确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

一九四四年秋初，活动在萨县至包头一段以北山中的王炳儒部，因为兵力单薄，要求鄂友三派得力部队到他的游击活动区里协助他开展地方工作。鄂顺势便将我这个没有地盘的游击支队拨到王炳儒所活动的地区，协助王开展工作。并令我先到萨县附近与刘五老虎团会合，相机向西挺进与王炳儒接头，合力开展工作。

我率部由马厂梁下山，沿大青山麓西进到萨县附近北山底与刘团会合，（实际他只有八、九十人）先在沿山一带活动。有一天，我们和刘团在天黑后，进入距萨县城北十数里的北十轴村，刚吃过饭，即被从萨县出来的敌伪军包围了该村的东西南三面。接火后，我率王二虎连冲向东门，想率部突出东门然后向北山撤退。不料城门一开，就遭到敌人的密集火力阻击，来势凶猛。为了避免拥挤出门过多的伤亡，我便率部绕到北门附近令部队越城墙（土围子，墙并不高）而出，乘敌伪尚未合围之际，冲出村子转入北山上。敌人亦未敢逼近山麓。迨各连均撤到预定地点，检点部队没有伤亡，只是我因仓促突围，丢失了一匹坐骑。之后，我们就在陶思浩至水涧沟门之间的山区活动。夜间分头下山袭扰，弄给养，打组合。白天在山上埋锅造饭，充分休息。萨县城里的敌伪虽多次企图冲上山来吃掉我们，但因我们隐蔽在山上，敌伪暴露在开阔的平川，不等其接近山根，就被我们组织的排子枪密集火力击退。如斯纠缠了些时，敌伪亦不做吃掉我们的狂妄梦想了。根据实际情况的分析，我们暂时也难以西进与王炳儒部会合。其间经常与红坝圈王有功的部队联系，曾两次上红坝圈休整。

三

是年冬初，敌伪对大青山各游击部队，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围剿”。据说这次“围剿”所动用的日军，系从太平洋战场撤下来进行休整的正规战斗部队，在休整中负责彻底清剿大青山中日益发展壮大的各游击部队。他们采取“铁壁合围”、“篦梳战术”，企图一网打尽山中的各游击部队。敌人先封锁各个山口，隔断山上与川底的联系，然后以大部队进山在严密合围中，用纵横围梳的毒辣战术，妄图一劳永逸地把所有山中的游击部队梳歼殆尽。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长，用心之险，都是空前的。在这样严峻的处境中，我征得王有功的同意，率部与驻守红坝圈上的高富、魏忠

义、尹殿臣三位三路团的团长，缜密运筹，精心策划，凭险扼守在山势极其险要的红坝圈上，与敌军顽强拼搏。

红坝圈位于陶思浩村东北的山上，它是自卫军三路的一个极其险要的前沿根据地。坝上奇峰突兀，环列入云，部队就势在峰峦迥环的谷中，搭成窝铺驻扎。从前川上坝，只有一条曲折的羊肠小道，左右都是断崖绝壁，无路可通。右边的鱼头山峰高插云霄，上设瞭望哨，可以鸟瞰川底全貌。由上坝的小路攀沿到坝底是个深邃的山谷叫狼窝沟，从沟底再上坝顶，只有一处单人能缘过的咽喉险道，堪称是一夫把关、万将难过的石崖隘路。这个险要的根据地，原系自卫军五路战将张万瑞过河游击时发现和创建的，后被三路王有功用计占据。

我在得悉敌人要大举“围剿”的确息后，与坝上高、魏、尹三位团长研究决定，坚守红坝圈，顽强反“围剿”。加速进行反“围剿”准备工作，日夜不停。首先在登山小道上，布成疑阵，隔几十步在路中挖一坑，上覆生土，巧加伪装，告知送粮上山的乡亲们千万要躲开路中生土处行走，以免触地雷而殒命。我们又弄了一条牛，在薄暮时用集束手榴弹炸死在上山的小路上，扬言此牛系触雷而死。于是山下的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到伪军中去了。

敌人指挥官驻在陶思浩村指挥攻山战斗，他们以伪警察在前，靖安军次之，日军殿后跟进的战斗队形，浩浩荡荡地向红坝圈发起猛攻。由于山陡峰高，炮火不能仰射，飞机不能俯冲，只能令步兵攀登仰攻。打头的伪警察早有耳闻，怕触地雷（其实那只是疑阵）不敢走正路，附藤攀崖，一开始就摔死数人，锐气受挫。虽有日军在后督战，其效甚微。敌伪付出了不少的生命代价，才进到坝底的狼窝沟，再不能仰攀前进一步了。因为我们在咽喉隘路后侧，搭了一个上盖牛皮的宝帐，内驻一班狙击手，由一二人轮流把守只能通过一人的路口。敌人一露头，就被击毙而滚崖摔下

狼窝沟底碎骨粉身了。敌人虽以密集火力掩护，每天数次强行攀越，无奈打不到我们隐蔽在路口侧后的狙击手，每次猛扑，都以送死告终。敌人气得要发疯，不时向坝上乱行扫射，由于我们隐蔽良好，毫无损失。敌人停止进攻沉寂下来的时候，我们还以七六二远射程的步枪，用排子枪向远在后面督战的日军射击，鬼子马上隐蔽不敢随便露头了。

到了夜间，我们写些宣传品，裹在石子上扔下谷底，忠告那些龟缩在狼窝沟底的伪警察们说：“我们有的是手榴弹，可是不忍心往下扔，中国人不打中国人，难道你们甘心为日寇当头阵送死吗？”这样更动摇了打前锋的伪警们的战斗意志。就这样胶着对峙，时打时停，整整围攻了二十多天，敌伪也没攻上坝来。可我们也下不了山，给养断绝，危殆日甚，大家一筹莫展。最后连平时吃剩的兽皮，亦燎去毛煮着吃光了。眼看没有办法，敌人纵然攻不上来，如果再围攻下去，我们就得饿死。在这种饥肠辘辘，严阵对敌的情况下，我征得各团长的同意，提出让魏团长（陶思浩附近小巴拉盖村的人，他所带的士兵，多半也是附近的人，其中有上山砍过柴的，有打过猎的）选派一个能穿林越涧攀登下山的本地人，给陶思浩村伪乡长乔某（平时和山上就有联系）送一封信，让他设法转告日军指挥官，信的内容大意是如果敌人延长围困的时间，我们就要破坏绥包段的铁路，使它几个月不能通车，我们山上有的是四号甲雷（其实一个也没有，我不过在骑兵学校学过它）。这封信送下去后，敌人果然很快撤退了攻山部队，也不知道是信起了作用，还是敌军疲竭就要撤退的巧合。不管怎的，我们总算解除了饿死在坝上的危险。

四

时进隆冬，天降大雪，我的部队还没换上棉衣，吃穿无着，困难万分，而且弹药薪饷，均待解决。因此，在高富团长率部返

河西探家时，我亦率部相随星夜兼程越过黄河，到达郭青云部的防地达拉特旗。慕新亚师长立即派员到达旗让我率部返回准旗防地，进行休整补充。

一九四五年春，我先让部队渡过黄河，进至铁帽一带活动。我通过副师长刘盛五的介绍，微服渡河潜入刘士琦家中，暗中与党三窑子伪蒙军奇子祥会晤。相谈之下，他那“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赤诚，溢于言表。蒙他安全掩护，派他的部队把我送至铁帽村，另派人与我过河部队联系妥后，在一个夜间护送我安全到达我部郭文华连。然后我率部挺进到麦达召一带。当时日寇因太平洋整个战局的变化已成强弩之末，过去那种嚣张的气焰大大减弱。敌人豢养的土默川各据点伪警察署的伪军，亦均龟缩在据点内，不敢出来滋扰横行。在这种形势逐渐好转的情况下，我支队乘势活跃在归、萨地区，白天亦可四出游击，到处散发印好的传单，忠告那些为虎作伥的伪军政人员，认清形势，明辨利害，从速弃暗投明，脱离为敌殉葬的末日处境。尤其在敌伪据点左近的村落，大量张贴宣传品。在各游击部队打据点，攻碉堡，节节胜利的形势下，那些效忠日寇的汉奸，深感末日到来，恐惶万状，愁肠百结。

麦达召车站敌伪警备队中，有我部郭文华连长的一个熟人。他托人暗中与郭连长取得联系，准备反正。经过与我部多次串通协商，我抓住时机策划，让他们解除顾虑，预先决定给这个警备部队编成一个连的番号（他们共有三十多人，站上还驻有鬼子一个班的兵力）。我与他们约好时间，让他们作为内应，共同解决日寇这一个班后，拉出反正。缜密计划妥后，在一个晚上，我把部队部署在麦达召车站东西两端，一面接应反正的警备队吃掉一班鬼子兵，一面堵击敌伪从东西两面增援。同时派出五辆大车，隐藏在车站的北端，专门接出反正部队的家属到达麦达召村。在统一规定的信号下，突然将一个班的日军围住，经过激烈的战斗

和喊话，鬼子顽据碉堡内死不缴械。我故虑到战斗时间拖长不利，敌人从东西两面开过援军就不好办了，遂决定纵火烧掉这个车站，霎时烈焰腾空，车站成了一个火海，我们率领反正的警备队，安然撤回靠山的麦达召村。经过这次大火，麦达召车站直到日寇无条件投降后好长一段时间还是焚后断瓦颓垣的景象。

我们胜利地回到麦达召村驻地后，大加犒赏了反正部队，当时就给他们一个连的番号，让他们进行扩充。他们所带的三十多支捷克式步枪和一挺轻机枪都是崭新的。他们将一挺轻机枪和两支步枪送给我作为晋见礼品，我一支也没留，仍交给他们使用。万万没有想到，第二天，这些被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接应出来的反正部队竟然被鄂友三派人偷偷拉到水涧沟门归了他的特务大队。我得悉后，气愤填膺，带了几个卫士赶到水涧沟门去见鄂友三。鄂没等我开口，便狞笑着说：“海荣，你别生气，他们已编到我的特务大队里，我给你另拨一部分枪，这些捷克式新枪拨给我的卫队使用好了。”我干气没说的。我虽系东北挺进军游击支队，但在“大青山之王”鄂的势力范围统辖下，只有忍气吞声接受这种强凌弱、众暴寡不公正的处理。结果落了个“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只是给鄂的卫队装点了门面。

日本投降后，马占山将军率部东进时，我还在土默川活动。师长慕新亚深知我和部队都是绥远人，不可能跟上他们挺进东北，所以在他们兼程东进当中，只给我留下几句话，让我留在绥远，以纪念他在绥远起家好了。就这样我离开了东北挺进军。

上述回忆，因时隔四十多年，难免有疏漏和不准确的地方，望知情者补充和指正。

一九三八年春傅军反攻归绥

新 书 科

一九三八年春傅作义军反攻归绥之战役，是晋绥抗日战争中的一次较大的战役。日寇出动两个师团，我军动用三、四万的兵力。在此战役之前，侵占我太原之日军经文水、交城向南进犯，威胁到由太原转进到临汾偏安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安全。阎锡山司令长官即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率部向太原进攻，以牵制日军南犯，掩护司令长官部向晋西南转移。傅奉命后即由晋西柳林一带出发，经离石、大武、方山等地向太原挺进，以吸引牵制日军。但日军无视傅军之出击，径直南下先占领汾阳县城，又转而进占大武镇及离石县城，企图断我归路，进而迂迴打击我军。遂使我军又回攻大武、离石进击日军，克敌致胜。适在此时，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发生。为策应徐州会战，以利我军战斗，我军又由晋西进军太原，转向绥南反攻归绥。傅作义将军认为此举不仅可以牵制华北原拟增援徐州之敌南下，而且可以借机收复绥远省会归绥。即行挥师北上经晋西北及绥南各县向归绥发起进攻。是役我任傅部北路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作战参谋。现将战斗经过情况，分述如下，以供研究史料者参考。惟以事隔四十余年，有些情况记忆不清，错误之处难免，希参与此次战役者予以补充纠正。

一、战役前敌我状态

自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七七事变”以来，日本侵略者先行占我平津，侵我察绥，继而进犯雁北，企图占我太原，进而占领

整个华北。经我军在南口、平型关、忻口等地区坚强抗击，阻止了敌人前进。敌我血战月余，双方伤亡均重。日寇在忻口攻击受挫，无法前进，又改由晋东侵占娘子关，向太原进扑。我军被迫放弃忻口，退守太原。太原陷落后，大部队撤至祁县、汾阳之线；防守太原的三十五军撤至石楼、中阳、柳林一带休整；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撤至晋南临汾地区。日寇因在忻口等地遭我强大兵力阻击，损失特大，占我太原后，进行休整，未继续南犯，使退居临汾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得以偏安一时。

二、由进军太原改为反攻归绥

侵占太原的日军，经过短时间的休整，即沿公路南犯，攻占汾阳县城，并拟径直南下进攻临汾，第二战区长官部受到威胁。阎锡山司令长官即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率部东进，向太原发起进攻，牵制日军南下，掩护第二战区长官部向晋西吉县转移。傅作义将军奉命后，即率所部由柳林经离石、大武、方山到达古交一带，准备向太原发起进攻，并在文水、交城之间地区多次袭击敌军，毙敌甚众，截获敌军一批辎重。日寇对傅部的出现十分紧张，遂由汾阳西窜占我离石、大武，企图断我归路，迂迴反击我军。傅作义将军得知此情后，认为太原有坚固工事，并有重兵把守，进攻不易，而窜犯大武、离石之敌，正合我们诱出来打的意图，正好将他吃掉。傅总司令即令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兼）所属一〇一师（师长董其武）附山炮一营向大武镇之敌进攻，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附山炮一营向离石县之敌进攻。三月五日夜晚同时出动，向两处之敌发起攻击。大武之敌被我军全歼；离石之敌依城坚守，我军攻进城内同敌展开争夺战。顽敌死守不退，我军猛攻多次，虽给以沉重打击，但未攻克县城。

在我军收复大武镇，攻击离石之敌时，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序幕即将拉开。蒋介石为牵制华北日军不能南下支援徐州方面

之敌，以利我军作战，特任命傅作义将军为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并指挥中央军骑兵第六军门炳岳部，东北军骑兵第二军何柱国部，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驻防榆林的二十二军邓宝珊等部，即行出发北上向日军战略要地，伪蒙疆政府所在地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发起反攻，策应徐州会战。傅总司令受命后，即在驻地召开有关部队长会议，研究讨论如何向占我归绥之敌发起反攻，以完成这一光荣任务。会议一致认为归绥是西北的重要战略据点，又为日寇所扶植的伪蒙疆政府所在地，是日寇守军最薄弱之处，又是日军所必守之地。我军如反攻归绥，日寇必派大军增援。如打得好，既可策应徐州会战，又可能一举收复绥远省会归绥市，一举两得。傅总司令同意会议上大家的意见，并作了重要讲话和指示。傅说：“归绥是绥远省会所在地，是西北的门户和战略重地，自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我为了顾全国家大局，保卫晋、察，离开绥远已八、九个月了，作为绥远省主席来讲，未能在绥远抗击日寇，保卫绥省土地，深感愧对绥远父老。此次奉命由晋西向绥南进军反攻归绥，牵制华北日军南下，策应徐州方面我军作战，是一个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此役有许多兄弟部队配合，相信一定能够打好。”又说：“抗战初期不论是忻口战役或是太原战役，我们采用的全是单纯防御，死守阵地，天天挨打，这是极端错误的。现在我们专找日军的薄弱环节去打，变被动为主动。不但能减少战斗损伤，沉重打击敌人，而且由战役的失败，转为战役的胜利。从战争的实质来讲，单纯的防御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消灭敌人才是安全的防御，历史上很少有以防守制胜的。战略战术的运用也是这样，我不攻敌人，敌人就一定要攻我。这是很浅显的道理。过去不少战役，如远至北伐时的涿州战役，近至数月前的忻口和太原战役，我曾在防御上下过很大功夫，结果都是错误的。如把那些力量用在攻击上，战果就会改观。”最后他说：“今天我们要想消灭敌人，先要去分散他，迷惑他，困住

他，然后再去攻击他，胜利就在我们掌握中了。这次我们反攻归绥，在战略上不作硬性攻城，而是把敌人诱出城来消灭。在战术上采用迷惑分散敌人的方法，将敌人分隔开，而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之。我军只要善于改变打法，变被动为主动，变单纯防守为主动打击敌人，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三、派员侦察敌情拟定周密计划

傅总司令召开部队长会议决定反攻归绥之后，即策划如何歼灭归绥之敌。首先派出熟习绥远各地情况的侦察人员，潜往绥南清水河、和林格尔以及归绥、包头、大同等地，了解敌军兵力驻地、武器装备、工事构筑等情况，拟定袭击绥南各县，反攻归绥的详细计划。当时傅总司令的计划是：先令各部队由驻地出发，分路向东挺进，摆出向太原进军的态势，以分散和迷惑敌人，使敌人误认为我军仍是袭扰太原，无北上反攻归绥之意图。并派兵一部向古交一带之敌进行袭扰，掩护主力部队北上，一举攻占归绥，歼灭守敌。俟华北日军为我牵制前来归绥支援时，我军再主动撤出，通过归绥向北撤至武川、固阳，经安北转入河套地区，在河套建立抗日根据地。

根据上述计划，傅总司令即令一〇一师和七十三师分别由驻地出发。经过三交至临县时，一〇一师派兵一部向太原方面故作佯攻，掩护主力部队北上。派出的部队在古交一带，有意识的找敌作战，借以分散迷惑敌人，使我军顺利经兴县、保德、河曲、偏关径直向绥南挺进。先头部队到达河曲时，傅总司令下达如下命令：令七十三师所辖一九七旅（旅长王恩田）归三十五军副军长陈炳谦直接指挥留驻保德、河曲、偏关一带，建立后方基地，设立后勤补给站，供应前线作战部队军需之用。令七十三师所辖二一一旅为前卫，先行歼灭清水河之敌，而后向和林格尔之敌发起进攻，歼灭该县

之敌，占领县城，掩护主力一〇一师向归绥挺进，攻击归绥之敌。该旅四二二团王雷震团长在部队占领和林格尔后，即率兵两营迅速进至旗下营破坏集宁至归绥之间的铁路，阻击日军增援归绥之敌，使主力部队攻击容易成功。令一〇一师为主攻部队，在二一一旅的掩护下，经和林格尔向归绥之敌发起进攻，一举攻进城内，全歼守敌，占领该城。

四、收复清水河攻克和林城

孙兰峰旅长奉命后，于四月二十三日夜晚十二时，挺进至距清水河十华里一村庄时，即令四二二团向清水河之敌进行袭击。守敌为伪蒙古军骑兵门树槐部。我军行动秘密，守敌事前毫无察觉。我军攻进城内后，即向敌猛冲猛打。敌从梦中惊醒，仓皇应战。城内所有制高点及交通要道口，均为我军占领。守城敌骑不善于巷战及守点战斗，即由北门向归绥方向溃逃。我军收复清水河县。接着孙兰峰旅长即令追击前进。四月二十五日该团前卫第二营（营长郁傅义）行至和林格尔县以南，清水河以北之大红城，发现喇嘛盖敌军阻我前进，郁营即向该敌进攻，牵制该敌使之不能增援和林格尔日军。该敌顽强抵抗，屡攻不退。王雷震团长即率第一营（营长宋海潮）从敌右侧迂迴攻击该敌，敌不支向归绥方向溃退。

为不失战机，迅速攻克和林格尔县城，掩护主力部队一〇一师尽快向归绥市发起进攻，孙旅长即令王团将喇嘛盖之敌迅速歼灭后改为后卫向和林格尔跟进。孙亲率该团第三营（营长安春山）及四二一团（团长刘景新）向和林格尔县城攻击前进。和林格尔在归绥正南，距归绥市一百二十余华里，为不使归绥市内之日军过早发觉我军，除严密封锁消息外，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进行突然袭击。孙命令四二一团跑步前进，务于四月二十六日夜晚子时前赶到和林格尔城外，由东南及西南两方面攻上

城门，先行斩关夺门，使后续部队一举冲入城内，向敌猛烈进攻，歼灭守敌，占领该城。刘景新团长奉命后，率该团跑步前进至和林格尔城郊时，正好夜晚十二时，即令该团第一营（营长张进修）由东南方向发起进攻。该团官兵早就憋足劲头，要在反攻归绥战役中好好打一漂亮仗。一听到攻击命令，便如猛虎扑食一样，一举登上城墙由东南、西南两方面同时攻入城内，同敌展开巷战及白刃战。霎时间枪声、炮声、手榴弹声震撼了和林格尔县城。每个官兵奋不顾身，奋勇同敌拼杀，逐院逐房同敌进行争夺，前扑后继，勇往直前，轻伤官兵不退，重伤不喊叫。战斗约两小时许，即将守敌全部歼灭，攻克和林格尔县城。俘敌日伪军百余人，缴获枪支、弹药、武器、军用物资一大批。

傅作义总司令紧跟孙旅进入和林格尔县城，但对外非常保密，连孙旅官兵也不知傅已进入和林城。孙旅四二二团也跟随傅总司令部进入县城。傅总司令即令孙旅改为预备队，并令王雷震团长即率该团第一、二两营星夜兼程向归绥以东的旗下营进攻，迅速歼灭车站日军，占领该镇，破坏旗下营至集宁之间的铁路，阻击由大同及北平方面前来增援的日军，使我主攻部队一〇一师攻击归绥成功。同时傅即命令主攻部队一〇一师董其武师长，率该师在二一一旅的掩护下速向归绥市攻击前进，一举攻入城内全歼该城之敌，收复该城。并告以王雷震团已先期到达旗下营破坏铁路，阻敌增援部队。在董其武师长行前，傅总司令又指示董说：“如我军在进军途中遭到归绥之敌倾巢出城阻击，正合我军诱出来打的意图，即同敌进行遭遇战，先敌展开攻击。如敌分兵向我围攻，我即运用甩开打一路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使用猛烈炮火，向敌进行猛攻，先行消灭敌军一路，然后再攻击其他。只要能变过去我军单纯被动防守挨打为主动打击敌人，一定能把这次战役打好。”

五、攻击旗下营反攻归绥城

孙旅四二二团王雷震团长率该团第一、二两营附山炮兵一连，于四月二十七日上午由和林格尔经凉城之西沟门向旗下营挺进，二十九日进至得胜窑子，三十日到达旗下营南部山地。首先利用抗战前我军所构筑的国防工事，阻击敌人，破坏铁路，砍电线杆，破坏公路桥梁，袭击车站日军。然后利用山地有利地形，出敌不意，一举攻入车站日军驻地，全歼守敌。大部日军被歼，少数日寇拒不投降，有的切腹自杀，有的跳楼自尽，另有两名跑到厕所缢死。王团在全歼车站守敌的同时，派爆破队将旗下营至集宁之间的铁路及公路桥梁破坏，并拆毁路轨数段，阻止日军增援。此时，由大同方面开来铁甲车一列，载日军五百余名。因我军将铁路、桥梁破坏，日军不能通行，即停止在旗下营以东铁路上。该敌一面修路，一面向斗金山我军阵地进攻，被我军击退。由于日寇恐我主力部队攻克归绥，在军事及政治上造成不利形势，使其控制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的美梦遭到破产，遂急于增援归绥之敌。一面集中炮火掩护日军攻击我军；一面整修铁路使其后续日军迅速开至归绥，阻止我军攻城。王团虽阻止了由大同开来的日军的前进，但由北平方面开来的大批援军（约有一个师团），比该团强大十倍以上，无法全部阻击，致使日军得以修复铁路，大批援军陆续开抵归绥，阻击我主攻部队进攻。一〇一师遭到敌军反击。傅总司令此时认为王团虽兵力薄弱，未能阻止大批日军增援，但已起到牵制和阻击日军的作用，遂令该团即行脱离战斗，返抵清水河归还建制。

攻击归绥的主力部队一〇一师，由董其武师长率领，在二一一旅掩护下，由和林格尔以东向归绥市攻击前进，行至归绥城南之昭君坟、一间房距归绥市约二十华里时，同敌二十六师团遭遇。董师长即令二一三旅前卫团四三六团（团长郭景云）先敌展

开，主动向敌进攻。敌因装备笨重，行动不便。郭团轻装简便，行动迅速，一举将敌冲作两段。郭团长运用傅总司令指示的甩开打一路的战术，集中全团轻重机枪之炽盛火力，向敌猛烈冲击。狡猾的日寇指挥官，变更其平日硬攻的打法，采用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我郭团两路夹击围攻上来，集中兵力围攻该团，战斗非常激烈。郭团战士英勇奋战，伤亡惨重。郭景云团长负重伤。董其武师长即令二一八旅（旅长姚骊祥）支援郭团，速由两侧向敌包抄（反包围）。姚旅长即令该旅四二〇团（团长李思温），即刻前往增援，并着该团邵得禄营长即时向敌侧后迂迴，攻击当面之敌。同时派爆破组炸毁大黑河公路上的桥梁，阻敌增援，断敌归路，使我军集中全力歼灭日寇。但邵营动作迟缓，既未及时增援上去，协助郭团聚歼敌人，又未将公路上的桥梁破坏，使我主力部队一〇一师，遭到由归绥倾巢出动之日寇及由北平方面赶来增援的大批日军的两面夹击。在敌飞机、大炮、坦克协同联合攻击下，我军损失惨重，攻击遭受顿挫。傅总司令当即将作战不力，贻误军机的邵得禄营长处以军法。而后又将姚骊祥旅长、李思温团长撤职。

六、日寇骑兵被歼，我军胜利转进

四月二十八日正当我主力部队一〇一师同敌二十六师团在归绥以南昭君坟、一间房附近地区战斗最激烈时，日军岩田骑兵联队（相当于我军一个整编骑兵团），绕经托县迂迴过来，企图攻击傅作义总司令在和林格尔的指挥部。当敌骑进至和林格尔城西二十余华里的前后察圪洞村附近时，被孙兰峰旅四二二团安春山营阻击，战斗非常激烈。日军气焰嚣张，我军屡攻不退，似有掩护日寇步兵攻击我总指挥部之企图。孙兰峰旅长为使总指挥部不遭敌之袭扰，即令四二一团张进修营前往支援安营，侧击岩田骑兵联队。在两营密切协同配合下，安营打敌下马步战之日军；张

营一面从侧背迂迴侧击敌人，一面派第一连王纯刚连长率该连攻击日军之控马。敌骑被我军两面围击，战斗至黄昏，敌不支固守待援。二十九日夜晚，张营组成爆炸队，于凌晨二时，协同安营袭击敌军。一面令爆炸队炸敌马群，一面用机枪、大刀、手榴弹冲杀敌人。在一阵冲锋突击的号声中，日寇被打的人仰马翻，东逃西窜，日军大败。直到天亮，战斗始告结束，打死打伤日寇三百余人，获战马三百九十六匹，其他军用物品甚多。四月三十日上午，日寇飞机六架向我二一一旅轰炸扫射，掩护步兵向我攻击。我军同敌激战达四小时，张进修营连长宋文周中弹牺牲，蔡玉庆的第三连打得只剩下三十余人。可见战斗是如何激烈。

傅作义总司令这时感到原订的作战计划，虽未能全部如愿实现，但牵制华北南下增援徐州会战方面之日军的任务胜利完成，遂决定撤出战斗，向清水河方向转移。但日寇企图彻底歼灭我军，紧紧跟着我军不放，并调集由归绥、包头、大同、左云、平鲁等五个方面之日军，对我军进行围攻，以期一举全歼。傅作义总司令采用甩开打一路之战术，命令我军不管敌人兵分几路围攻，先行集中兵力打敌一路，然后再将各路犯我之敌，以同样方法分别逐一歼灭之。

七、歼击各路敌军安全撤回基地

由平鲁进犯清水河大小双墩之日军黑田师团，企图抄我后路，断我归途，于五月五日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协同下，向我军发起进攻。其时傅总司令之总指挥部刚刚进入清水河县城，受到敌之威胁。傅总司令即令新编第六旅（百灵庙战役时反正过来的部队，旅长王子修）向敌反击。激战一日，黄昏时停止战斗，敌撤至韭菜庄，准备明日再行攻击我军。入夜，傅总司令命令孙兰峰旅派兵一部袭击黑田师团司令部。孙令四二一团组成突击队，分编七个战斗小组，由张进修营长率领于当夜子时，前往袭

击敌军。当我军战斗小组，出敌不意分路袭入敌营时，守敌乱作一团，有的上房射击，有的守门抵抗。我战斗小组东打后北走，西打后南去，扰得敌人束手无策，不知应从何方应付我军。袭扰了敌军一夜，天明我军安全撤走。我军伤亡十一名战士，张进修营长负伤。次日归傅作义总司令指挥的何柱国部，行进至韭菜庄附近时，遭到敌步骑混合旅的攻击，战斗十分激烈，何向傅要求支援。傅总司令即命二一一旅及王子修部三方互相配合，步骑密切联系，分进合击，包抄敌寇。激战一日，敌不支败退。总部威胁解除，我军安全转移。

由包头向我军进犯之敌，在关河口附近同我一〇一师发生战斗。激战一昼夜，敌军不退。后由绥西河套地区前来增援我军反攻归绥的骑兵第六军骑七师门炳岳部（门兼师长），向敌侧后猛烈冲击，敌不支溃乱撤走。惟由归绥南来犯之敌主力（有的说是由华北调来的莲召师团的一部，也有说是岗本师团的一部）甚为猖狂，紧紧咬住我军不放，一直追到偏关附近。傅总司令见此情况，认为这是日寇蓄意要消灭我军，如不给敌以沉痛打击，不压下敌之火焰，战局即无法挽转。遂决心诱敌深入，予以痛歼。即令二一一旅撤至偏关以南之楼沟堡一带，集中兵力于店子湾及兴城之线，在敌必经之路上挖设陷阱，埋设地雷，选地埋伏，对敌进行伏击。嚣张之敌自清水河一直追击我军到偏关以西，从未遭到我军伏击，误认为我军只顾撤退转移，无心恋战，更无力反击，遂长驱直入，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趾高气扬地进入我伏击地区，有的跌入陷阱，有的踏响地雷。敌军正在惊慌失措进退维谷之际，东南方面二一一旅，西北方面一〇一师，两军突然冲出，机枪、刺刀、手榴弹、大刀，一起而上，又加天降大雨，真正把敌打得像落汤鸡一样，损伤惨重。尤以在距偏关城西约五、六公里处一山谷中，将敌诱入谷内，董其武师和孙兰峰旅密切配合，二一一旅打敌之头，一〇一师打敌之尾，敌我双方

展开白刃战。战士们打红了眼，见敌就杀，遇敌就刺，战斗约三小时，敌不支仓皇由原路败溃，我军大捷。傅总司令总部经由三岔、巡枪司移驻河曲县城，将主力集中于偏关、河曲一带，进行休整。派兵一部分驻在神池、利民堡、老营、偏关之线，不断袭击敌人，以收牵制和各个击破之效。

八、结束语

此次战役自一九三八年二月下旬开始到五月下旬结束，时间长达三月之久。我军往返行军两千数百里，大小战役十多次，牵制华北日军步骑兵两个多师团，打伤打死日伪军三千余人，俘虏日军数十人，缴获山炮数门，步骑枪二千余支，战马四百余匹，其它军用物品甚多；收复大武镇、清水河县城、和林格尔县城；攻占旗下营，破坏归绥至集宁之间的铁路及桥梁，阻击由华北前来增援归绥守敌之日军。此役虽未收复绥远省省会归绥市，但给了日寇以沉重的打击，策应了徐州会战，对整个抗日战争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傅作义将军在此次战役中，运用的战略、战术都很适当，在军事指挥艺术上具有很高的技巧。尤以从战役实践中取得的许多宝贵经验教训，对尔后我军的作战起了很大作用。如单纯的防御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消灭敌人才是安全的防御，等等，都是傅作义将军在与敌战斗中，研究总结出来的。对抗击日寇，大举反攻，收复失地，有很大的裨益。

日寇侵占归绥罪行片断纪实

倩 影

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市），是在1937年10月14日清晨，由于当地驻军的弃守而被日本鬼子侵占的。

日本鬼子进入归绥之前，城外就有攻城炮响，尤以从新城南门外、昭君坟方向传来的炮声为重。隆隆的炮声，一阵比一阵猛烈，还不断地夹杂着机关枪扫射的“哒哒”声。日寇轰炸机也不时地在高空盘旋，三架一组、三架一组地川流不息，时而俯冲投弹，时而低空扫射。城内不时响起空袭警报声及驻军对敌机的射击声，震惊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

人们不知道日本鬼子如果真的打进城来会怎样，多显出愁眉不展的神色。一些信神佛的人们，多是跪在神佛塑像前虔诚祷告。新城的耶稣教堂，信徒们也是各个做祈祷，乞求保佑。

新城城门紧闭着，早已断绝行人出入。鼓楼的四大门洞，早在数月前就用装土麻袋堵挡起来，以备和敌交战时，做碉堡用。城墙多由中腰挖成大小长短不等的洞道，由城里可通向城外。各家各户都挖了二米多深的防空洞，可容纳一至二人，只要听到空袭警报，无论大人小孩马上就往防空洞里躲避。元贞永街傅作义长官公署后院内有座土假山，也挖成防空洞。洞内完全用洋灰砌实，非常坚固，可容纳百人。为了防备飞机轰炸，在假山上架有两挺机枪和一门高射小炮，以用来对付敌机。各花园的花窖，都是把花搬出窖外，腾出窖来做防空洞用。

各买卖商号在日本鬼子将进城的前几天，就多已不开门了，仅在门板上留一小口卖东西。还有些商号把货物囤积起来，利用国

难当头，高抬物价，大发横财。如新城南街义盛泉酱菜园及北绿庆生长面庄等都是如此。

就在日寇进城前夕，鼓楼前还张挂着马占山部队的战功牌，上写“我军已把日军打退到丰镇、集宁一带，取得了胜利大捷……”等语。同时街道上还贴有“我军誓死保卫绥远”、“誓死与父老兄弟共存亡”、“决不丢失一寸国土”等醒目的大字标语。殊不知就在这种慷慨激昂的口号下，经过了两昼夜的炮声，突于14日的清晨七时，日寇已开着铁甲车、坦克，打着膏药旗，荷枪实弹，浩浩荡荡地进城了；而昔日的守城部队早已不知去向。

归绥城内的汉奸们以维持会的名义打着欢迎旗到南门迎接日本鬼子入城，并让挨家挨户悬挂写着“欢迎大日本”等字样的日本旗。谁家不挂是要惩办的。可用白布做的旗子挂了出去，马上就丢失了。后来只有用白纸做，但也是不时地就会丢失。事后才听说，偷旗子的人并不是为了贪图旗子的布，而是一些爱国志士，出于爱国热忱，冒着生命危险干的。

日本鬼子进城没几天，就到各家要吃要喝，有时喝的酩酊大醉，肆无忌惮地到处找“花姑娘”糟害人民。笔者清楚地记得，曾有两名日本士兵，一天夜间十来点钟，突然闯进我家，开口：“迷希、迷希的有。”虽然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可看他们用手比划的情形，是要吃的。不得已，只得给他们做饭。两个日本兵吃饭恐怕有毒，叫我家人先尝。那天因为在我家喝酒喝多了，嘴里哇拉哇拉地不知说些什么，龇牙咧嘴，又喊又叫，简直使人毛骨悚然，好不容易才把这两个瘟神恶煞打发走了。

日本人羽山少佐是1935年“何梅协定”后以特务身份来归绥的。初来时住在旧城西河沿驼商胡老五院内。因公开成立特务机关的要求被傅作义主席断然拒绝，后不得不以羽山公馆名义进行特务活动。日寇进城后，他在新城元贞永街东头路北居住办公，公然挂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招牌。事变以前他的门前真称得上是

门可罗雀，可事变后大相径庭，门前真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军用卧车川流不息。他这个宅院里被关进去的爱国志士不知有多少，附近的人们每天夜里都能听到脚镣之声和恫吓之声。

1937年12月1日，日伪发表了伪蒙古联盟自治组织法。就在这个日寇蓄谋以久、精心炮制的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组织法一出笼，就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普遍不满和坚决反对，一致认为这是卖国求荣、出卖祖国、讨好日人、丧权辱国的勾当。一时舆论大哗，并在街道深处散见有无名传单和电线杆上的正义标语出现。上面多以慷慨激昂、大义凛然的词句，痛斥那些充当汉奸的民族败类，强烈要求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从中国领土滚出去。传单及标语署名是“青山”、“夜光社”、“爱国者”等。

这一事件发生不久，就在1938年元月份，日本宪兵队大抓所谓“共党嫌疑分子”。如第一师范中学语文教员董遂本，就在这年将过大年之时，以有煽动学生散发传单之嫌被捕，扣在宪兵队里。三几个月，吃尽了严刑酷打，结果查无实据才把他放出。还有现内蒙古科技图书馆退休老干部贾存恩同志，在那时也是以“滋事惑众”、“共党嫌疑”等罪名被捕入狱的。

日本鬼子进城不久，市面上就出现了日本镲制硬币，有五角、壹角、五分的。由于日伪人员宣传旧币要作废，致使市民多用银元到商号及银行兑换日币，结果好端端的白银都到了日寇手中。1938年元月28日厚和市发布了银元兑换声明，声称“蒙疆银行在蒙疆地区接收了中央银行所属的绥远地方银行、号、钱局，确立了银行发券的权限”，“现在旧纸币全部回收”。这一声明发布后，全市物价猛涨。

日寇进城后，归绥各学校均已停课，待1938年春方始复课，教师们大多数已更换。各学校设置了日人教官，增添了日语课程，无疑这是日寇推行其文化侵略的又一手段。

日本侵华事实早以昭然若揭，有目共睹，我所记载的，只是

些片断史实，不及日本侵略者所犯滔天罪行的万分之一。仅供后来人铭记及研究史学者参考而已。

观 音 寺

观音寺，座落在旧城西南，俗称观音庙。相传，始建于清代嘉庆年间。庙内石碑有道光二十五年（公元一八四五年）重建的记载。与众不同的是佛殿在南，山门在北。人们管它叫作“倒座观音庙”。它的模样有点象四合院，主体建筑由三段组成，以建在高台之上，前有月台的佛殿最为壮观。

在一对青石狮的后面，是四柱三间三楼牌楼式山门。三间月台（亦称暴厦子）、五间佛殿。在佛殿墙壁之上，按“妙法莲花经观世音菩萨门品”绘制的彩色壁画，共四十幅。莲花台上端座的，中为观世音菩萨、上首文殊菩萨、下首普贤菩萨。在观音前侍立着善才童子和龙女塑像。东西配殿各三间。

该庙和尚采取衣钵传承制，自建寺至今已有七代僧人。他们是具足——演善——性凯——海玉、海瑞——湛祥——然刚、然俊、然传——澄业、澄贵、澄果。三代主持“性凯”，于民国九年（公元一九二零年）传十戒；五代主持“湛祥”，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传十戒代五戒，民国二十六年（公元一九三七年）传五戒。

农历二月十九日是观音圣诞届时举行庙会，期间有集市贸易活动。六月十九日观音成道，九月十九日观音说法日，正月初一弥勒佛诞辰，四月初八释迦牟尼诞辰，十一月十七日弥陀佛诞辰，腊月初八释迦牟尼成道，均举行法事和法会。

（照记）

同仇敌忾 共赴国难

吴素洁口述 周一鸣整理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四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占领了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当时抗日名将傅作义将军率领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和日寇转战在绥东及晋冀等地区。后于一九三八年傅军挺进至晋西北河曲县一带整休。此时，为搜集绥远省敌占区情报，并在伪蒙古军中开展策反工作，傅作义委任我义父刘长荣为中将招抚司令，我为情报交通员，在归绥市开展地下工作。

刘长荣出生在山东省历城县三河村的一个贫农家中。少年时代就参加了“鲁军”，因作战英勇，很快由士兵升为营长。同时因他为人正直，肝胆义气当头，故为“青帮”吸收，与南方的杜月笙和北方的王大同，都是“大通悟学”的大字辈。山东各地“红枪会”中的头目，多为其徒弟、徒孙，在直、鲁、豫三省境内很有威望。一九二八年下半年傅作义将军收编了张宗昌的“鲁军”，刘长荣被编为晋军张宝亨二十八旅邢葆鸿八十六团营长。一九三〇年阎冯反蒋，展开中原大战，刘长荣营被拨到白濡青旅的孙兰峰团。一九三五年，刘长荣结束了他的戎马生涯。傅作义以招抚司令的待遇让他领导了绥远省的帮会。

刘长荣离开部队以后，在归绥旧城牛桥开办了“新绥旅社”，作为“青帮”联络机关及接待前来投奔他的众徒和朋友们之食宿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刘领导的“青帮”影响大增。我为了加入“青帮”，于一九三八年正月，通过兴和县杨子荣、赵大义二位正副县长结识了刘老头。我和刘老头一见如故，他待我如亲生女儿一般，我对他也敬慕之至。因而我认其为义父，他收我做了义女。在这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共同研究对敌策略，他坐镇

家中，我在外面做联络工作，得以实现了我反帝爱国之宿愿。后不久，傅作义将军委任我为情报交通员。

一九三八年春，傅作义将军派来了卜仁山（“七七”事变前任归绥市警察局侦缉队分队长），并带来电台一部，电报密码一本，交给刘长荣。同时跟随而来的还有杨、梁两位译电员。为了不引人注目，我把小西街五十八号（现六十四号）的住房托付于李守信的副官李秀山住管，把卜、杨、梁安排到我在乃莫齐召租的两间房中，作为休息之所。

傅作义将军进驻陕坝就任了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我们和副司令长官部情报机关的韩伯琴通过电台接上了关系。开始阶段，电台运用还很顺利，为抗日部队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情报，使我抗日部队准确无误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一九三八年冬季，电台突然发生故障，与后方联络中断。在当时日伪戒备森严的恐怖气氛中，不能公开搬出去修理，怕暴露以后，个人受害事小，影响抗日工作事大。怎么办呢？在焦急万分的情况下，义父刘长荣对我说：“你是蒙古族，蒙古军司令部无线电台上有认识人没有？”一句话提醒了我，使我想起了德王那里的一个部长陶克陶。他平素和我有些交情，关系还不错。我对刘说：“有是有，不知肯帮忙否？”刘又说：“那咱们试试看，宁可碰了。根据你和他的交情，估计也不会出事。”当天晚上，我敲开了陶克陶的家门，问候了几句，就开门见山地和他说明了来意，不想陶慨然答应了，并且对我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为了抗日连性命都置之度外，我为抗日帮点忙那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过了几日，陶克陶就领来了德王无线电台的一个叫李义舫（后被刘长荣收为徒弟）的技师，不多时就把电台修理好了。当天下午，我们又和长官部取得了联系，当时我们那种欣喜的心情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

后来时间不长，我们考虑到：因发报地址每天转移，而我们

使用的是老式电台，体积又大，也很笨重，携带很不方便，且易被发现。因此义父提出托李义舫做一部小型电台。李答应后，过了半个多月，用他们电台上的散件做了一部小型电台送给了我们。试用后效果良好。在当时经费少的情况下，为了感谢陶克陶和李义舫，我把家中祖传的赵子昂画的一幅叫“八骏马”的名画和仇十洲画的长十几米、宽五十公分左右的一幅“八百八十八罗汉”组成的轴子画赠送了他们。

那时我们都以民族气节为重，以抗日救国之大业为共同目标。无论是傅作义部派来的情报人员，还是大青山八路军游击队派来的工作人员，我们都一视同仁。我记得，八路军“战地委员会”曾派工作人员张贵山同志来归绥了解情况；以后又派搞敌工的刘队长（名字记不清了）、情报股长李荣玉（建国后曾任市民政局副局长）来搜集情报，我们都给予掩护和帮助。尤其刘队长是我们的常客。我们不仅给他们提供情报，还在经济上给游击队援助，如送些衣服、粮食等。

一九三九年初，因为我经常为收集和传递情报，来往于小西街李守信的副官李秀山和日本宪兵队宋翻译的住所，取上他们提供的情报，再到牛桥街五号送给我义父刘长荣。久而久之，敌人有所察觉。有一天，我去牛桥街五号送情报。一进门，我看到家里乱成一团，电台还在桌上放着。义父对我说：“昨晚我义子发报时已中电身亡，还没有来得及收拾电台。”正在这时，有人进来说：“日本宪兵队的人来了。”当时把我们惊住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跑上去收拾了一下电台，赶紧藏到了里屋的被褥下面。等我回到外屋，那个日本人已进来了。后来想起来可真悬呀！所以根据局势，刘长荣怕我出事，就劝我到北京他徒弟家暂住些日子。可等我到了北京猪毛胡同这位徒弟家后，不曾想宋翻译背叛了我们。这位徒弟告诉我：“日本宪兵队的宋翻译跟踪上

你了，你得赶快离开这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在当天就去了天津，在天津逗留了几日，乘火车直接回到了察素齐。

可是更危险的环境在等待着我。国民党自卫军中出现了一个叫赵盛雄的民族败类。由于我经常来往于自卫军中，所以我成了他向他主子——日本帝国主义请功的猎物。一到察素齐，他就盯上了我。在这紧急关头，我八路军游击队刘队长派人通知我：“赵盛雄已叛变，你必须马上转移。”因此，我当时通过各种办法甩掉了赵某的跟踪，在亲戚家隐蔽了起来。过了几天，刘队长通知我：“赵盛雄已被我解决，你可以回归绥了。”当时我的心情轻松多了，同时也使我对八路军油然而敬。

一九三九年秋天，由于我越来越被敌人注意，再待下去很危险，八路军刘队长和刘长荣商量，决定让我转移，离开归绥去后方五原县。于是就在这年农历中秋节前后，我和战友们挥泪告别，在八路军刘队长的帮助下，经大青山又转到萨拉齐高龙渡口渡过黄河，再由伊克昭盟扎萨克旗辗转到了河套五原县。傅作义司令长官接见了，还奖给我五百块大洋，让我安排生活。住了几天又派人送我到陕坝和我在傅部陆军骑兵四师任政治部主任的丈夫周秀山团聚。时间不长，傅作义将军根据我汇报的工作情况，又派名叫郑心杰的工作人员潜入归绥，对刘长荣所从事的招抚工作与方法作了重要指示和布置。

以上忆述，因事隔五十多年了，我又年逾八十，恐事实有不清之处，希知情者给予补充指正，俾归正确。

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抗日活动二则

杜海荣

杨星甫雪夜奇袭归绥市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第六路政治主任杨星甫，率精骑五百，出敌意表，乘雪夜奇袭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暨伪蒙古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归绥市（即敌所改称的“厚和”），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使盘据市内的敌伪惊慌失措亡魂丧胆，各自龟缩在巢穴内，鸣枪壮胆一直未敢出来应战。杨部在旧城大什字一带，经过将近三个小时的袭扰，在达到预期袭击的目的后，于鹅毛大雪中，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声，胜利地撤出市内，安返原防。这是抗战以来，归绥沦陷后，我军首次攻进市内，大灭了敌伪的威风，大长了我方军民的抗战志气，给我军开展城市工作，打开了方便的门径。

（一）杨星甫参加六路简介

杨星甫山西浑源人，北方军校第一期步科毕业。迨抗战开始时，任晋军六十一军二〇〇旅三九九团步炮连连长，原名杨永昌，恐家庭遭株连，遂改名星甫。他为人足智多谋，英勇善战，经常以“国难当头日，吾侪猛醒时”激励部属和同仁毋忘国耻。他所在的三九九团（团长张敬俊是山东人）是六十一军中战斗力特强的一个团。“七七”事变后，日军沿平绥线西侵，该团奉命固守天镇，敌军连攻九天，毫未得逞。因与上级失掉联系，遂撤退到五台山，旋即参加了有名的忻口战役。后因孙连仲失守娘子关，而太原直接受到威胁，傅作义将军东调退守太原，六十一军

一直撤到临汾，归陈长捷整编（此时军长李服膺已蒙冤伏法）。这时杨星甫既感上级人事生疏，又愤李军长死得冤屈，遂率其步炮连及第一营营附和部分官兵共计二百多人离开陈长捷，由旅部军法官王子定找关系给弄到个“十三军先遣第三总队”的番号，即率部沿黄河北上前线抗日。直到一九三八年春傅先生绥南战役撤退后，约在五月间，因杨星甫与自卫军六路副指挥陈国兴系旧相识，遂与六路接头合并，任政治主任，所部仍由其本人直接指挥，形成六路的战斗主力。自与陈国兴合并后，很快发展到2000多骑兵，活动在清水河、和林、凉城、集宁、丰镇、大同、左云、右玉等地区，给晋北、绥南间的敌伪，横贯了一把利剑，使敌伪在建立据点、交通运输、往来窜扰、搜刮物资、建立地方伪政权等方面，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和频繁的打击。

（二）袭击归绥的决策及准备

陈国兴与杨星甫根据绥南战役结束后的具体情况分析研究，一致认为，为了今后打入城市开展工作，必须进行一次对敌占要害城市的袭击。因此，经反复研究考虑，决定对归绥市之敌伪进行出其不意的袭击。决心下定后，为了团结六路自卫军范盈（副指挥）指挥的另一部分力量协力进袭归绥，陈国兴、杨星甫等便由凉城一带西进，与活动在崔家营附近的范盈部约会，会晤于凉城、和林交界处黑浪窑子，共同策划袭击归绥。经双方研讨遂定下了袭击归绥的初步计划。正在这个时候，由于六路两部分会师在黑浪窑子一带，声势浩大，左近的伪保甲团队，纷纷反正，投向六路，使伪地方政权的统治亦发生动摇，遂引起敌伪的注意。一九三八年八月初，盘据在凉城、和林、托县、清水河等处的敌伪军，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向黑浪窑子疯狂“围剿”。我自卫军六路部队，分别化整为零，以捉迷藏的战术与敌周旋在山林地区。敌人到处以大炮乱轰，消耗了不少弹药，结果在一无所获的情况

下，结束了对黑浪窑子一带的“围剿”。此役过后，不料范盈被其部属王哲民挟仇陷害击毙，而王哲民、冯宪庭等部东走归附陈国兴，李建功、赵古铎等部都自动迁散，杨贵团投敌，六路这一部分从此结束。在此情况下，陈国兴与杨星甫仍按袭击归绥预定计划，开始了缜密的侦察工作，遂令谍报科长郭云屏及李兴华（朝鲜族）负责，秘密率领对归绥市内熟悉的人员，乔装潜入，不止一次地进行了有计划地侦察，摸清了下列情况：

- (1) 敌伪军驻扎情况及兵力配备；
- (2) 敌伪岗楼哨所位置及出入口路线等；
- (3) 敌伪联络电话线路；
- (4) 敌伪军械、物资储存处所等；
- (5) 街道串连和地形及空虚地区；
- (6) 其它有关情况。

经过三、四个月的不断侦察，摸清了市内基本情况。陈副指挥和杨政治主任根据掌握的情况，决定了进入市区的路线及对敌伪兵力配备薄弱地区的主要袭击目标，并决定了袭击的时间及各种应变的对策等。同时还印刷了两万多份传单，规定了进入市内的纪律等。

（三）夜袭的经过

夜袭以前，为了给敌伪造成错误的判断，迷惑敌伪注意力，分散其对归绥市的严密防守，遂向凉城的天成村，和林的园山子、九龙湾，托县的什拉乌素壕和清水河的喇嘛湾一带，分头出动，形成到处袭扰、佯攻敌据点的态势。与此同时，派三十八、三十九冯宪庭和李进两个团的精锐骑兵五百多人，由杨星甫率领在十二月二十二日（这天是农历冬至）人们将入睡乡时，由黄合少村出发，途中——恐走漏消息——下达了袭击归绥的命令，说明了进入市区的路线、袭击的主要目标和方法，并分成几个行动

组，规定好暗号及必须遵守的纪律。命令下达后，即向归绥进发。在大雪纷飞中，逾夜间一点，取道石羊桥、卧龙岗等口突入，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将守口的岗哨缴械。其中石羊桥伪军哨兵鸣枪报警，我军立即突入，把住电话，在日本人电话询问何故鸣枪时，我军机警地回答说：“系哨兵走火了！”然后即将各个入口处分兵把守，并另派一部分兵力在碱滩附近严密监视新旧城马路以防敌伪出击，其余均按规定的任务，冲入市内旧城大什字、小东街、大北街、议事厅巷口与圪料街、小什字，往来驰骋，鸣枪示威。此时正当各娱乐场所刚刚停业之时，街头还有不少人，在枪声四起中，街道秩序顿时混乱。盘据在麻花板的日军及驻扎在市内的伪蒙军总司令部和驻兵据点，在夜半更深中，忽闻枪声四起，因其通信联络线已被我军破坏切断，失去联系，遂陷入情况突然，惊慌失措，草木皆兵的混乱局面，均龟缩在各自的巢穴内，乱肆鸣枪壮胆，未敢出窝蠢动。我军冲至言记和馥兰斋附近，不料该两商号有敌伪向我军射击。我方官兵义愤填膺，以泰山压顶之势立将这两个商号捣毁，将其食品掳获一空。之后，在圪料街料理馆俘虏了几个日本商人。本拟续将上栅子敌伪军火仓库焚毁，因侦知其有重兵守护，恐拖延活动时间，遭到日军的增援蒙受损失，遂将所带两万多份印好的传单，由各组散发市内。传单随着风雪飞散在各街口，并到处张贴了不少。传单主要内容是：劝告伪军弃暗投明立功反正；激励市民大力协助抗战；特别正告那些为敌张目的汉奸，指明他们执迷不悟，认贼作父的必然下场。一点到三点各组在完成预期的任务后，在统一讯号的指挥下冒着鹅毛大雪，安全撤出市外，胜利返回根据地。

（四）敌伪的狼狈相

这次夜袭，使不可一世的敌伪军，亡魂丧胆，狼狈不堪。日

军在麻花板营房听到旧城一片枪声，因情况不明，除了原地乱鸣枪炮炫耀其优势火力外，直到我方军队胜利撤出后，天将亮时，才畏首畏尾地由麻花板向旧城蠕动。隆隆的战车声，才把旧城伪蒙军仍在乱鸣壮胆的枪声淹没。

伪蒙古军总司令部驻在正风中学（现在的四中）。总司令李守信，在睡梦中听到大什字一带及其部队驻所稠密的枪声后，惊慌万状。因为总司令部的官兵有眷属的都回了家，而没家的全到外边去宿娼赌钱了，司令部连个值宿的军官都没有，大门口只有一个兵站岗。这位总司令身边除了自己的女人、孩子和老妈子、厨师而外，只有五个卫士，实难应付枪声四起的危局。在无可奈何中，他令五个卫士协助站岗兵守护前门，他自己带了两支手枪，仅穿着一身衬衣，单独招架后门，幸而我军没有进袭到西顺城街和杨家巷一带，总算他走运。直到我军于三点多钟胜利退出城去，而日本军的坦克和装甲车队缓缓开到旧城时，驻扎在牛桥附近的警卫队，才派了二十多个兵前来保护这位总司令，着实令人可笑！这一夜李守信因只穿一身衬衣在大雪纷飞中，蹀躞于院内，连吓带冻，头部中风得了脑子疼痛，据说医治了三年才好。

这一夜，光是伪蒙古军的第二师和直属部队，就报销了一万多发子弹，连同日、伪军共消耗弹药两万多发。

（五）夜袭的收效

我军夜袭后撤退时，天降鹅毛大雪，顷刻盈寸，部队过后，马蹄足迹，很快被雪淹没无踪，使敌伪弄不清我军从何而来，由哪而去，瞠目伸舌，叹为神奇。

经过这次夜袭归绥，消灭了言记、霞兰斋等处的敌伪，获得一批物资，并散发了两万多份传单，收到了对敌伪的攻心奇效，对民众起到了有力的激励作用。特别是一些汉奸敌探，从此把我

方根据地边缘石人湾，改称为死人湾，因为他们到该地就有被捕送命的危险。自此以后，自卫军六路活动区的县城内工作开展较前顺利多了。诸如从伪军、伪警及自卫保甲团队中购买弹药及各种医药、布匹军需品等，都可买到；那些为虎作伥的伪警及汉奸，有些人由于我们传单指给他们的道路，竟成了我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敌伪活动的意图及计划等，往往通过他们可预先获悉，得益良多，实肇基于斯役。

笔者在写这篇文章时，虽参考了有关自卫军六路活动的史料，并走访了几位比较知情的同志，还向杨星甫先生进行了史实的核对，但因时隔将近半个世纪，不妥甚至错误的地方在所难免，尚希知情者指正。

郝明亮勇夺敌武器

一九三七年秋，当归绥县被疯狂的日寇占领后，归绥西区保卫团中有个张亮（时任班长），在敌进我退的混乱局面中收容了一些散兵游勇，活动于脑木汉、西淌不浪、大小圪贡一带，开展游击，扩充力量。同年冬，曾由准格尔旗收编为伪保甲团，后因策划反正走露消息，所部被解决。他和几个连长脱险隐伏于家中。

迨至一九三八年春，凶残暴虐的日伪到处横行，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张亮目击乡亲们受害惨状，激于民族义愤，即会同郝明亮、石灵等，东山再起，分头活动，很快地又扩充成一支队伍，对归绥县境的敌伪，不时予以沉重打击，力量一天比一天壮大。赶到夏天青纱帐起来后，这支部队的声势撼动敌胆，很有名气。这时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第三路王有功，便利用各种关系，遂将张亮等收编为二十一团，委张亮为团长，武生云为团副，郝明亮、石灵、张河及陈玉铭等为连长，驻扎在店尔上、老道沟、水

磨沟一带。由于部队人多枪少，除通过各种关系购买武器外，又采取从敌人手中夺枪办法，扩充武力。

连长郝明亮对归绥市大小西街地形熟悉，而且还有朋友数人。遂于是年冬，在缜密侦查后，知道小西街单独驻有伪蒙古军一个班，夜间还不设哨兵，便凭着人地熟悉而且摸清敌人底细的优势，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冒着生命危险，带了十几名得力的士兵，以极其敏捷的行动，闯进了小西街这班伪军的巢穴。等到这班伪军惊醒后，他们挂在墙上全班所有的武器，都被郝连长等十余人缴获，吓得这班家伙抖成一团，只求饶命。郝连长用手枪对着他们说：“我们不要你们的命，因为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只要放老实些认清形势就可免去死路一条！你们的武器，我们就借用着打鬼子吧，现在你们暂时受点委屈好了。”说着目示其士兵，把这些伪军背对背捆结实，嘴里填满了棉花及烂布，然后把门朝外一闩，带着缴获的战利品——两挺捷克式七九轻机枪、八枝崭新的韩林春步枪及两把猪头盒子枪和不少弹药，迅速撤出小西街，兴高采烈地返回根据地水磨沟一带。

这次突然闯入敌巢，没开一枪，夺获一批崭新的武器，给了驻归绥市敌伪军一个沉重的打击，大大鼓舞了绥远民众抗日自卫军各部的勇气。具有英雄胆略的郝明亮连长，受到自卫军前方指挥于存灏的特别嘉奖。

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在归包地区的活动

赵相璧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仅得到了内地各省区人民群众的响应，也得到了塞北各族人民的响应。当时爆发在归绥（今呼和浩特）的新军起义和包头的独立自主运动，都是在同盟会革命党人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下进行的。因此，本文拟就同盟会在归、包地区的活动，作一简略的叙述。

一

中国同盟会是一九〇五年八月由孙中山先生于日本东京联合兴中会、光复会和华兴会等革命小团体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在国内设有五个支部。其中北方支部设在烟台，负责领导山西、陕西、直隶、东三省、绥远和蒙古（包括内外蒙古）等省和地区的工作。由于绥远地区的革命力量薄弱，同盟会北方支部没有直接在这里设立机构和确定主盟负责人。因此，这里的工作主要是由同盟会山西省分会直接领导进行的。绥远西部的归、包地区，当时在行政区划上是属于山西省归绥道管辖。所以，在辛亥革命前同盟会山西分会负责人谷思慎和会员续桐溪就派出大批同盟会员到这一带进行宣传和组织发动工作。

一九〇六年初，山西巡抚恩寿通缉同盟会员。因此，谷思慎与南桂馨等同盟会员乘除夕之夜，潜逃到五台县东冶镇，与刚从日本回来的同盟会员荣福桐等人相见。此时在崞县川路学校活动的续桐溪亦离校至东冶镇。时荣福桐向他们传达了同盟会总部的指

示：“先行秘密布置，储备实力，至于发动的具体日期，须听总部命令。”据此，同盟会山西分会主盟负责人谷思慎，还有会员续桐溪、南桂馨等人共同议定方略：“绥远西部（主指归包地区），清廷鞭长莫及，应该到那里招兵买马，预作准备”，革命即可从塞外先发。因此，同盟会山西分会于一九〇七年先后派出王建屏、王建基、徐翰文、弓富魁、李荣、杨需霖、李栖鹏等二十余人出杀虎口赴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包头一带，联络朔方健儿计议暴动。

同盟会山西分会的会员分途来到绥远西部地区之后，即根据分会“秘密提倡革命，……扩张同盟会。”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工作。据载当时的徐翰文、赵载文等“三晋志士”即奔走于归绥、包头、五原之间，宣传革命。此外，在这里活动的还有徐西园、弓富魁等人。他们发展了李德懋、刘幹臣等多人入同盟会。李德懋是大同人，精通拳术，在归、包一带以设场卖艺为名，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他们又在大同和丰镇分别设立了联络点，以便联络雁北和归、包地区的革命党人。

王建屏也是最早来归、包地区进行革命活动的同盟会员之一。他有胆识，擅言谈，来到归、包地区之后，为了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曾广泛地接触各方人士；为了争取哥老会的力量，他还亲赴五原厅作过会首王同春的工作。一些青年学生们因佩服他的胆识，愿和他交朋友，加入同盟会的人也日渐增多。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在蒙、回等少数民族青年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当时萨拉齐的云亨、经权、安祥、满泰等蒙古族青年，都是他的朋友。后来云亨、经权、安祥、巴文颀等人也都加入了同盟会。还有萨拉齐的王定圻，原在山西优级师范学堂读书，毕业后亦加入同盟会，献身革命。总之，由于山西同盟会员们的努力工作，使归、包地区的同盟会组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一九〇九年，这里加入同盟会的人除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杨云阶、曾传

章、郭鸿霖、王鸿文、王平章、李茂林、李士元、王肯堂等多人。

同盟会山西分会在绥远西部地区的大量工作，从组织上为归、包地区各族人民响应辛亥革命的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绥远省地处祖国北部边陲。二十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出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产生，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这里也开始有了传播。因此，当同盟会山西分会派同盟会员到归、包地区宣传革命发展组织的时候，很快就得到这里的一批先进人物的支持。后来这批人大部分都加入了同盟会，与山西来的同盟会员共同倡导革命。

同盟会在归、包地区有了一定的发展之后，即根据总部“加紧革命运动，进行武装起义”的指示，积极作起义的准备。当时在归、包地区活动的革命党人即分别以教员、医生、卜者、武术教师等公开身份，并利用各种有效的方式深入到军队、学生、帮会和地方人士中作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他们宣传的内容，最初是同盟会印发的《十二糊涂歌》，主要是反对缠足，反对留辫子等；后来又进一步宣传了同盟会的纲领和同盟会印发的一些秘密刊物。为了便于联络，云亨和经权还承包了土默特旗煤炭租税局管辖下的小税卡——马莲沟作据点。后来由于反动统治者的迫害，革命党人在这个地区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例如，一次革命党人正在归绥某会员家聚会，计议起义方略，不幸事洩，突然被清军包围，与会者除逃亡外地的余皆当场遇害或被捕。尽管如此，革命党人在归、包地区还是作了大量的开辟工作。

这时在海外学习的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也接受了同盟会的主张。一九〇八年《民报》第20号发表了一篇题为《蒙古与汉族结合共伸讨满复仇大义之宣言书》中，强烈地反映出蒙古民族中的

先进分子欲推翻清朝政府建立民国的决心。

总之，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在归、包各族人民中的传播，以及同盟会员和各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在这个地区大量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工作，为归、包各族人民响应辛亥革命的斗争，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三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二十二日和二十九日，陕西和山西两省又先后宣告独立。这不仅震撼了清朝政府在绥远地区的反动统治，而且大大地推动了这个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

武昌起义时，归、包地区的革命党人杨云阶、云亨、王定圻等人大多数都在外地。可是，当他们获悉武昌首义的消息之后，皆相率自北京、太原等地驰赴归绥、萨拉齐、土默特和包头一带，积极“运动军队，响应起义”。

归绥当时是绥远西部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清朝政府在这里设有绥远城将军、归化城都统和归绥兵备道。同时还驻有：满洲八旗兵、土默特蒙古骑兵营和汉军外八旗后路巡防队。汉军外八旗后路巡防队统领周维藩是个赴日本游学而归的新人物。他在日本曾结识了一些旅日的革命人士，颇受革命影响，归国后亦曾被疑为革命党人。因此，杨云阶到归绥后，除积极在军队中宣传革命外，还致书周维藩劝其反正。书中曰：“我公身统八旗重兵，缚堃岫（绥远城将军）如拾芥，取新城（绥远城）如探囊，据归化以号塞上，漠南万里悉归掌握，此千载之机，时不可失，望公振臂一挥，扫除腥秽，光我山河。”周维藩接信后沉吟不决。可是他的部下因受革命党人宣传的影响，军官或士兵与革命党人交往而倾向革命者较多，特别是青年将校中的刘少瑜、张琳、张万禄、吴金山等数十人，夙有报国之心，时见周维藩沉吟不决，皆

跃跃欲动。辛亥十一月九日，绥远城将军瑩岫亦觉形势紧迫，遂于道台衙署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应变。会议期间，周维藩也感到形势的紧迫，因此，会后即奔马回营，连夜部署，宣布起义。起义后，革命军立即撤离了归绥城，北越大青山，转赴包头石拐沟一带，与包头地区的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准备进一步联络包头驻军，集合西路部队，发动规模更大的起义。起义军的东路部队由周维藩自带转赴兴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绥远新军起义”。

包头是西北各厅之门户，驻有八旗巡防队两营。在起义之前，同盟会员云亨、郭鸿霖、王鸿文等在这里作了大量的宣传组织工作，声言革命军不日到包，号召群众响应。

太原新军起义后，山西同盟会派毛智和持腊丸书走包头，促郭鸿霖联络同志相机响应。当时在包头的革命党人郭鸿霖、杨云阶、王鸿文、王平章等即由运动当地驻军入手，积极计议起义方略。为此，同盟会员杨云阶还亲赴驻包头巡防队管带王紫绶和谢若霖处面说利害，争取他们宣旗反正。革命党人郭鸿霖、李茂林、李士元、王肯堂等人又以学董和咨议员的身份，联袂拜谒了五原厅同知樊恩庆，争取他赞成革命。事情进行得很顺利，到十二月二十二日，绥远起义的新军被欢迎入城，宣布了包头独立，并设立了地方自治筹备处，以主持革命事务。为了解决西顾之忧，革命党人又派杨云阶前赴绥西后套一带，再说大余太与隆兴昌两地驻军，一并起义。

包头起义表面上是成功了，但实际上潜藏着严重的危机。这主要是革命党人对反革命势力不但没有进行必要的清理，反而为他们的所谓“赞成”起义、“欢迎”革命等口号所迷惑，结果导致了后来的“马号事件”，使革命党人和起义军将领惨遭屠杀。当然这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软弱性和不彻底性造成的恶果。

归、包起义的失败使革命遭到很大的挫折，但是，革命党人并未被敌人的屠杀所吓倒，相反，他们又汇合了山西革命军重新北

上绥远，于一九一二年元月十二日进驻包头。三天之后，革命军又沿黄河直下，东进归绥。结果于刀什尔战役中失利，回军山西。时已民国开元了。

辛亥革命时期，归、包地区的革命党人遵照同盟会总部的指示，发动了闻名塞北的绥远新军起义和包头独立自主，并配合了山西革命军的北上。这一系列的革命斗争虽然都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政府在这里的反动势力，扩大了民主革命的影响，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另外，在这次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人播下的民主革命的思想种子和他们那种自我牺牲的革命精神，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羊 岗 子

昔日归绥市一区（范围基本是现今的回民区），最热闹的地方是北门外的羊岗子（现公共汽车站附近）。这里聚集了各行各业，每天从破晓至深夜，熙熙攘攘，四季不衰。另外，也是人们茶余饭后消遣的游乐场所，它虽不及北平天桥的规模，其性质相近，可谓归化城的“天桥”。

羊岗子商店铺面林立，饭馆、茶馆、点心铺、旅店、当铺、车马店、杂货铺等不下几十家。再者，热闹的还是摆摊卖货的和设场卖艺的。四季风味小吃，应时食品，应有尽有。剃头的，说书的、卖瓜果蔬菜的，各不相让，争相招揽顾客。有时来几伙变玩艺儿卖膏药的、演木偶戏的，掌声、叫声、笑声连成一片，热闹非凡。劳作一天的人们，来这里即可吃的痛快，也可玩的开心。由于羊岗子商人集中，于是出现了不少特殊行业，世代相传，如为买卖双方介绍生意的“牙纪”与买空卖空的“捉猴的”。

1959年，一场凶猛的洪水袭击了呼市，羊岗子的一切被无情的大水冲的无影无踪。

（优素福）

记归绥市小学教师大罢课

全慎修

一九四八年十月，归绥吃紧。国民党反动派下令归绥所有机关学校一律西撤，一些大人先生们有的已先期飞往后套。归绥市立小召小学也奉命停课，准备西迁。归绥市内一片混乱。我校老师们在一起计议，都愁眉苦脸。想到妻儿老小，要带无法带走，要留怎能抛得下工作。厮守在一起尚难糊口，一旦离散如何生活。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共产党反对官绅富豪，我们穷教员无官无产，有什么可怕。于是决定，我们不走。并且以我出面，立即通知学生回校上课。开始，校长还危言耸听，威胁我们说：

“谁不走，谁就是等共产党来。就是开学上课也没人给钱。”谁知，正在闹闹吵吵的时候，却传来消息，说是归绥解围，形势好转。于是西撤的行动都停下来，一切又陆续恢复正常。我们的校长也回到学校，仍然当校长。学校工作一如既往，堂堂打铃，天天上课，但是教师的工资却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文不见，音讯全无。当时归绥形势动荡，一夕数惊，物价猛涨，纸币狂贬，一百万元钱只抵得一元用，连金元券也只骗了一些人，不几天就维持不住，绥远省平市官钱局又出一种劣质纸印的代用钞票，落在小学穷教师们头上的命运，简直是一言难尽。为此，我代表我校教职工和校长多次磋商如何给教师发工资维持教师生活的问题，但几经恳谈，毫无答复。

直到天气暴寒年关将届时，才得到上级通知，允许向学生收费，规定每个学生交五角钱（系绥远省发行的纸币），作为教师的生活补助。我校学生全属平民子女，由于家长同情教师，

踊跃交纳，大约收起不到二百元钞票。但校长却提出他的分配方案：三分之一归校长，作为各方面的应酬活动费，三分之一作为学校经费补贴（由于经费归校长使用，实质还是归校长）；三分之一的余额按教师名额分配。我校同仁私下协议，公推我作代表和校长交涉。校长却说，这是市立五所学校的校长共同协议，小召小学不能单独变更。我当即据理力争。我说：

“我们是你刘校长聘请的，不是五所学校的校长聘请的。再说，老师们够苦的了，你们还忍心刻薄我们？如果校长坚持不变，我们就只好避席谋生，另找活路了。”最后，校长慑于全校教师的行动，勉强同意我们的意见：将全部收入作十五份平均，连校长在内共十三人各得一份，其余二份归校长，作为应酬补贴和经费补贴。这次交涉，不仅使教师每人多得几元钱，而且使老师们感到分配比较合理，比其他学校老师受压而不敢言要好得多，同时也鼓舞教师同仁们团结一致遇事敢斗争的精神。事后，其他学校的教师，都很羡慕我们，有的人也表示今后遇事和我们商量，不再忍气吞声过日子了。

一九四九年春，开学不久，我们又向校长提出如何发给积欠工资问题。那时，校长的聘书每半年换发一次，由于上半年的工资未发，因此下半年也只好继续。但谈到工资，校长却说，“我没钱，你们自己找市长去，我才好替你们说话。”于是，我们五所学校联合起来，各派一名代表，相偕去见市长。小召小学的代表是我，通顺街小学是胡存浩，庆凯街小学是郭秀岩，恒昌店巷小学和关帝庙街小学的代表是谁记不清了。当时的归绥市长是高映明。在市长接见的时候，大家面面相觑不敢说话，只是唯唯诺诺。那时见市长可不象今天，心里的是有点怕，心跳口讷手抖是可以想见的。还是我鼓起勇气把教师的意见向市长直陈。在陈述时，由于市长不断插话，因此我也据理力争，直至互相辨驳。会见并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更没有给予考虑许告别诺。

市长走到市政府的大门外，我们商议回校如何答复那些渴望得救的老师。几位代表都认为任务完成了，教师的意见已经通知市长了。我认为积欠工资分文未见，市长谈话生硬蛮横、拒不答复，任务根本没有完成。大家还责怪我，不该和市长顶撞，万一闯祸更难收拾。我只好忍着闷气回到学校。校长也许由于有点经验了，见我带气回校，就势答应说：“你们见过市长就行了，安心上课就是，工资问题，我们几个校长再找市长研究解决吧。”这次各校联合行动就算结束。可是时间是一天、一周、一月地过去，看看又是半年，盼望发放工资而度日如年的教师们，却听不到一点给钱的消息。

待到暑假过后，九月一日又要开学时，不等我们提出请发工资的问题，校长却主动向我们宣布说：“我们几个校长几经努力，毫无办法，你们还是派代表见市长去吧。”大约是校长们共同商定的，九月十二日上午各校教师都得到同样的通知，而且各校又都决定派出代表，代表人选还是前次去见市长的几个人。我仍然被小召小学的同人们公推做他们的代表，并且寄以殷切的希望。我立即想到还是我们几个人去见市长，其他几位仍不敢说话，又担心我闯祸，可是话还得我说，这任务怎么能完成？如果这次见到市长，再听市长那种蛮横的欺诈虚言应付，我们不仅一无所获，今后连校长也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这便如何是好？但我想到老师们发工资的希望成为泡影，全家老小无法生活，以及负债累累债主催逼的情景，决心这次行动要郑重考虑，要给老师们拿回几个钱才行。于是我急中生智，立即用电话通知其他四校的代表，到小召小学会商去见市长的办法。

十二日下午各校代表准时到达。我先提出：我们五个代表是肩负几十位教师，几百口人的生活重任的，我们必须考虑：什么时候去，怎么去，才能见到市长？市长不接见怎么办？这是一；见到市长，该提什么理由，才能争取到市长同情我们，答应给我

们发工资，这是二；如果市长还是虚言哄骗，又该如何是好。当时大家相对无言。我说：“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准备，没有把握，甚至没有勇气，那就是‘去不如不去’，‘见不如不见’，否则今后行事更难。”大家急着问我怎么办？我说：“前次我们去见市长之后，各校校长答应由他们负责。现在过了半年多又不负责了，这是为什么？其中必有缘故。”于是大家议论开了，逐渐谈到一是校长们一定有难言之苦，二是市长的态度一定非常顽固。如果我们去，只有碰个大钉子，不会有好结果。这时，我说：“我有个主意，今天不去见市长，先和校长们算账。”这个提议大家一致赞成，立刻用电话通知各校校长到小召小学。他们都来得很及时，于是由我出面，和校长们当面质对，并且逐个争取他们支持教师。小召小学刘丕业校长，首先表示站在教师这边，接着是关帝庙街小学赵吉忠校长、庆凯街小学的李怀清校长、通顺街小学的李业林校长，都表示支持教师，和教师采取一致行动。比较狡诈的是恒昌店巷小学的校长王德政。他先是提出不同意见，再就提出向市长请示，最后提出他母亲有病要回毕克齐去。我毫不留情地指出：“你要看清今天的形势，你母亲有病也不能走，走就和你一人算账。”其他代表也提出：“问题没解决，你不能走。要走，就得向全老师请假，暂时受点委屈吧。”他看到情况不对，勉强表示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暗地派人监视他的行动。这样一来，事态扩大了，究竟怎么办，大家都表示听我的指挥。于是，当即决定：通知市立各校教职工立即到小召小学开会。形势很紧张，校长们都默默坐着，各校教师来得十分迅速。

下午五时许，在小召小学三年级教室召开了市立五所学校的教职工大会。原定请关帝庙街小学赵吉忠校长主持大会，但由于他胆小怕事，两腿抖颤站立不住，改由我主持。我向大家讲了前次见市长和校长努力无效，以及这次又派代表去见市长预计困难

很大不会达到目的等情况，然后提出应该向北平的师生学习，必须采取行动才能争取胜利，才能达到反饥饿能糊口的目的。并建议从明天起，实行大罢课，直到取得胜利。建议博得全场教师的掌声和欢呼。经过大家商讨，做出决议几条：

1. 由我向市长递交请愿书，限期于明天上午十时前，给予答复，否则罢课；

2. 于明日上午十时，各校均由教师代表向学生集会宣布教师罢课的原因，争取学生和家长的同情支持；

3. 于明日上午十时，由各校教师代表，率领全体教职工到达恒昌店巷小学的礼堂举行集会；

4. 各校不得私自活动，保守罢课行动的机密。

各校校长分别向我表明态度，保证和教师一起行动。

散会后，小召小学的教师格外忙碌，一边写给市长的请愿书，一边安排明日会场的秩序，一边议定明日集会的程序，特别研究了保护会场防止有人捣乱的措施。并把小召小学的青年教职工都安排到不同的岗位上，以防止王德政等破坏。

下午七时许，我偕同周鹤老师到市长家（旧城大南街头道巷）。周老师立候门外，我持书进屋。市长正在吃晚饭。我说：“高市长，我受教师们的委托给市长送来一份请愿书，请市长过目。”市长取出信笺看罢，立即怒气冲冲地说：“不行，这是造反，拿回去！”我说：“我的任务是送来，不能拿回去。再说，我们也不是造反。我为什么不回家吃饭，要来找市长呢？因为我们无饭可吃，不能象市长这样有酒有菜的吃。”市长气急败坏，立即站起来，要我滚出去。我掉头不顾走出市长的家门。回家路上，我和周老师猜想，明天市长是否会答复我们。我说：“不可能，蛮横成了习惯的人，哪能对我们显示仁慈呢？只有按计划行动，给他点颜色看看才行。”

第二天，九月十三日，眼看时钟滴答、滴答地一秒一分地移

动，距离十点钟只差十分钟了，还等什么呢？于是小召小学的学生齐集广场，由我宣布罢课的决定，并请学生和家長支持我们的行动。学生们非常了解老师们的生活状况，有的掉头垂泪，有的要求跟我们一起去开会。我只好安慰他们，劝他们回家。

十时整，我校同仁一道离开小召小学前往恒昌店巷小学。刚到巷口（原中华书局门前），就看见各校教师均已到齐，聚在那里，伫候我们。庆凯街小学的郭秀岩老师，老远看见我，就跑到我跟前说：“事情不好，王德政把高市长请来了，怎么办？”我说：“不要紧，我去看看。”于是我独自前去。我刚进校门，就见王德政点头哈腰地迎接我，紧跟着的是高市长，也从办公室走出来。我概没有理睬，一直走到里院，看见预定的会场门敞开着，桌凳摆得也挺满。随后我走出来，指着王德政质问：“谁让你把市长请来，你想干什么？老师的行动，莫非你不知道？”不等他回答我就径直走出校门，招呼老师们进校。

小召小学的老师打头先走，其他学校的老师相随着陆续走进校门。我毫不畏怯，为了给大家壮胆，就和高市长紧挨着站在办公室门前，指挥大家往里走。会场坐满了怒气冲冲的老师们。王德政走进会场对我说：“市长要来给大家讲话。”我立即翻脸道：“王校长，你好不知趣，什么时候了，还要市长讲话？”当王德政碰了一鼻子灰，溜出会场后门时，没想到高市长和教育科长、会计科长相偕从前门走上讲台。这一下，使从来没见过市长的穷教员们都紧张起来。我赶紧走到前边面对市长坐下来。

高市长拿出一封信，高高地举着摇晃着，说：“这是昨天仝慎修给我送来的信，要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我当即起立，回头环顾一下整个会场，便质问他：“高市长，我送去的信是让你来给教师们训话吗？”他忙说：“不是，不是。”但还是摇着那张纸说：“这不是叫我来……”没等他说出，我立即顶住他：

“请问高市长，现在是什么时候了？”不等市长再开口我掉转头

向全场老师说：“现在已经是十一点钟了，我们要不要听市长的训话了？”全场教师轰然起立，一片呐喊：“不要，不要！撵出去，撵出去！”市长的威风扫地了，只好灰溜溜地走了。他出去后给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打电话，连声说：“教员们反了。”

撵走市长之后，我们就开会。先由庆凯街小学校长李怀清登台，算是代表几位校长表明态度。接着选举罢课运动领导，成立五人委员会，由我任总指挥，成员中包括两位教师代表和两位校长代表，并确定各校代表为各校运动联络员。同时推选到省政府去交涉的谈判代表。选举结果，由我担任首席代表，另有一位教师代表和一位校长代表。当我们正在热烈讨论如何到省政府去谈判，力争罢课取得胜利的时候，传达室送来电话消息：“教育厅的张淑良厅长打来电话，说他一会儿就来。”

不久，张厅长匆匆赶到。大家鼓掌表示欢迎。张厅长很谦和地说：“刚才董主席通知我，让我来和大家见面。兄弟来晚了，实在抱歉。”接着又说：“主席让我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我一定带回去。主席叮咛我，一定要把事情办好、办妥，请老师们多多指教。”于是会场气氛缓和下来。老师们纷纷诉说长期不发工资无以为生的穷困生活，并且申诉市长、校长们对老师们的蛮横欺压，只强迫老师们工作，全不顾及老师们生活的情况。张厅长走后，我们又约定了罢课期间的几项纪律，要求联络员辛苦负责，叮咛老师们回家随时听候行动消息。

我们几个领导人，会后编印了罢课宣言，分头张贴。紧接着接到了张厅长的电话，责问我们：“为什么贴宣言？”我们回答说：“为了让全市人民知道我们为什么罢课，而且罢课是被市长逼出来的。”张厅长无话可说，只是叮咛：“千万不要再写再印啦，不要再扩大事态，争取解决问题就是了。”从九月十四日起，我就随同归绥市政府的教育科长、会计科长等一千人到绥远省政府办交涉。从教育厅到财政厅，和张淑良，常佩三上下午谈

判，足足费了两天的时间，才答应补发三个月的工资（实际欠发整整一年的工资）。

在谈判期间，从会计科长的谈话中，我才知道，这次罢课，尽管只有五所小学的几十位教师参加，但是，支持我们罢课的却是全市所有的公教人员（包括警察在内）。凡是靠工资糊口的人，都希望我们取得胜利。他深情地说：“小全，这次罢课，你们可帮了我们的忙了，不然，我这个科长就没法当了。”

有一天，我独自回家时，在大南街二道巷迎面碰见一位警察。他问我，“你们罢课闹得怎么样？”由于素不相识，习惯上对警察素怀戒惧心理，我一时未敢答话。他大概也看出来，微笑着就走就说：“不要怕，我们支持。”

也许由于社会上有大量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的缘故，也许由于当时正在酝酿起义的缘故，我们这次罢课，总算取得成功。老师们不仅拿到几个钱，还分配到一袋面粉和一吨包头炭。更值得喜庆的是，就在我们罢课宣告结束的时候，正好迎来了绥远省光荣起义。“九·一九”这个日子，对我们教师来说，就更具有深远的纪念意义。

名言学校保合少分校及其发展概况

张秀娟 和希克

一

名言学校成立于一九三三年，校址设在归绥城巧尔齐召内。校董事有李致方、柴生华、温培英。一九三四年春，名言学校由城里迁抵农村，总校设在东郊的滕家营，名为“归绥私立名言中心小学普及教育区”。同时在保合少、塔利、奎素、讨思浩、毫沁营、黑土洼、黑沙兔、毕克齐设有分校。

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团长的刘洪雄带着党的宣传抗日，组织革命武装的指示返回家乡滕家营。一九三四年春，洪雄在私立名言中心小学担任了小学教师。此后，这所农村小学便陆续聚拢来一批共产党员，如杨植霖、王建功、胡泽润、王英杰等。他们利用教师职业做掩护，在归绥城郊开展革命活动。当时，在这个学校任教的还有范子溢、张恒、郭子文、李怀彬、于身吾、于耀原，保合少村的王培荣也在该校当过庶务。

校长李致方，又名李世魁，保合少村人，民主人士，受过党的影响，是个地方实力派人物。他常在外奔走经费，有时回校给学生讲话，在风趣的话语中隐寓着深刻的道理，因此，他的讲话极受学生们的欢迎。后来他东渡日本留学，刘洪雄就成为学校实际上的负责人。

名言学校的办学方向是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方向。借用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形式，加入了抗日救国的内容，利用学校这块

阵地，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

保合少名言学校，校址在保合少村南的老爷庙内，挂着“私立名言中心小学”的校牌。学校的大门上写着六个醒目的大字“读书不忘救国”，一对石狮子威风凛凛地守在门两边。校门两边的墙上，一边写着“收复失地”，一边写着“誓雪国耻”。学校东围墙上刷着“打开中国教育的新出路”，西围墙上刷着“劳力与劳心相结合”，“组织起来抗日救国”等大字标语。一看便知是一所新型的、进步的学校。

学校是利用老爷庙的房舍。庙内有正殿和东西禅房。东禅房是一至四年级教室；西禅房是五、六年级教室和教师宿舍。全校共有二百多名学生。名言小学虽是私立学校，但对贫苦农民的子弟不收学费。提倡农间学习，农忙劳动。设置的课程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和体育、音乐，美术；还学常用的《老少通》、《平民千字课》之类的课本。高年级加一门社会课，内容是讲近代世界英雄人物的事迹。如讲洪秀全、林肯、甘地、华盛顿等。除此之外，还上公民课，讲的是三民主义。代公民课的是胡泽润老师，在讲三民主义的同时渗入了共产主义的内容。

高年级学生除上体育课外，还上军事课，由刘洪雄和范子溢老师给讲简单的军事常识，如行军路线、救护知识、旗语等。同时进行军事训练，练习卧倒、匍匐前进、刺杀，为以后参加革命斗争打下良好的基础。

学校实行小先生制度，要求每个学生保教一至三人。除教识字外，还要传授知识和道理。被教者称为电子生，电子生也可以再教别人，再教的学生称为电核生。电子生、电核生的学习情况要经过儿童团考核员考核。有的电子生和电核生，通过互帮学习的辅导方式，识了不少字，又懂了一些道理，从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如保合少村革命烈士范才贵就是当时的电核生。

当时，老师们的生活是非常艰苦的，月薪只有十五元，一日

三餐，与住校学生同吃一锅饭，早晚稀粥炒面，中午蒸莜面。但为了拯救国家民族，老师们甘愿含辛茹苦。

《锄头舞歌》是名言学校的校歌。歌词大意是：手把锄头锄野草，锄去了野草好长苗。五千年古国要出头，锄头锄头要奋斗。天生了孙公做救星，唤醒锄头来革命。光靠锄头不中用呀，联合机器来革命。

每天早晨开寅会（早晨寅时开会，即朝会）。寅会上先唱校歌，然后总结各班学生前一天的卫生、纪律等情况，并布置当天的活动。学校废除体罚，实行自省。在校内钟楼旁有个小屋叫自省室，犯错误的同学在那里做自我反省。

周末召开周会，交替举行演讲会、故事会、生活检讨会或文娱晚会。学生在这些丰富多采的活动中增长了才干，学到了联系实际和发动群众的办法。刘洪雄老师常在周会上讲抗日故事和抗日运动问题。他言词激昂，学生无不振奋。

每天晚上，学生都上晚自习。每个学生面前一盏小油灯，一个冷水碗，睏了时，拿冷水点点眼，拍拍头继续学。晚自习后，走读生都回家了，住校生也渐渐进入了梦乡，校院里一片沉静。这时，共产党员老师、进步的老师悄悄地起来，陆续进入正殿，坐在泥塑像背后讨论形势，研究和布置工作。

每年，学校开一次运动会，吸收村民参加。双十节时，在校门前戏台广场开提灯大会。到了傍晚，学生们各自提着五颜六色的灯笼来到广场。看热闹的农民有的也提着灯笼参加这项活动。校门口人山人海，灯火辉煌，抗日的歌声响彻云霄，民众的救国情绪高涨，顿时广场内沸腾起来。通过运动会、提灯会，可以看出名言学校与农民群众的密切关系。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后，刘洪雄老师组织高年级学生到各村宣传国共合作抗日的意义，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归绥县县长亲自带人把刘老师抓走。这件事激起了各分校学生的义愤，在

老师们的带领下，各分校高年级学生徒步走到城里县政府门前请愿、静坐，抗议县里无理抓人。经过师生们的不懈斗争，迫使县政府宣布刘老师无罪释放。通过这次斗争，学生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看到了团结斗争的力量。

当时在大青山一带搞革命工作的高凤英同志也经常来校和刘洪雄老师取得工作上的联系。他那高大、剷悍、亲切的形象，在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杨植霖老师有时也来保合少分校授课。学生们清楚地记得杨老师个子高高的，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咱们农民的子弟是很聪明的，要努力用功，将来为国出力。

王若飞同志的舅父黄老先生，曾在学校住过，并给学生做过演讲。老先生抨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凶残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言词慷慨激昂，激励起学生的爱国热情。

刘洪雄、王建功等老师，利用历史、地理课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并使学生认识穷人受苦受难的原因。除了在课堂教育学生外，他们课余时间也经常和学生接触交谈，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在学生们的幼小心灵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二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刘洪雄、杨植霖、高凤英等同志，组织了“绥蒙民众抗日开路先锋队”。名言学校学生中有不少人参加了这个组织。学生彭光华为先锋队刻了印章。先锋队队员在城乡地区进行秘密的抗日宣传活动，揭露日伪的残暴罪行。

一九三七年十月，归绥城沦陷，时局紧迫。刘洪雄、杨植霖和高凤英组织抗日游击队上大青山打游击。保合少名言学校也被日寇查封。师生们有的参加了游击队，有的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有的奔赴延安学习深造，有的销声匿迹当了农民。这所名震

归绥东郊的学校就此暂时关了大门。

一九三八年八月到十一月，名言学校毕业生杨培林、余平、张旭、彭光华等，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南平川支部。杨培林任书记，余平任组织干事，张旭任宣传干事，领导群众开展秘密的对敌斗争。群众基础就是原来的电子生、电核生和保合少村广大的农民。随着活动范围的扩大和斗争的深入，在南平川党支部的领导下，组织了“绥蒙抗日救国会”，配合大青山游击队，开展各种抗日活动。

名言学生余平最近回忆道：“一九四五年，我从延安回来，任归绥县二区区委书记时，张达志师长让我拆除村中日本军修筑的炮楼。一夜之间，发动原来的名言校友和基本群众拆毁了炮楼。”

名言学校被日寇查封后，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期间，保合少村的教育是由私塾来填补的。

日伪时期，伪政府下令各村学校一律使用日伪课本，并派督学定期前来检查。当时村里有两位私塾先生，一位叫贾怀宝，另一位叫张二先生。他们和保合少村的居民受名言学校的影响，对日寇痛恨至极，都不甘心做亡国奴。学生们为了哄骗敌人，每人也备有一套日伪课本，但不学习它。他们在私塾老先生的指导下，沿用我国传统教材，学习《四言》、《大学》、《中庸》、《上论》、《下论》、《孟子》等古文。为了避免督学的检查，学生将日伪课本明放在课桌上。督学来校查看时，将诗书藏起来，马上翻开日伪课本，佯作学习的姿态。因此，学生们未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奴化教育思想的毒害，相反纯朴真挚的爱国抗敌的高尚品德在他们的头脑中扎下了根。

三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

归绥县县政在其所属各乡开办了学校。当时，保合少叫义贞府，因此，学校的名称亦随之称为“义贞乡中心小学”。校址迁到村中心地带的西恼包前的大院内。这是当年的日伪据点。党组织通过关系，将一直在保合少村搞地下工作的李怀山同志，安排在“义贞乡中心小学”担任校长。学校教导主任是姚佩，教员有张恒、尹惠如、文宝、胡月贵等，有学生三百多名。中高年级的学生年龄都比较大。他们有的是从私塾转学来的，有的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而来求学的。

李怀山校长，利用课堂或全校集会，经常向学生进行反内战教育和讲劳动创造世界的观点。有时还领导学生发动群众同地富作斗争，开展破坏敌人强迫农民募捐、纳税、抓壮丁等活动。这些举动，引起了当地国民党乡政府的不满。古力板村大地主刘文壁，保合少村地主武中贵，勾结地方上的反动势力，联名告李怀山道“共匪”状，从而导致了四七年秋季李怀山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案件。李入狱后，姚佩负责学校工作。一九四八年张恒又接替了姚佩，担任该校校长。

一九四九年春，保合少村地处国共两党拉锯地带。在形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学校不得不暂时关了门。

四

一九五〇年春，归绥地区的农村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减租反霸及土地改革运动。在此大好形势下，在归绥县人民政府的关怀与支持下，保合少村完全小学也正式开学了。解放后的第一任校长是张宝琛，教导主任是张恒，教员有钟振业（已于八三年病逝）、李西河、钟秉钧、刘梓（现在毕克齐医院工作）等。

学校积极配合土地改革运动，组织了儿童团、秧歌队和文艺宣传队。儿童团员臂带袖带，手握红缨枪，在村头、路口盘查行人路条，严防地主逃亡和坏人流窜。为了配合当时党的方针、政

策，结合当地斗争的实际，秧歌队和文艺宣传队编写了适合时局需要的节目登台表演，对运动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有效地推动作用。学校每到课外活动时间，歌声嘹亮、锣鼓喧天，真是一派欢欣鼓舞，充满活力的景象。

一九五一年，学校的大龄学生，响应党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争先恐后地踊跃报名，自愿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昔日为怕抓壮丁而左躲右避，今日为国为家主动应征。被批准参军的同学胸带大红花，英姿飒爽地骑上高头大马，在一片欢送的锣鼓声中，奔赴抗美援朝的前线。

翻身后的农民，由于饱尝了旧社会睁眼睛的苦处，因而迫切需求学习文化。除儿童团包教包学外，学校还办起了农民夜校。每天晚饭后，年轻的后生和姑娘以及媳妇们，每人手里拿着识字课本，急匆匆地走进教室，专心致志地认真学习。甚至有些中老年农民也络绎不绝地走进校门，悄悄地坐在教室里，倾听教师的讲课。学校的老师，白天在校教学，晚上义务扫盲。

这期间，原呼市市委书记文精同志，正在保合少村小学读高级小学。毕业后升入中学，进而考入北京中央民族学院深造直至毕业。在民族学院读书期间，他曾因病休学，于五九年还回到母校任教一年，给师生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一九五九年夏季，连日倾盆大雨，再加上校舍年久失修，教室漏得不成样子，有的干脆倒塌下来。秋季开学时，为了不影响正常的教学工作，学校只好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把学生分散到各个生产队的食堂里，继续上课，从未因无校舍而停课。

一九六〇年经上级批准并拨款，选定村南原名言学校的东侧修建了一处新校舍，即现在的学校。原来名言学校门口的一对石狮子，也随之移到了新校门口的两边，面南背北，威然守护着这所古老而年轻的学校。

文革中，保合少小学也毫无例外地受到冲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逐步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教师也不例外，家属同样承包了责任田。这在客观上给教学工作带来了问题。书教好了，地荒芜了；地种好了，人才却荒废了。教学和种田产生了矛盾，但保合少小学并没有被这对矛盾所难住，在学区的积极倡导下，经反复讨论、调整，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采取了农忙时合理、适当地安排农忙假；农闲时，延长教学时间的办法，解决了这对燃眉之急的矛盾，保证了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

建校五十多年来，校长、教师一批批调换更迭，学生一届届毕业。总共毕业学生两千多人中，或继续深造，或奔赴工作岗位。他们有的已担任了各级政府和部门的重要领导职务，但绝大多数是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着，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起着不可缺少的螺丝钉的作用。

托县县立第一完小的建立与发展

杨立中

托县官立高等学堂自一九一〇年（清宣统二年）成立到一九五〇年历经四十个春秋，曾三易校名，十易校长，共毕业三十个班，每班学生以四十名计算，共毕业学生一千二百余名。

首任校长刘耀（字长庚，本县补还岱人），是远近闻名的博学之士，与大岱赵英、两间房李三太保等齐名。先生办学热诚，宣统二年间在变法维新的影响下，与托城有“洋学生”之称的杨捷三、外地人孔先生共同办起了托县第一所官立高等学堂。当时校址设在洋人巷耶稣堂遗址内（耶稣堂在正街新建）。经过改修，计有大教室三个，教师办公室三间，传达室、库房各一间，还有男女厕所等。

当时虽然科举已废，但对学堂之国文、算术、自然、常识等学科人们还不甚理解，所以家长不愿送子女进学堂读书。社会上还存留着男的留辮子，女的缠足等弊俗。一般家长尚有保守思想，把够入学年龄的蒙童，送入私塾就读。当时，托县城内有私塾四座：南头五道庙内有姓卜的老先生，后街有王老先生，前街有杜淑林老先生，北头有姓赵的老先生。他们所教的书是杂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四言、七言，朱子治家格言、弟子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

初开办时，学生年龄较大。他们为了到绥远深造才到高等学堂上学，学校无形中便担任起初级教学的任务。当时学堂的课

，程除国语、算术、自然、历史、地理外，尚有古文释义、幼学琼林。开设古文符合学生家长的心理，因此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全校约有学生七十名，无班级之分。学生有王尚廉、王尚清、刘清、曹明、曹富、王明表、贾启瑞等。

一九一七年，刘琳（托县帐房坪村人）从绥远讲习所学习归来，接替刘耀担任了校长。时学校重新整顿，安排曹富、曹明为教师，开设学科仍照前不变，并给学生开讲《孟子》，深受家长欢迎。全校有学生百余名，只有高年级。

刘琳校长热心办学，领导教师、学生上街开展民众教育宣传。内容是破除迷信、解放小足的好处。并带上地球仪讲解日蚀、月蚀的道理，有时还去河口宣传，一些老年人至今记忆犹新。

一九二一年，在劝学所所长卢植甫、职员刘清、王尚廉（兼任天足会会长）、王明表、王子仁等支持下，刘校长到北京参观学习。他从北京购回新图书，还给河口各校一同购置了铜鼓、铜号。每到节日开会，各校学生整队到街头，鼓号齐鸣，大显声势，气象不凡，于是学生日增。此时，全校有学生一百五十名。学生有杨令德、刘桂、霍世休、耿正模、李显、乔殿重、耿正范、霍世昌、王世重、王世亮、武绍文、董怡、薄玉璧、卜万金等。由于学生增多，学校名称改为“托县县立第一小学校”。

由于刘校长办学有方，辛勤工作，学生成绩突出。先后报考归绥中学的学生有吴桐、焦守显、焦保国、杨令德、刘桂、霍世休、耿正模、李显、乔殿重、武绍文；报考师范的有耿正范、王世光、霍世昌、董怡、薄玉璧、卜万金等。

一九二三年，刘校长因体弱多病、劳累过度回家养病，一病不起。校务先由曹富代理，不久，曹富就成为正式校长了。

曹富任职后，由于学生日增，开始分班建制，全校分为五、六、七三个年级，又增聘教师焦保国、刘继汉、郭勋。此时学生

中有王德谋、杨继善、鲁华、鲁雅、鲁文科、王宝山、高泰成、岳令信、邹邈、范文孝、马潭、马显、马相。胡莲、惠德芳、郝培功、刘汉兴、刘开补、马凌云、王巨源、李成、阎真如、刘兆金、刘兆义、李广等。

一九二七年在清真学校（一九二六年成立）的一批初年级学生也到一校上学。此时，一校中高年级有四个班，学生共有200名左右。为了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曹富校长又新聘杨令德、耿正模、刘桂、杨沛、曹明等到校教学。课程设置有：国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常识、英语、卫生、音乐、图画、手工、体育等。此时学生中有：武达平、吴业、霍世忠、霍世臣、吴荣、杨立中、高步义、徐玉璧、王广统、杨映微、李秀庭、袁尘影、袁福印、李贵、王在邦。女生有田金梅、李彩霞、贾兰芳、王秀英等，可谓气象一新。女生已都是天足了。每天下午课外活动时由耿正模老师带队到南滩操场做体操或游戏活动。

一九二八年绥远师范学校一批五年制毕业生回县工作，王世重任了校长，刘瑛担任国语、英语教师。他们生气勃勃，施展所学。并聘师范讲习所毕业生薄玉璧、卜万金、杜永一和师大毕业的乔殿重（字子英）、中国大学毕业的李显（字映宏）当教师。加之原有的教师曹明、焦保国等人，真可谓人材荟萃。学校管理大有改进。教学上采取启发诱导，避免体罚，分初、高级班上课。到一九二九年，王世重另有高就，离校到绥。

一九二九年教育局委派刘清接任校长，教员未加更动。此时，县城私塾已陆续停办，学生日增，原有教室、校舍已不能容纳，校内办公室已改作教室，势必另建新校舍方可。到一九三〇年，老校长曹富到教育局任了局长，马上着手筹措经费，经过三年时间，于一九三三年新校舍建成（即现在的城关中学校址）。原洋人巷旧校址女校迁入。新校舍共有三排，有教室六个，另有办公室一个，教员室、游艺室、传达室、库房共六间和男女厕所

等。特别是校门采取教堂西式建筑，校门上方两侧，有名言两句，模雕砖壁上。上联为“顺应世界潮流”，下联为“采取适当教育”。据说是曹富老先生所书，至今见者仍赞赏纪念。

一九三六年教育局撤销，曹老先生回乡务农。刘蔚校长到县任教育科长，所留校长一职由归绥中学毕业生吴业接任，教师队伍重新调整。教师中有归中毕业的王德模、边守墉、潘恒万、赵存政、徐玉璧、郭永丰，还有中山学院毕业的张贞等人。七七事变后，女校停办，校长张应富（字厚庵），教师田金梅（女）、李兰玉（女），均到一校任教。此时全校有六个班（1—6年级）。学生中有王凤栖、马藩、韩振誉、张汉璿、张亨凯、王光明、王尚礼、王锦等。

一九四一年，校长吴业与教师李兰玉离校结婚。校长职务由张应富接任。此期间，托县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之下，所设课程除加一门日语外，汉语内容亦是不成文的所谓“大东亚共荣”、“中日同文同种”、“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等骗人的言辞。教师整日过着战战兢兢的生活，随时有被特务暗害的危险。

一九四四年，张应富调到县公署工作，校长一职由刘秉仁接替。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日伪投降。校长一职又由抗战胜利归来的国立绥中学生田生亨担任，然不久就因故离去，校长由教育科长张应富暂代。

一九四七年三月，县长王怡委派我到一校接任校长。我是在“七七”事变时由绥远省立师范高师一班毕业的。我到校后，认为要办好教育，必须有好的师资，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所以，聘请了教师卢文旭，韩发祥、乔殿勋、孙殿邦、李福、荣芳、张映亭、段雨英（女）、徐文秀（女），白玉莲（女），王广明、王廷勋、张亨义、李芳等。他们均是从事小学教学多年，很有经验的老师。四七年时全校只有一至六年级六个班，经教师的共同

努力，到解放初已成了十二个班（一至六年级双轨制）。学生猛增到五百多名。这时校名改为“托县县立第一完全小学校”。

校建立有年，培植过大批成长中的青少年，也出了些名人，如：吴桐，赴南京打擂获奖，曾任绥远省国术馆馆长，解放后任内蒙古政协委员；杨令德，曾任绥远省民国日报社总编辑，解放后任内蒙古政协副主席；阎真如（加勒），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武达平，任内蒙古党委统战部副部长、内蒙政协副主席；张斌，任内蒙医学院中医副教授；焦守显，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任国民党绥远省党部主任，后赴美留学，在抗战时期任大学教授；霍世休，曾任绥远归中校长；刘汉兴，投考黄埔军校，后任团长，抗战时奉令到长城各口配合傅作义对日作战，后任台湾国民党将领，委金门岛司令官。但绝大多数毕业生是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为祖国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教坛勤耕耘 正气育英才

——回忆宋志刚老师

王钰 赵甫 王娅丽

宋志刚(字介之)是原绥远省教育战线上一位颇有影响、颇受尊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在有生之年,辛勤劳作,呕心沥血,舌耕于教坛,为祖国塞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培养了不少优秀人才,其中有的在我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中担任了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工作。他的学生,绝大部分战斗在祖国各条战线上,勤恳地工作着,做出了优异成绩。

宋老终身勤奋好学,知识渊博,在政治上追求进步,崇尚真理。他为人耿直,举事清廉,刚正不阿,嫉恶如仇。这种难能可贵的品德,永远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

一、苦难童年 刻苦求学

一九〇〇年,宋志刚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天成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父亲秉礼,因终年劳作不得温饱,身患重病年仅四十多岁,就离开了人间。母亲带着三个年幼的儿子过着缺衣少食的苦难生活。贫困交加的家境,灾难深重的国情,给宋志刚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痕。他多么希望祖国富强,穷苦父老过上美好的日子。

一九〇六年,六岁的宋志刚,由于晚间常常听母亲讲古代苦人苦学成才的故事,什么“负薪”、“挂角”、“囊萤”、“映雪”等等,深深触动了他的幼小的心灵,为此他请求母亲让他到本村私塾去念书。但家中连糊口都困难,怎能供他念书?宋母是

一个仁慈、宽厚、贤淑的人，为了满足老二求学的愿望，便与考父担起了生活的重担，东挪西借，想尽办法，终于送宋志刚入了私塾。

年少的宋志刚天性聪明，记忆力特强，又勤奋好学，《百家姓》、《三字经》、《四言》、《七言》、《千字文》很快便能背诵，引起私塾老秀才的重视。老秀才也特别喜爱这个性情憨厚、勤学上进的学生。此后私塾又改在十多里外的一个村里。宋志刚夏秋都徒步走读，一天往返二十多里，从不叫苦逃学。冬季天寒地冻，就住在私塾火房里。每隔十天半月，由他那多病的大哥送些黍面粗粮充饥。按照旧习惯规定的必读书《四书》、《五经》外，他还另选读了一些古文、古诗，培养了自己阅读古汉语的能力。通过学习，他懂得了古人自强不息、奋发努力的道理，更进一步坚定了学习的信心。

一九一五年，十五岁的宋志刚考上了察哈尔区张家口第一中学（当时凉城县属察哈尔管辖）。张家口一中对学习成绩优良的贫苦学生给以奖学金补助，宋志刚入学考试成绩很好，在校期间，他一直享受奖学金。在四年来的中学阶段中，他在班上学习成绩始终名列前茅。特别是文史成绩，班内同学无与伦比。历史教师，更加喜爱他。几年来在教师的指导下，他除了系统深入地钻研了大量中外史地著作外，还阅读了《儒林外史》、《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鲁滨孙漂流记》等。他在参加学校举办的讲演比赛中以优异成绩，得到了好评。他是校内有名的刻苦学习的优等生，因而后来他在师大毕业后，学校曾请他返校担任教务主任。他关心国家命运，经常阅读报纸，知道了辛亥革命。他敬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认为中国革命从此有了光明前途。

一九一九年秋中学毕业后，宋志刚考取了公费待遇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史地系。当时全国仅有国立大学十三所。察哈尔特别行政区及凉城县对考入国立大学的学生，各发奖学金一百元。当

时伙食标准一般每月五、六元，他节衣缩食，除购置必用的图书外，还将剩余的钱给家中生活急用。当时同学们称他“宋土包子”、“宋老西”（他的老家是山西），耻笑他是山西人，但他却不以为意，一笑置之。

在数年的大学生活中，他躬身投于范文澜、陈垣、钱穆、顾颉刚、郑天挺、沈兼士、王桐龄、邓之诚等名教授门下。他大量攻读经史，研读《史记》、《汉书》等史籍。他对《资治通鉴》特别喜爱。王桐龄教授是他的指导老师。王教授特别喜爱这个勤学苦读的得意学生，指引他学习方法，告诉他历史学浩如烟海，一个人的精力有限，除了全面系统地学习外，重要的是应该选择专题深入研究。王教授私人藏书很多，宋志刚随时可以借阅。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期，随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斗争的深入发展，新文化运动的主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代替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民主口号。这时的宋志刚如饥似渴地阅读李大钊、陈独秀等在《新青年》、《每周评论》上介绍《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俄国革命问题等论文，从中知道了要使中国富强，只有走俄国人民的道路。当时北京是“五·四”运动的中心，北大、师大等几所高等院校又是“五·四”运动的主力军。当时学生运动八大代表之一的熊梦生是宋志刚的同班同学，对他影响很大。师大学生们的讲演会、讨论会、派代表请愿、打电报发宣言一系列革命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在革命洪流中，他受到很大教育。

宋志刚大学毕业后，专门租了黄包车（人力车），把大学毕业证书贴在车身上，跑遍北京重要街道。车上贴着标语——“大学生毕业就是失业”。沿途群众围观，纷纷议论，传遍了北京。这一行动，引起了反动政府的不满，曾派人去师大了解他的情况，并要逮捕他，但又害怕引起学潮。后因宋志刚已毕业离校，也就不了了之。

此后，他又考取了教育部东洋留学生，但由于家境贫困，为了弟侄等外出求学，再加以不少学校聘请他任教，因而放弃了这一难得的机会。

从一九二三年(二十三岁)起，为实现宏愿，宋志刚手执教鞭乐育英才，开始了教学生涯。他初期的教学思想，正象他自传中所说：“周游各省，广收门徒，多处任教。一者可深入社会，以广见识；二者可更多更广的培养人才，为教育事业做出贡献。”他前后在绥远中学、绥远师范（任校长）、绥远中山学院（任训育主任）以及区外不少名牌中学如河北省立十六中学（宣化中学）、察哈尔第一中学（任教务主任）、山东第一中学、陕北榆林中学、江苏海州中学、天津南开中学任教。这些学校聘请教师特别严格，当时在绥远的大学毕业生中，能在省外学校任教者还只有他一人。在旧社会教育落后，绥远省只有一所中学，一所师范，毕业即失业，非学习成绩突出者很难受聘。

二、辛勤育人，同情革命

一九二三年宋老师受聘于河北省立十六中学（宣化中学），任历史教员。该校在教学质量上、校风上要求很严，成绩显著，已成为华北久负盛名的优等学校。它每年的毕业生，大多考取国立北洋大学，时人称宣化中学是北洋大学附中。当时校长是李大钊的弟弟李大本先生。他思想进步，作风民主，具有革新精神。该校聘请教师，必须是具有真才实学者。宋老师是经过北师大推荐，到校后又经过校长听课两周后才下聘。李校长对这位有胆有识的青年教师很器重，很快就成了他依靠的得力助手。

该校开创男女合校之先例，当时在宣化这个封建伦理道德依然禁锢人心的偏僻小县，这种做法是离经叛道的。为此遭到地方顽固势力的激烈反对，但李校长同宋老师一道，力排众议，开创了先例。

“中正忠诚”是在宋老师参加下制订的校训，明确指出了学校的培养目标，鼓励学生刻苦学习，争取做忠诚正直的有为青年。

宋老师在该校任教时的学生秦丰川、张愷然先生回忆说：“宋老师备课很认真，经常在深夜熬完一支蜡才睡觉，因而学生叫他‘一支蜡’。他讲课时重点突出，条理分明，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常常是妙语惊人。他知识渊博，熟悉教材，从不照本宣读，而是如龙戏水，深入浅出。学生最喜欢听他的课，称他为‘活历史’。他为了使学​​生便于记忆，将一些人名地名或口诀。在讲到重大问题时，旗帜鲜明，观点明确。他讲到苏俄十月革命时，课本标为‘十月社会暴乱’他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十月革命和我国辛亥革命一样，推翻了反动沙皇政府。十月革命成功后，首先宣布废除沙俄对我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暴动政府？教科书不修改，待到何时？他对列宁（当时译为李宁）十分敬佩，详细介绍了列宁的历史及十月革命的经过。”

宋老师在此期间，负担着他三弟宋友良，侄子宋守道（宋乐天）在宣化中学上学的费用。他出身寒门，生活俭朴，衣着十分朴实。当时人称他为“宋老赶”。他同时对贫苦学生也给予帮助。秦丰川同志说：“恩师宋老早年在宣化中学时，不仅在知识上培养了我，同时在经济上也接济了我，我终生也难忘。”

由于李大本在学校的大胆改革，引起了反动政府的不满，乃于一九二五年底被调离学校，另派耿肇林任校长。耿将“校训”、“校歌”全部废除。宋老师对此异常气愤，辞职离校。同年张家口一中约请他回母校任教务主任。第二年又在山东一中任教一学期。

一九二六年秋，宋老师应陕西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之聘到校任教。杜斌丞烈士和宋老师是北师大同学，彼此有较多的了解。

据安吉人同志说：“抗战期间，陕西成立北师大同学会，当时杜老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担任了同学会理事长，工作很多，还向我问到宋老的情况。”可见他们的友谊之深。榆林中学，号称陕西革命“摇篮”。这所学校教师多是杜老聘请来的思想进步，不满现状，要求革命的民主人士。当时北师大同学杨明轩同志也在榆林，他们之间经常往来，过从甚密。宋老师在此二年的教学生活中，受到党的教育与革命影响。据他讲，他在榆林中学时，正处在国共合作时期，该校教职员、学生中共党员、青年团员为数不少。著名的陕北革命领导人刘志丹、马明方、谢学长等都在该校学习。当时，校内进步活动异常活跃，师生中讨论会、报告会习以为常，对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国为什么贫穷落后，孙中山为什么主张向苏联学习等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一向酷爱真理，追求进步的宋老师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他从“五卅”运动的宣传材料，广东革命政府的发展，国共合作的情况，北伐军的胜利中，受到革命的教育。在榆林中学二年的教学生活中，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变后，榆林中学的革命活动转入了地下，不少师生离开了学校。一九二八年杜斌丞先生被迫离开学校，宋老师也辞职，受聘于江苏海州中学。

一九二九年，察哈尔将凉城、丰镇、集宁、兴和、陶林五县划归绥远省。当时绥远教育厅邀请宋老师返回桑梓办学，并任命他为绥远省立师范学校校长。那时绥远还没有一所高等院校，师范学校是培养中等师资的学校。他决心为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吸收了宣化中学和榆林中学民主办学的经验，提倡学术自由，在教学上不受课本的约束，可以自由发挥。同时，聘请进步教师张富担任语文教员，张光远任语文专职教员，给学生上课。当时学校规定，每星期一上午举行总理（孙中山）纪念周。宋老师向师生宣讲总理遗嘱以及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等，教育师

生。他针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破坏孙总理“联苏、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反革命罪行，指出孙总理的信徒一定要照他的遗教去坚决贯彻，否则就是总理的叛徒。

宋老师对贫苦学生异常关心。一九二九年，绥远遭到重大自然灾害，赤地千里，米珠薪桂，广大人民饥寒交迫。当时在校学生杜如薪因生活困难，多次提出要求退学。宋老师劝他暂时休学，情况好转后再复学。杜如薪同志迄今不忘宋老师对他的爱护。他对学生严格要求一视同仁。当时，教育厅长张钦的次子张某，因触犯校规，他力主处分。别人对宋老师讲，可否从宽处理？宋老师说：“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结果张某被除名。

当时，绥远省国民党以潘秀仁、赵允义、陈国英为首的CC派和以祁志厚、焦守显为首的改组派之间的斗争，异常激烈。国民党的省、市、县党部的领导及其组织成员绝大部分是绥远中学、中山学院、师范学校毕业及在校学生，因此斗争场所就是这几所学校。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的几年之间，几乎每年都有学潮，逐校长、赶厅长，把青年学生作为他们的斗争工具。教育厅从祁志厚、张钦、潘秀仁、阎伟就四易厅长；校长更换无法统计。一九三〇年，张钦被赶下台，因师范校长宋志刚和他是凉城小同乡也被赶下台。由于宋老师在师友中经常痛骂国民党利用无知学生给他们做工具的卑劣手段，为此被扣上“拿国民的经费，反对国民党，在学生中搞赤化”等罪名，而被逮捕。此一事件发生后，引起了舆论界的责难，反动派被迫释放了宋老师。宋老师对绥远教育前途掌握在一群党棍手中感到失望。一九三一年他受聘于天津南开中学。这所学校是全国有名的学校之一。校长张伯苓是国内知名的教育家，比较开明。他不怕风险，只要是学有专长，有教学经验的，就聘请。

一九三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

了我东北三省。一九三二年，日寇又发动了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平、津、上海等地的工人学生革命群众，罢工罢课，游行宣传。接着北京学生提出向南京政府请愿并开始行动。宋老师在北京师大读书的侄儿宋乐天（地下党员）是这次运动的积极分子，他给宋老师叙述了南下请愿的情况。宋老师听了异常激动，说：“只有青年学生，才敢于向卖国政府请愿。”他决心仍返家乡，为挽救民族危亡，为抗日救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此时绥远中山学院院长白映星邀请他回绥远。一九三二年他回到归绥，接任了该院训导主任。当时绥远各校学生和全国一样，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中山学院学生也停课组织宣传队在街头宣传抗日救亡，为义勇军募捐，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誓死不做亡国奴！”的口号。宋老师积极支持他们的行动。宋老师和白映星友谊较深，白住在校外，学校一切重大校务大半由宋老师主持。

宋乐天原在北师大学习，后转入北平大学法商学院学习。他早已参加地下党，并在刘仁同志领导下工作。他曾将被通缉的南开大学进步学生周瑞波掩护在宋老师家中，很长时间才离去。

一九三三年二月，在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下，中共归绥县中心县委成立，杜如薪同志任书记。在中心县委领导下组建了反帝大同盟绥远省委。不久，中山学院反帝大同盟小组成立。小组成员有武达平（任组长）、任子良、安吉人。小组决定将学生会抓到手，争取合法斗争。当时学生会由国民党员高三班学生何××、白××把持。小组征求到宋老师的支持，改选学生会。事先做了大量的工作，布置掌握选举，将拟好的名单事先经宋老师批准，就这样将武达平、任子良、安吉人、杜璉、宋守德选为学生会成员，组成了新的学生会。接着又进一步研究成立绥远学生联合会，并与绥中、女师学生会联系，准备在“五·四”青年节召开全省大会。

他们为了进一步联系群众，扩大政治影响，在学生会领导下，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读书会），将研究会章程由安吉人同志送请宋老师批准。会前发动师生参加，并贴了宣传公告。在一个下午，借了会场，召开了成立大会。到会人数三十余人。其中教师有宋志刚、王文光、苏谦益及教务主任沈子韶等。学生会成员都被选为社会科学研究会负责人，并请宋老师、王文光、苏谦益作为研究会导师。宋老师在会上讲了话。他说：“这个会很好，读书不忘救国。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不要‘两耳不闻窗外事’。我们绥远已处在国防第一线，我建议你们先读一下鸦片战争后的历史，认真读一读！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知道我们被列强侵略的历史，愧对我们的祖先……”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绥中反帝领导人杨叶澎、韩燕如在洋车工人中宣传抗日，帮助工人成立工会时被捕。次日早晨在中山学院附小任教的苏谦益同志被捕。接着警察局派人去中山学院要抓安吉人。宋老师将安叫到他家，躲在他奶母床下，对警察局的人说安已于三月前请假回家，又拿出他事先填好的请假簿让他们看。但是相持不下。宋老师说没有省政府的公函不能随便进校抓人，影响校内秩序。深夜，宋老师带安到院长办公室，事先已将住在校外的白映星院长请来。白院长对安吉人说：“我们研究决定送你出校。”于是让安穿了王文光老师的西装，戴了眼镜，化装成一名教师，和不少教师一同出校。安去了凉城乡下亲友家躲避。第二日上午，武达平、任子良相继来到宋老师家中，商讨如何应变。宋老师说：“你们学生会的人，最好出去躲躲为好。”最后他们穿了破旧衣服，化装出走。后来风声不紧，他二人在宋老师的保护下重新返院复学。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京爱国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全国学生纷起响应，罢课游行。宋老师对此无比兴奋，认为中国有了希望。他得知在清华大学学习的女婿郑天翔、北平大

学的侄子宋乐天、医学院学习的弟弟宋友良以及在北师大的学生安吉人等都是“一二·九”的积极分子，非常高兴。寒假期间，宋友良、宋乐天回到归绥向宋老师叙述了“一二·九”详细情况。宋老师说：“我是“五·四”运动的学生，你们是“一二·九”运动的学生，两次学生运动，两代人，都是针对日本侵略者的。青年学生最有觉悟、最勇敢、最爱国，总是走在时代潮流的前边。国家的前途命运，都寄托在你们青年一代身上。”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间，傅作义将军领导的百灵庙抗战胜利。全国各地组织了慰劳团。宋老师的女儿宋汀参加了齐鲁大学慰劳团，安吉人参加了旅平、津的晋察绥三省慰劳团来绥远。安吉人对宋老师详细介绍了他们在太原先后见到了阎锡山、赵代文（山西省主席）及所谓的“华北四省剿匪总指挥”陈诚的经过，提出了不少有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宋老师听了说不出的高兴，认为他们是代表民意，向当局表达了人民在国难当头的重大意见。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宋老师对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行动积极拥护。认为蒋介石阵营内的军人能有这样爱国举动，对蒋介石反动集团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无疑是个很大的打击。他从党的地下刊物中知道了周总理等党的领导同志在解决“西安事变”中执行党中央政策的重要意义。宋老师说：“共产党在国难当头，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不记蒋介石多年屠杀围剿共产党人的仇恨，释放蒋介石回南京，并提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战的主张，共产党是多么伟大呀！”

三、抗日救国 投笔从戎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芦沟桥事变。绥远省主席兼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奉命率部支援前线。绥远的一些达官贵人纷纷逃窜。那些终日唱高调忠于“党国”的政客

们，有的拱手迎敌，认贼作父；有的西逃兰州、西安、成都等处。绥远人民，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斗争，组织了抗日游击队和民众抗日自卫军，保家卫国。宋老师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抗日自卫军。自卫军的领导及各级组织成员绝大部分是他的学生和同事，利用他的声望，请他担任了不拿一文钱的参议。于是他将家搬回凉城，自己深入绥东，奔走于大青山、蛮汉山、归绥、武川、陶林、丰镇、凉城等地。令人愤慨的是，正当抗日局面初开之际，国民党反动派却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企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自卫军中的顽固派也与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制造磨擦，破坏抗日部署，分裂友军之间的友好关系。此时宋老师坚决站在我党的立场一边，积极参与并配合八路军大青山游击队的斗争。

一九三八年，他和武达平、鲁平等同志一起在绥东卓资山地区进行策动伪军于志谦的工作时，不幸被人告密，遭到日寇的逮捕，被押于当时集宁县日本宪兵队。他整整苦熬了一百零三天的牢狱之灾。无数次的严刑拷打，煤油、辣椒水从鼻孔中灌入，惨无人道的刑法使他死去活来。当时日本宪兵队小村队长拷问他：“你的，为什么反对皇军？”宋老师义正词严地回答：“我爱中国，你们日本人也爱国，如果你们的祖国被人侵犯，你们会怎样对待？”最后通过宋老师的学生孟炳献找到了翻译，在鬼子面前为他想法子周旋、解脱；宋母又让外甥赵守成想法给汉奸、特务、翻译送礼，用了五百大洋才得到释放。宋老师被接出宪兵队后，全家老小均在集宁桥东三马路暂住。此时家中的东西，连同归绥存放的一些金属器皿和宋母保存的出嫁时的金银首饰，全数典当卖光。家中已一贫如洗，只好求得亲友接济生活。宋老师身受摧残，伤痕遍体，真是贫病交加，实在令人心酸。

宋老师是一个性情刚强而有民族气节的人。他对亲友们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痛斥那些作威作福的汉奸特务是一

些民族败类，忘了他们是中国人，是一些有奶便叫娘的无耻之徒。

一九四一年冬天，他回到凉城天成村，为家乡父老办起了私塾。教起《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三言》、《五言》、《七言杂字》、《大学》、《论语》、《孟子》、《诗经》等。宋老师讲：“宁愿叫娃娃们读五经四书，也不学那些奴化教育的日文课本。那些是毒害青年的。”那时伪教育局，把日文课本强行卖给学校，并且常派什么“督学”监视学校情况。为了应付局面，宋老师让学生也准备一套日文课本，一旦什么“督学”来了，让学生把日文课本，放在书桌上。“督学”走后，再进行私塾教育。后来，村里人发现汉奸、便衣多次在村里窥听监督宋老师的行动。他的安全又受到威胁，村里父老劝他到外地避避，以防再生不测。从一九四二年起为逃避迫害，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他漂泊绥东各地，全家曾九次迁徙，先后在老平地泉、卓资县、陶林等荒僻农村教书度日。在这期间，武达平等游击队领导人也先后到家看过他。

一九四五年八月，历经了八年的抗日战争在我国人民浴血奋战中赢得了胜利。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宋老师喜欢得访亲探友奔走相告。晚上阖家团聚，喜谈胜利。他整夜睡不着，回想八年艰苦抗战，人民备受艰辛，今后人民应该过和平民主的日子了。

但现实又使他失望。国民党反动派窃夺了胜利果实，在美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的帮助下，对沦陷区的人民进行了无比残酷的掠夺。真可谓“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四、奔走起义 参加革命

一九四六年七月，蒋介石集团挑起新的全国性的内战。宋老师得知女儿宋汀、兄弟宋友良、外甥女婿安吉鸿都参加了解放战

争，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同年宋老师担任了原绥远省教育厅科长。当时各级学校动荡不安。归绥市的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异常猖狂，捕教员、抓学生的事时有发生。绥远省国民党“军统”、“中统”知道他的亲属是共产党，经常监视他的言行。多次想以“通匪”嫌疑逮捕他。但慑于他在绥远教育界的威望没敢下手。

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愿接受我党的号召和平起义。但蒋介石派其亲信徐永昌等人来绥策划破坏。绥远省国民党内及军内一些蒋帮走卒上下勾结，造谣助澜，造谣中伤，破坏起义，其中从北京、天津逃来的不少特务、匪徒，兴风作浪，甚至发生凶杀、打黑枪、杀害我谈判代表的事件。当时留在归绥的各级干部及地方人士，由于长期以来受反动宣传的影响，对我党的政策，还将信将疑。宋老师一马当先，公开站出来，访亲串友，想方设法主动去做安定人心、排除障碍的工作。基于宋老师在归绥的地位及其与我党的特殊关系，这些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为迎接和平起义尽了力量。如绥远的知名人士原绥远省参议会议长张钦、教育厅长张可旌以及常佩三、郭吉庵、陈之的、寿耀南，均受到宋老的教益，坚决走上和平起义、重新做人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九·一九”绥远省和平解放。据宋老师二女儿宋立新回忆：“记得父亲在归绥市解放后，他是那样的高兴与激动。我还从未见过他那样的高兴过！而且教我们努力进步，靠近组织，忠于党……他自己也是热爱党与人民的……。”

解放初，宋老师在绥远省文教厅图书馆任主任。虽然他年老多病，但他以老当益壮的精神，努力做好工作。当时绥远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人杨植霖、苏谦益、武达平、杨叶澎、杜如薪、李维忠等对老人非常敬重，经常去慰问他，鼓励他。他指导青年同志编写古籍文献资料，并收集社会上书报杂刊，以充实馆藏，为图

书馆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五二年，他调呼一中教书，重操旧业，舌耕讲坛，老人无比欢欣。他刻苦学习政治时事和马列理论，努力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及理论水平。他认真备课，辛勤劳作，在四年的教书过程中经常倾听学生对他的教学反映。他把幼年苦学的经历编成三字经，以教育学生刻苦学习。他常与学生谈：“百川东流去，到海不复回，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他把古人勤学以及毛主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少年时勤学的故事一一讲给学生听。以此来规劝学生努力向学。

一九五七年老人因辛勤劳作，年老多病，不宜在教学第一线工作。组织请老人到内蒙政协任委员，并在文史馆工作。老人虽到风烛残年，积劳成疾，但他在文史馆仍然勤恳工作。

文史馆深知宋老师博学多才、是绥远有名的学者。因此请他编写《内蒙古疆域沿革考》一书。宋老师接受了这一任务后，经过长期的考证，参阅了大量的典籍资料，编写成书。后又送请内大历史系教授金启琮等审阅，认为是难得的著作，由文史馆专款出版，内部发行。文革后再版。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九日，宋老师病歿于肺癌，结束了他不朽的一生。

八十五岁溯往事

田国口述

张尔杰撰文

祖传家教

幼读四书

我的字叫子方，乳名心瑞，生于一九〇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我的曾祖父在同治年间，由原籍托克托县的色力登村，迁居现在的土左旗大岱乡公布村，从事农业生产。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受到外国列强的一再侵略，但战乱还没有波及到边远地区，归绥地区社会秩序还比较安定。因此，他起早贪晚，勤俭致富。俗话说得好：“若要富，子强父。”祖父田三丑继承遗产，大力发家，成为拥有四顷来土地的地主，用以剥削他人。但祖父为人谨小慎微，讲究礼让，认为“自己吃亏，就能给后人积德”。大岱村的名兽医刘显（招狼子），不慎将我家的一头好骡子蹩死，叔祖们主张告到官府，让刘包赔，祖父却制止道：“不能，耍手艺的人很难，你们这样干就会砸了他的锅。”因此，得到村民的好评。光绪末年，祖父担任了公布村的会首，就是由于他是大户而且办事公正。

父亲田生发为归绥中学甲班学生，后回家务农，曾任萨县山格村小学校长。我从小就跟父亲读完四书五经，接受了封建伦理教育。特别是祖父常对我讲的“勤俭为学，诚实做人”和“勿占便宜，不作险事”的道理，奠定了我的思想基础，使我养成了一种循规蹈矩、洁身自好、埋头苦干、不与人争的处事哲学。

寒窗自励 艰苦为学

一九一六年，祖父送我到萨拉齐高等小学读书。我才分不

高，但记忆力很强，能刻苦钻研，比那些自恃聪明而不用功的同学，反倒成绩优良。老师对我这个不爱活动、默默无闻、孜孜以求的学生很是器重。我脚穿家制鞋袜，身着粗布短衫，从不感到寒酸，更不胡花一分一厘。祖父见我记性好，肯学习，少花钱，一心想培养我成为“顶门抵户”之材，以继承他的家产。一九一九年，北洋军阀政府为了鼓励边疆子弟到学堂里念书，对已入学学生的家中，免征两项土地的差徭作为智力投资。是年，我到归绥（现呼和浩特市）中学第八班读书，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有一年还考了第一名。

一九二一年，京绥铁路（即现京包路）已通车。我在归中毕业后，考进北京农业大学。当时钱贵粮贱，路费成问题，祖父就将耕地卖掉二十亩，支持我上学。我的二叔反对，认为这是“踢跬家产”。祖父却说：“能叫心瑞念成书，踢跬了家产也愿意。”他的观点是有钱还须有势，有势就须培养大念书人。这在客观上无疑是对我的压力，迫使我进一步节约和努力学习。

我住进大学以后，只要不影响学习，从不讲究穿衣吃饭，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也很少去逛，八大胡同绝不问津。归绥中学第五班的前期同学察素齐人潘秀仁（字箴四），已先在该校上学。我们都住在学生宿舍里。他见我真诚老实，勤奋朴实，对我很接近。后来经他和赵允义（字宜斋，毕克齐人，解放前夕和潘秀仁都逃往台湾，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介绍，我加入了国民党。

大学时期，正是军阀混战，时局动乱，民不聊生，学潮迭起之际，自然就影响了学习。且由于早婚弊俗，我们都已娶妻成家。寒假时同学们都纷纷回家欢聚，我一人住在北京，利用假期，把耽误了的数理化课程补起来，还节省下往返四十来元的路费。这个数目，对学生来说是相当可观的。至于暑假期间，我上午到家，下午进地，参加农田劳动。因此，村里人说：“这后生念书

还没把苦丢了。”

人祸天灾 多苦多难

一九二六年夏，我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即到绥远农垦职业学校教书。该校是一九二五年冯玉祥先生倡议筹建的，但未建成即因国民军的失败西撤而辍办。我正好赶上重筹再建。校长是东北人吴棣华，我是教务主任兼授农业课。学校易名为绥远农科职业学校。

时值绥远境内兵慌马乱，土匪遍地。晋、奉两系军队，交替争夺地盘，互相拉锯，谁也不屑顾及人民死活和社会安定。土匪到处滋逆，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群众不能安心生产。天又久旱不雨，以致酿成了民国十六及十八年的特大灾荒和瘟疫，造成卖儿卖女卖老婆的人家家村村都有，投井上吊以求速死和行乞逃荒之人无法计数的灾难。

我家虽然是二十来人组成的大家庭，由于我自己粗茶淡饭，省吃俭用，把教书所得工资尽量节约捎回家里，才度过荒年。这终于使二叔认识到祖父当时供我念书是做对了。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绥远人民终于不能再忍受贪官污吏、兵匪人祸和自然灾害的蹂躏，在孤魂滩召开了“难民请愿大会”。这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出现在绥远的联合斗争。国民党人李正乐主持了大会。共产党人李曙晓、大盛魁经理段履庄、士绅李致方等人参加了大会。与会者捣毁了郭辉庭（因字音相谐，学生叫他灰厅长）的教育厅和冯延铸的县衙门，还要去打冯曦的建设厅。冯兼任垦务总办，清丈地土，人民尤恨。愤怒的游行群众中，有教员、学生、工人和农民，其中农民占多数。我的伯祖父田二丑碰巧由色力登村来到归绥，他白胡白鬓也自动加入游行行列。队伍由旧城到了新城西门，城门紧闭。后来慑于群众威力，都统商震让派代表入城面谈。我是职业学校推选出的代

表，和其他代表共约十儿人去见商震。经过很长时间谈判，他才答应了我的要求，撤换了冯延铸。至于撤换冯曦一事，商震答应请示阎督军后再办。

不靠派系 教书为乐

在旧社会，派系林立，大圈圈里有小圈圈，小圈圈里还有核心骨干，各抱团体，门户森严，互相倾轧，彼此行援。因此，潘秀仁一当教育厅长，就写好聘书，叫我去任农科职业学校的校长，被我婉言辞谢了。于是就派苗英给他看管这块阵地。

当时绥远的派系，有以潘秀仁、赵允义领导的“潘赵派”（因潘常主其事，又称“潘派”）；有以凉城人张钦（字敬亭）为首的“张派”（因张在察哈尔省还是特别行政区的时候，已是察西的士绅领袖，故又称“绥东派”）；还有以萨拉齐县人祁志厚（字定远）和托克托县人焦守显（字子明）合作的“祁焦派”以及武川县人于存灏（字静漪）自帜的“于派”。这四大地方政团，归纳起来不外乎是投靠南京国民党的“拥蒋派”和依附于太原阎锡山的“亲晋派”两派而已。

我从小就养成了勤俭朴实，艰苦攻读的习惯，又是来自农村，深知学费来之不易，所以我要求学生不许下饭馆，不准谈恋爱，以及严守校规等等。这些措施对维扎校风起到一定作用。例如一九三一年，“祁焦”、“张”、“于”三派联合，并推张钦为首领，趁傅作义主席长城抗战离开绥远之机，鼓动一中、师范、中山学院部分学生捣毁潘秀仁的教育厅时，农科职业学校的学生，没有一个参与他们的行动。在教学方面，为了防止学生在课堂上思想不集中，我利用下课前三分钟时间，每人发给一张纸，进行本课要点测验，作为平时考试分数积累。此一办法因为收效良好，也被其他老师采用，无形中废止了每学期进行一次期中考试的制度。

正当我教书为乐，给祖国培养人才的时候，绥远省党部执行委员潘秀仁，派王有功（字泽民）突然来到我家对我说：“潘先生说你教书很苦，叫我告诉你兼任归绥县党部的委员。”我说：“不，我不干。”他惊奇地说：“怎么不干？每月多赚二十元钱呢！”我回答道：“我不善交际，对党务又不感兴趣，能安安静静教书就行啦，加入派别，别人一倒，自己也倒，还不如不加入。”王走后，我以为可能把老潘得罪了。但到了一九三五年国民党五届四次会议竞选期间的某夜，潘秀仁亲自到了我家，拿出一百元钱交我（币值一元兑现洋一元），并说：“这钱由你自己支配，你想办法能把张国宝的竞选计划搅乱就行。”我接了他的钱以后，心里很作难。经过考虑决定：第一，对张国宝的竞选不去破坏；第二，此款绝不能要。可巧，公布村的张布云（后当汉奸，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镇压）在萨拉齐城内招股开设大成粮店，每股为一百元，我就以潘秀仁的名字入了一股，又将股票亲自送交潘秀仁，说明此款并未动用。

潘秀仁在北京住农大时，倡议组织起“热察绥旅京同学会”，每月出会刊一期，潘以“非非”为笔名，发表政论文章，抨击时弊。陈国英是潘秀仁前妻的亲姨弟，但陈是萨县派，与潘是合作关系。不能任潘摆布。所以，潘秀仁要想插手萨县事，我是他最理想的人选。就如他想插手托县，极力提拔耿正模（字端甫）以抵消阎肃兄弟的势力那样。无奈耿正模是一个木偶，我却是一个不感派系兴趣的教书匠，致使潘秀仁一直对我失望。

平心而论：老潘是一位外貌忠厚，工作笃实，巧于心计，很有组织才能的人。他善于拉拢、收买、利用某些次要对手，因人因时地孤立、打击他的主要政敌，不惜花大价钱、下大功夫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到了一九三六年初，由于各派矛盾激化达到不能调和的程度，陈国英终于采取最后手段，谋杀潘秀仁，击毙纪守光。在此以前，潘秀仁即把国民党省党部节存的大宗宣传费

(确数不详)，买房置地作为校产，办起私立正风中学和新民补习班，给自己培养干部。同时也给自己在新城购置一所房院。连农科职业学校的苗英，也用学校建筑器材，为自己起房盖屋。

一九二九前，“华洋义赈会”鉴于民国十六及十八年绥远省出现的大旱年景，在萨拉齐境内以工代赈，横修一条“民生渠”灌溉两岸土地，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一九三三年，留美生虞整镛(浙江人)胸怀大志，要为造福边疆人民而奋斗。他来到绥远后，向当局要求一位地方上的内行人，协助他重整旗鼓。我为了摆脱派系纠缠，忍痛撂下心爱的教学工作，托地方法院院长于存灏和建设厅长冯曦把我推荐给虞整镛，让我创办了附属于“义赈会”的农场。农场共垦荒三顷，试验推广优良品种。我这个场长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干了一年半，后因不下雨，黄河水位下降，又没有抽水机，不能浇地而把农场解散了事。苗英听说我回到家里，亲自邀我再次去任教。

一九三六年，潘秀仁调苗英为私立正风中学校长，农科职业学校校长一缺由谁接任，发生了争执。“绥东派”要让在我离校期间继我为教务主任的凉城县人北京农大毕业的杜尚礼来当。教育厅长阎伟却说：“我不能被他们要挟，我偏要叫田圃去干。”在僵持情况下，我找杜尚礼说：“咱俩谁也不要卷入他们的派系漩涡中去，上头派你当，我支持你，如果叫我干，你听从我。”并在每周一次的“总理纪念周”上当众声明：“我田圃绝对没有当校长的野心。”事后，听说是阎伟之兄阎肃对阎伟说：“田圃是潘赵派的人，让杜尚礼当校长也好。”才作出杜尚礼当校长的决定。杜尚礼虽为校长，可对我更加尊敬了。因为我考虑到如果把派性引进学校，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和团结，岂不是误人子弟！

开气象课 建种羊点

当时绥远省的气象工作是空白，但农科职业学校却没有气象

课程。经过请示，教育厅派我去南京中央气象研究所实习，并顺便参观浙江、杭州各农业学院及昆虫研究所，以作借鉴。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先生亲自接见并指导我学习了一个多月。他在《气象月报》上撰文，指名赞扬绥远派去的实习生田圃刻苦钻研，非常用心。

返回绥远时，我给学校买了一台水银气压器。因它包装简陋，怕震动，我在火车上一一直把它抱回归绥。从此，绥远与南京的气象情况，能够及时直接通报。傅作义主席每天派人到校，向我索取资料，应用于军事。

这时，“晋绥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从国外引进一批种羊，通知绥远省政府接管推广，教育厅即派我去验收。种羊是放牧在山西交城草场上的。交城四面环山，出入很不方便。我挑选了四十来只种羊，煞费苦心地把它们运到学校设在集宁草场的放牧点，建起绥远唯一的种羊基地。

此时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

某日下午，日本驻绥特务头子羽山带着翻译，突然驱车到达大台农科职业学校。杜校长正巧进城公干，我只好接见他。互通姓名后，他用生硬的中国话说：“贵校的，有一台水银气压器吧？”我说：“是的。”接着他就提出看一看的要求。我对他说：“外国人要看，须持有上边的介绍。况且校长也不在。”他听了后又说：“田圃君，你的没关系的，我们的是参观参观的，打搅你的。”我即让司钥工友开了门锁，领他进去看。他的一双贼溜溜的眼睛，好象想在水银气压器上发现什么秘密似的，盯着观察了许久。接着又通过翻译向我要气象资料。我告诉他：“我们还没有开始收集呢。”其实，每天资料都有存档，只因不让他看才如此推托。羽山临走时，强留下两包点心，作为谢礼。并说：“我的汽车的有，你的进城看戏的打电话的就行。”我回绝道：“我是从来也不爱看戏的人。”次日一早，在省政府的例会

上，省主席傅作义质问阎伟：“怎么搞的，羽山跑到农科职业学校呢？”阎伟回答说：“羽山来省政府还随便出入，他到职业学校，谁能阻挡住。”

煞费苦心 幻想破灭

据老人们世代相传，远在清朝康熙年间，蒙族人色布庆、大岱、公布弟兄三人，在土默川分别搭起三顶蒙古包，就地放牧，日久天长形成村落，人名变成村名。这就是现在大岱、公布村的来历。色布庆虽然没有形成村名，但他的后裔，今天还有人住在公布村的南头起，所以可信此说是实。

公布是一个很可爱的自然村，三十年代初，为了防御土匪袭扰，夯土为城，仅留南门出入。它的东西南北面是里素、大岱、祝乐庆和善岱等村。当时居民约有二百户计六百来人，可耕地约七十余顷。自从一九三一年傅作义主席主持绥政，剿灭土匪以后，地方平静，生活安定，邻间和睦，村风盎然。

绥远全省实行乡村工作指导员制时，公布村的指导员是北溱尔村人张保蒲。公布村的李旺在农科职业学校毕业后，我动员他回村服务，比照指导员的工资标准，按月由村里给他开支。在我的支持下，修建教室四间，校长办公室一间，他以村长名义兼校办起初级小学校。学生免费入学，订有《绥远日报》。接着又仿照河北省定县的办法，村里办起消费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村民自由入股，选出主任。社员有权享受无息贷款，也可赊欠消费物品，秋后结账。结果是销售很快，收款甚难。

李旺是我的学生，能听我的话。我嘱他“办事公正，大胆负责，大户小户，合理摊派。凡应缴的田赋粮税，颗粒勿欠，苛杂附加，分文不付”。李旺还真不辜负乡亲们对他的重托，能给群众办事。有一年秋后，萨县县政府附加每亩土地款若干，他抗着不交。县府派吏到村，催他赴案。他听了马上站起来，伸张双臂

说道：“走吧，背着走吧！”县吏见状犹豫。他又改口说：“怎么？抱上走也行。”县吏一看是茬头，回县复命，所谓附加款也没有再催。日本投降以后，他进萨拉齐城探友，竟用粉笔在县府门外墙壁上大书“天高三尺，地薄千斤”八字和“民之继母”的横批，使当时国民党的县长高云山哭笑不得。

为了要把公布建设成模范村，我拿出了不少钱，也费了许多心血，但只能是幻想，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模范村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买了收音机给村里人播听，借以活跃文化娱乐生活，使村民们开眼界。同时利用大岱村庙会唱戏的机会，到台上放送，但因延误了开戏时间，看戏的人都嚷嚷说：“老田圃闹来个收音机，哇哇哇的不能唱戏。”结果是书呆子落了个费力不讨好。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南洋胡文虎、胡文豹弟兄捐款十万元，赠给中国华北农村各模范村建设一百所小学校。我以公布村的先进事迹，面述教育厅长阎伟，争取捐款。他却说：“已报上去了，决定是托县黑城。”可见国民党统治时期，不论办什么事，只凭权力，不问事实。

沦陷八年 改行行医

一九三七年，日寇对我国发动了全面的侵略战争，八年抗战开始。当日寇侵占大同以后，绥远岌岌可危。在此严重时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竟将驻绥陆军第三十五军傅作义部，及驻包陆军第七十师王靖国部，以“弃绥保晋”为由，统统调回太原。代理傅作义主持绥政的民政厅长兼绥远国民兵司令袁庆增，也率领政府亲信和国民兵一部逃回山西。留散在绥远的军政人员，群龙无首，机构瘫痪，乱成一团。各校师生，也纷纷自动解散。我此时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老伴又染起了嗜好。在这样的情况下，走，走不成，留，留下无法生活，真是没有办法。

十月十四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归绥城，悬起膏药旗。秋风瑟瑟，市井冷冷，一片亡国残景，令人揪心。我想自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不能以口食之急而折腰事敌。可巧二子雨茂，二女雨清同时病倒，我就抱一个领一个地去九龙湾清晓医院就诊。大夫续吾山是老友，密谈之下，他知道我生活无着，就对我说：“你有知识，可以自己学医。利用隔日来我这里给孩子看病的机会，向我学习小手术，再弄上一本医书，提上一个卫生箱子，到农村走村串户行医，还愁什么生活！”于是我就向续吾山学习了几次注射，把住所赁出去，置买了一些手头诊疗器械及常用药物，携妇借雏，搬回公布村行起医来。

当时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极差，日寇急于灭亡中国，更无所谓救死扶伤。即便有个别走方郎中，也怕被日伪捉住杀害，不敢行动看病。顶大仙、跳神的巫医，只能是骗人。

我看的第一位病人，是个难产的孕妇，给她注射了一支催生剂，就使婴儿呱呱坠地。于是马上轰动了邻村群众，盛赞“老田圃医道高明”。从此，我成了方圆三四十里内名副其实的“赤脚”医生。我本着“君子取财有道”的原则，绝不趁机勒索病人而见危不救。有的患者实在太困难，也就免收药费了。至于出诊费和手续费，分文也没有要过。由于我回村时带有一辆教书时骑用的自行车，病人家属一叫，我能很快就到；并且通过自学医学理论书籍和结合实践的锻炼，我的医疗水平不断提高，生疮害疔瘡的外科和比较疑难的某些内科，逐渐都能治好，无形中成为善岱区内的名医。不少的职员也请我给他们看病。

一次，一个善岱伪警察署的日本翻译官朝鲜人某（忘其姓名），派兵叫我去给他的女人看病。那女人伸手就让我捉脉，我不敢说不懂中医，只好闭着双眼装着指切，暗忖“如何过得此关”。生活常识使我知道，妇女病症是“十病九因经”。于是我说：“太太的病因是受凉，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气，病症是月经

不 调，下腹隐痛。”话犹未了，那女人就连说：“真是名医，好先生，说得真对，我是被他（指翻译官）串门子气下的。”原来她一口东北话。“那么开什么处方呢？”她问。我回答道：“不须要开处方，只要以不再生气，再买一盒乌鸡白凤丸服用，病就会好的。”当他俩把我送出家门，我余悸犹在，同时也自好笑，我哪里会开中药处方呢。

再作冯妇 重拿教鞭

一九四五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无条件投降了。我既激动也内疚。我的朋友和学生，有不少人是参加了抗战。他们抗战八年，我行医八年，当时自觉相形见绌。

杜尚礼又当上绥远农科职业学校的校长，硬邀我再去帮他的忙。我对教学工作本来就是藕断丝连，余爱难割的，经他一说，我就放下卫生箱，拿起教鞭来，再作冯妇，又当教员了。没想到这时蒋介石不顾抗日战争的创伤，倒行逆施，违反民意挑起了全面内战，拔兵征税，物价飞涨，导致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深重灾难。我除了按时给学生讲课以外，只能挣扎在穷困的生活圈子里，如同所有的教师那样。

好在，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蒋介石终于失败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搬掉了。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在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将军主持下，绥远和平解放了。绥远成为人民的绥远，我自己也从此投入了人民的怀抱，开始了新的生活。

苦去甜来 老运亨通

我起义以后，由于学校领导的关怀，学习了革命理论，思想提高不少。同时经过了“三反”、“五反”和“反右派”运动。我虽没有被划成右派，但被“动员”回家。

一九五八年秋，我带两年工资，又回到公布村。旋因包头要新建四所高等院校，向农科职业学校要人支援，我又被学校推荐到包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学校下马，我第三次回到公布。当时我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但并不服老。刚参加农业劳动时，队干部照顾一些轻活干，经过一个时期的锻炼，逐渐参加了重体力劳动。锄耨割地，不逊青壮年。我总认为人民政府号召劳动光荣，我是光荣的，所以一直坚持了二十年。

文化大革命中，在贫下中农的庇护下，我没有受过较大的冲击，也没有被扣上什么帽子。在当时形势下，对旧社会干过事的，特别是还参加过国民党的旧知识分子来说，是极其少有的。

一九八三年六月，土左旗民政局根据上级指示精神，每月给我生活救济费四十元。村里的人说：“老田圃吃苦耐劳，熬到三中全会以后啦。”党对我的关怀，使我激动不已，心情舒畅，高兴非凡，所以我接受了公布小学校课外辅导员的聘书，给该校附设的幼儿班孩子们讲“五讲、四美、三热爱”和革命故事，勉励孩子们勤俭诚实，从小养成好习惯，长大为祖国贡献力量。

一九八四年秋，内蒙农业学校派人捧礼到家慰问了我。随后又把我接到学校，出席了为庆祝建校六十周年在九月十一日召开的纪念大会。我的学生郭万一和孙英年两位将军，都陪我坐在主席台的最前面。其他返校学生，也无不向我热情致意。会后领导上考虑到我的生活还不够宽余，决定每月由校方增补二十五元补贴。这使我想到了，在我晚年时期，党和政府还这样关心我、照顾我，不但生活无虑，还受到平生最隆重的尊敬，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使我老运亨通，过上好日子。

因此，谨吐三愿，以表激情：一愿党风继续好转，二愿四化建设顺利进行，三愿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统一。

著名蒙医萨拉布朋素格

王希舜

呼和浩特地区至乌兰察布草原，提起“喇嘛大夫”萨拉布朋素格老蒙医，知道的人都敬佩不已。

萨拉布朋素格（蒙语是智慧集中的意思）祖籍内蒙古伊克昭盟达拉特旗展丹召，一八八九年出生在一个贫牧家庭里，父母早丧，兄妹五人，他排行老大。七岁去展丹召当小喇嘛，学习藏文经卷。由于聪明，记忆力好，深得老喇嘛器重，十九岁便被送到召里办的蒙医训练班学习。蒙语是他本民族语言，他还精通藏文，粗通汉语，这就为他学好蒙藏文医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期间，他阅读了《蒙药草木丛新》和名医罗布曾苏勒和编著的《满乌西吉法》等大量医书，掌握了蒙医的基础理论和诊断学。二十五岁的时候就跟着师傅在达拉特旗一带，边学习，边为农牧民看病。三、四年后就能单独出诊，在当地小有名气。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者经常袭扰展丹召迫害喇嘛。召庙遭到严重破坏，召内的喇嘛，流离失所。萨大夫在无法存身的情况下，同徒弟庆克尔一道步行到了包头。后又乘火车来到归绥市，被席力图召喇嘛收留。根据召里的规矩，新来者要考验十年方能上户。在考验期间，萨大夫住在召内榆树院大伙房里，终日手拈念珠，默默心诵佛经兼看医书。夜间没有行李，盖着一件大斗篷睡觉。由于他能守召规和吃苦，召里就给上了户，从此在席力图召定居下来。

在这期间，席力图召常有后山、四子王旗、百灵庙等地的蒙古族农牧民前来拜佛，听说召内住着一位喇嘛大夫，就顺便到榆

树院求萨大夫看病。以后市内的蒙古军官兵也找上门来看病。因萨大夫祖辈住在牧区，对草原蒙古民族的生活、劳动和地理、气候等特点都很熟悉，加之他在归绥市行医期间吸取了中医学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四诊”（望、闻、问、切）的精华，萨大夫的医学理论和医术都有很大提高。凡是请萨大夫看病的人，都收到很好的效果，所以牧民称他为“神医”。同时，归绥地区一些患腿痛病的拉骆驼的回民老乡也纷纷求萨大夫看病。他们还把萨大夫自己配制的蒙草药带在身边，作为到后草地、新疆乌鲁木齐、伊犁等地途中的自备药品。这样萨大夫的名声越传越远，成为远近闻名的“喇嘛大夫”。

但是这样一位声誉很高的草原名医，在旧中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十多年来，不得不过着“黑医”、“野喇嘛”的生活。一九四一年，萨大夫求人去领一个“行医许可证”，日伪警察署一个管卫生的伪警官说：“求神拜佛的‘蒙古大夫’还想行医看病。”不但没领到行医许可证，反被奚落了一番。回家路上，他憋着一肚子气，想着罢医不干。但回到席力图召后，看到几位牧民托着几岁的娃娃急切求医的情景，不由想到：我是信奉菩萨的，佛经上告诉我要普渡众生，行善积德，我能看着这些受病魔折磨的贫寒人不管吗？想到这些他又继续行医，为蒙汉人民解除病痛了。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实现了和平解放，从此萨大夫走上新的生活道路。人民政府经常请他参加学习，随着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他的思想觉悟有了提高。一九五三年十一月间，他参加市“卫生协会”的申请书中写道：“我经过多次学习党的政策和领导的报告，认识到共产党的政策是完全为人类谋幸福的，所以我要参加我们医生自己的组织——卫生协会，进一步学习新的技术，以便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解放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他确实是脚踏实地遵守了他的诺言，在救死扶

伤的第一线上全心全意地为人们服务。

一九五四年，萨大夫响应政府的号召，经过协商，同王宗周大夫等共同办起了小东街诊疗所。同年，随着人民群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无力求医用药状况的不断改变，诊疗所已不能适应群众日益增长的医疗需要，在这种情况下，萨大夫又和中医芦子裔，西医李绍泉等十七名医务人员，在原诊所旧址，经过动工扩建，成立了呼市小东街联合医院。他被推选为副院长兼蒙医科主任。一九五八年联合医院的全体同志集资一万元，在医院对门（即现在的小东街5号）增设了住院部，有病床30张。在这次扩建筹积资金中，萨大夫个人即投资四千元。

一九五九年，联合医院合并为玉泉区医院。（成为国家医院）他被任命为医院副院长兼蒙医科主任。他主持的蒙医科，先后有庆克尔、丹津、李俊、丹巴永仁、王文林等六人跟他学习蒙医，并配备了蒙药房及蒙药调剂员。

萨大夫的蒙药取材广泛，有动物、植物、矿物等，很少用化学药品。药引也只是普通食品，如黄酒、羊肉汤、冰糖、红糖等。这些药引副作用小，服用方便，价格低廉深受各族劳动人民欢迎。加之他的医术高明，乐意帮助人，对求医的蒙汉群众，无钱抓药的还以财力、物力相助。因此，他主持的蒙医科，终日熙熙攘攘求诊者络绎不绝。

一九七二年秋天，郊区东瓦窑村的一位蒙族农民，患严重癆病（即肺结核病），家里人用箩筐把他抬到萨大夫家。萨大夫看他衣衫褴褛可怜，就叫老伴把自己的旧衣服拿出来给他换上；还把存放的较贵重的好药，无偿配了几副给病人用。病人连续服药后，病很快就好了。因他无力答谢萨大夫，就求萨大夫给起个名字作纪念，萨大夫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喇嘛子”，意思是“佛爷给了一条命”。每天找萨大夫看病的人很多，经常为挂他的号，在前一天就在挂号室门前排队，夜间接排队顺序睡在候诊室，这

样总还是有为数不少的人几天看不上病。一九七三年冬的一天，有一位草原来的牧民老人，没有好气地冲进诊断室说道：“我已经来了三天，也没有挂上号，今天无论如何也得给我看一看。”萨大夫和颜悦色地说：“你不要动火，我一定给你看病。”他经常对徒弟们说：“我们当医生的，决不能把病人拒之门外。”有一个时期，他总是不能按时下班，规定每天挂二十个号，实际每天都要看三十、四十名病人，有时竟达六十人之多。由于太劳累下班回家时，总是由病人家属搀扶着送回家。

萨大夫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感情，对求医的老干部、老领导总是细心诊断，精心治疗。他对徒弟们说：“没有党领导下的这些为革命浴血奋战的老领导、老同志，咱们蒙医事业哪有今天这样繁荣。”一九六五年，内蒙古军区老干部张震明同志患心脏衰弱等多种疾病，曾多次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治疗过，但病情不见好转，身体虚弱较严重，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来找萨大夫。初来时，他需要人搀扶着走进诊断室。萨大夫诊脉后，用那不太熟悉的汉话说：“你这个病我能给你看。有一种药叫野牛心，只有西藏才有，我找不来，你自己找一下。”不久张震明送来了驻藏部队的战友搞到的两颗野牛心。萨大夫配成粉剂，让他按时服用。过了一个时期，张震明象健康人一样走进诊断室，向萨大夫问好道谢。从此以后张部长又能为党工作了。这个消息，在军区大院内象新闻流传着，都称赞萨大夫的医术高明。原内蒙军区司令员孔飞、政委廷懋、政治部主任陈维洲、原呼市警备区政委齐凤祥等许多领导干部先后到玉泉区这个小医院请萨大夫看过病。

一九七七年秋天，原内蒙古军区政委姚学谦患病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治疗期间，病情恶化，本人向医院提出要求，请萨大夫赴京会诊。经医院同意，内蒙古军区派人和玉泉区医院取得联系，萨大夫决定带徒弟李俊、扎木苏、蒙药士云丹片四人去京。飞机正要起程时，接到北京来电说：“姚政委病情恶化，正在抢

救。”没有去成。这说明他在老干部中有一定声望。

萨大夫有六十多年丰富的临床经验，但从不自满，在他八十高龄时，仍经常阅读藏文医书。区医院的医护人员，常见蒙药土云丹片泡制一种名为“阿魏”的草药。据云丹片同志说：“萨大夫用这种药和其它药配伍专治脑疾病。”据医书《千金翼方》记载“阿魏”是新疆特产的药材，维吾尔医生至今仍在临床上应用。这说明他不但在蒙医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而且，因他勤劳好学，在临床实践中还吸收了大量中医和维吾尔医学等祖国大家庭的多种方剂。

他深知自己年事已高，为把多年的临床验方传给后代，一九六三年在其徒弟庆克尔帮助下，整理了治疗妇女病有效验方16例，治风湿性疾病方7例，治疗心脏病方34例，肝病方3例，脾病方2例，肾病方4例，其他病方3例。特别是在一九六一年冬季萨县流行布氏杆菌病时，他不顾年迈体弱，毅然参加了医疗队，深入疫区，和兄弟旗县中蒙医生，用中蒙药对40余例患者进行治疗，治愈率达80%。在实践中，创造了用祖国医学治疗布氏杆菌病的验方。可惜这些珍贵的验方与医案，在十年动乱期间化为灰烬。

萨大夫不但潜心钻研蒙医医疗技术，对蒙药也很关切与重视。中蒙医配方使用的“麝香”，曾是一度紧缺而昂贵的药品。他苦心研究，用有毒性的昆虫、蛇类加上公羊尿三位，混合炮制成代用“麝香”。经临床试用，疗效基本满意，为弥补市场供应不足并减轻患者经济负担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他还重视培养蒙医人才，经他教出的徒弟遍布呼市及内蒙古西部地区，可以说是桃李满边疆，后继有人。较有名气的有：呼和浩特市医院蒙医科主任丹巴永仁，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医院院长鄂尔布，呼市佛教协会会长、佛协医务室负责人扎木苏，以及呼市中蒙医院蒙医科副主任李俊等同志。这些同志继承发展了蒙医这个具有民族特点和地区、气候特点古老医学体系，在各自

的医疗岗位上做出了贡献。

萨大夫热心为人民服务，在贯彻党的“救死扶伤、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方针指引下，贡献出了毕生精力。人民敬尊他，党和政府信任他。他当选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二、三、四、五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内蒙党政领导一起共商国家大事。他常说：是党和人民政府拯救了蒙医、蒙药这个祖国宝贵的医学遗产，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进步，蒙医事业一定会繁荣发展。但是，十年动乱期间，萨大夫也没能幸免被扣上了“牛鬼蛇神”、“新内人党”等莫须有的帽子，遭到批斗和非法隔离审查，使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的身心健康受到摧残。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人民政府给他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他心情激动，更加努力工作。

一九七八年，党和上级为把他的丰富的医疗经验传给后人，调他到呼市中蒙医研究所（即现在的呼市中蒙医院）工作，整理编写老大夫的疑难病例诊断和方剂等资料，以发展祖国宝贵的蒙医蒙药学。从此萨大夫深感责任重大，他不顾耄耋之年，忘我地投入新的工作。终因年迈劳累，于一九七九年十月一日病逝，享年九十岁。

塞外名旦任翠凤

邓孝明

三十年代末，活跃在塞外的晋剧名伶中，有一个人称“人人乐”的小演员，她就是现内蒙政协委员、驰名区内外的著名青衣（正旦）任翠凤。

任翠凤，一九二七年生于呼市一个铁路工人家庭里。八岁时，其父因社会所迫失了业，生活无着，贫困缠身，这时，她同院住的有个叫黄玉亭的老生演员，出于怜惜之心，带她步入了梨园行，开始了她的艺术生涯。

起步时，黄玉亭先带她看戏，启发她喜欢演戏这一行。后来就让她登台扮演《秦香莲》中的娃娃旦。聪明的小翠凤，一开始就懂得做戏。当韩棋手持刚刀要杀秦香莲时，她的两只小手抖得令人心酸，甚是可爱。戏后，即刻被一个艺名太平老旦的师傅收为门徒，主学须生。两年左右，演出了《杀庙》、《走边》、《杀府》等门戏。由于她聪明好学，除了师傅的本门路的戏外，还学会不少小旦行的戏，如《拣柴》、《起解》、《赐环》等。后来她改学了青衣，并学习身段、练把仗。不多时，青衣、小旦都能唱了。她学戏的进度十分惊人，一夜就唸会了一个《教子》，使得老师不愿再教下去了，原因是怕“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无奈只好拜连文科（票友、人称二文魁）为师，抓住时机，学了不少青衣戏，象《万花船》、《算粮》、《走山》、《血手印》、《三上轿》、《教子》、《打金枝》等。后来师傅也“货尽”了，只好再“贩”回来教她。不久，她便正式登台演出，顶一门“梁子”了，住的是四狗子、杨二恼的班子，和王云楼、郝

盛魁、燕鹏飞、燕彩云、李玉亭等名角同台演出。这时她才十二岁，演戏还得人抱到椅子上，内外行都喜欢这个机灵、活泼、可亲可爱的小演员，所以便给她起了个“人人乐”的艺名。

十四岁时她搭上了郭玉珍的班子，辗转在丰镇、隆盛庄一带演出，演技逐渐成熟。她在《算粮登殿》中《登殿》一场唱的那段“小流水板”和《打金枝》国母一上场唱的那句“梅花腔”，每唱必得掌声。常演的《芦花》、《三疑计》、《二度梅》、《假金牌》等戏，也是倍受欢迎的拿手戏。她还在《永寿庙》中，一个人前后扮演两个角色。因此她成为舞台上的红人，演出引起了轰动，受到观众的欢迎，致使票价由原来的二角钱升到二角五分，当地的群众戏谑地叫她“二角五”。当时和她一起住班的琴师秦启昆说：“在丰镇戏院子里演出时，任翠凤的嗓音亮极了，院子里唱，毛店巷子（距剧院四、五里远）外也听得清清楚楚。”后来她又到了包头，住了郭玉苏的班子，与山西名角“白果子”、“三白子”同台演出。当时报纸刊登了她的剧照，并介绍了她的演出盛况。

十六岁时她入大同南戏院张胡子的班子，与山西名流马兆林（马秋仙叔父）、韩金凤、韩银凤、马秋仙、金小霞、李海明（教师）等同台共演，深受名家赏识。当时她生活很简朴，头梳“油灯捻”，身穿烂棉衣，显得很不打眼。一次班主请客时，竟未看出她是新来的坤角，但她一登台便轰动了大同剧坛。最红的戏要算与马秋仙合演的《打金枝》，场场座满，掌声不断。

她的演出虽然引起了轰动，但在旧社会她作为一个唱戏的弱女子却受尽了欺辱。日伪时期，散戏后常遇到日本特务、汉奸在家里胡作非为，如往水缸里撒尿，菜盘里放烟头等。有一次散戏后刚睡下，便听到一伙日本警察边喊边笑地来找碴儿欺负人。她和父亲听到声音就往外跑，一头碰到轱辘把上，差点掉到井里去。

“干脆不唱了！”一气之下她离开了所熟悉的舞台生活，回到丰镇找了人家。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又回到归绥市她母亲家里。当时她认为日本投降了，不再受外族欺辱了，所以又演了戏。那知时间不长，又受到国民党特务、警察的欺负。一次，在东门外散戏回家途中，被一特务从背后洒上了一股馊水，把衣服、辫子都烧坏了。这使她感到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艺人们也是无法生活。她再一次停演，回家当了家庭妇女。

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后，她回到丰镇又重新登上了舞台。这时恰逢丰镇解放，她不仅演出传统戏，还配合当时政治运动演出了不少现代题材的剧目。如《兄妹开荒》、《十二把镰刀》、《四劝》、《新九件衣》、《河伯娶妇》等。由于经常参加社会活动，便结识了陈介平同志，并由陈介平推荐当选了丰镇妇联委员。

绥远和平解放后，她随杨植霖、苏谦益、阮慕韩等领导同志由丰镇重返归绥，参加了大观园杨再山的班子，与郭凤英（十一生）、刘芝兰、冀素美（小果子）等名角同台演出。五〇年加入了由“七班主”自由组织成的共和班，与宋玉芬（三女红）、武月梅（小旦）、郝盛魁、王云楼、燕彩云、赵金瑞、王治安（凤凰旦）、杨胜鹏、高素珍、王艳梅等名角同台演出。后来进入大光明电影院（后改民众剧院），以她为首（社长）成立了醒民剧社。这时又有许多新角，如苏玉兰、恩金泉、常艳春（八岁红）等相继入社，名伶荟萃，各显风骚，一时轰动了整个归化城。

五二年，她演出了现代戏《小女婿》和新编古典戏《双蝴蝶》、《杨八姐游春》、《御河桥》。一个《小女婿》演得出了名，归化城郊远近几十里的农民搬上行李来通宵排队买票；散戏后观众仍恋恋不舍地等着要看看这个演杨香草的名伶任翠凤。围观者争先恐后，异常热闹。这个戏连演百余场，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城乡观众，为剧团争得了荣誉，同时也为剧团奠定了优厚的经

济基础。此间，还同时演出了配合时事的时装戏《王三保》（戒烟的）、《一双鞋》（抗美援朝的）、《母亲》、《人面兽心》、《两个女红军》颇受观众欢迎。

五三年成立实验晋剧团，她出任团长，繁忙的演出之余，又开始了新的排练工作。这时内蒙派来了戏改组。在戏改组的指导下，由她口述了传统戏《秦香莲》，并与戏改组密切配合对该剧进行了全面的改革，使这个戏焕发出新的光彩，博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并在全区汇演中获得奖赏（她获演员一等奖）。唱腔灌制了唱片，在区内外广为流传，影响甚为深远。之后，她一直坚持演出现代戏和新编历史戏，特别以演《江姐》中的双枪老太婆最为著名。

任翠凤在几十年的舞台生涯中，曾演出了数以百计的剧目，塑造了各具风姿的人物形象。她擅演一些雍容大度、通情达理的人物，如《打金枝》中的国母；也擅演一些端庄贤淑、稳健庄重的角色，如《教子》中的王春娥。她还特别擅长演老旦和彩旦。《杨八姐游春》里的余太君，被她演得苍劲厚实，萧洒不凡。唱腔中揉合着须生腔，唱来从容自如。特别是在“耍彩礼”那场戏中，她的唱念高亢挺拔，响亮宏厚，酣畅淋漓。而演彩旦时却另是一番风采。传统戏且莫说，只在《夺印》剧中把个“烂菜花”演活了。在给书记何文进送元宵那段连唱带作的表演，忽前忽后，声调时高时低，唱腔是三回六转，绘声绘色；动起来宛如龙蛇缠身，令人眼花缭乱，真是精彩之至。

《算粮登殿》是她的拿手好戏。“算粮”一上场就紧紧抓住了观众，轻快的脚步，飘逸的身段，脆利的嗓子，顿时把个“王宝钏”活现在观众面前。在唱“十八载又好似大梦一场”一句时，行腔俏丽宛转，张弛有节，紧紧扣着观众的心弦。这段腔唱得一气呵成，字字清晰，字循情发，情寓字间，甩腔时挥洒自如，宛若行云流水一般，观众看了着实着迷。而在“登殿”时唱的那

几个“快板”，更是令人兴奋。任翠凤的唱腔，“慢腔”高亢洪亮，舒展大方；“快腔”更是内外行称道的。她一口气要唱几十个字，字字如钉，快而不乱，似唱似念，随心所欲，清音绝耳。干净俐索，每唱必得掌声。

任翠凤同志一贯刻苦钻研，始终保持着对艺术追求不息、探索不止的精神。正如她常说的，要活到老、学到老。因而，在广阔的艺术道路上，她独辟蹊径，终而成为人民喜爱的艺术家！

任翠凤同志多年来，一直用自己的艺术为党、为人民服务。解放后连任晋剧团团长。五〇年冬出席北京召开的中央文艺工作会议，五二年九月出席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五九年为包钢一号高炉出钢慰问演出，几次受到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文革”期间，虽受挫折，但一直辛勤工作，献艺于人民。她现在呼市文化局艺术顾问委员会任常委，并于一九八六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托县第一高小刘琳校长

刘继志

刘琳（1885—1927），字昆山，祖籍山西繁峙县。父刘秉威定居托县帐房坪村，耕耘之余，向村中有文化者学习，不数年能读《百家姓》、《千字文》、《论语》等书，于是开私塾执教。刘琳务农之暇，承父教，不数年亦达秀才水平。琳为长子，下有二妹，一适本村郭姓，一适老官营村彭姓，小弟刘瑛。

辛亥革命后，绥远归绥废书院，成立归绥中学堂，附设师资讲学所，学制四年，公费待遇，为各县培养小学师资。招生广告发至各地后，报名人数不多，原因是“必须剪掉长辫”为首要入学条件。群众怕帝制复辟，祸不旋踵。惟刘琳不顾族人及其父之反对，毅然剪掉长辫，踊跃报名，获得录取。于民国二年（1913）入学，民国六年毕业，成绩优异，时年三十二岁。

毕业后分配回托县城关，其父亦由农村迁居城关住孔子文庙任私塾先生。刘琳受地方士绅如张合璧、李桂五、康子珍、霍亮生、李滋、吴耀、阎茂等人之欢迎，任托县第一高小校长。

刘琳先生认为师资质量第一，故聘教师必亲自谈话，了解其德才情况，然后有所取舍。其所聘之教师多系归绥中学毕业或归绥师范毕业，后来还有北京师大毕业者。如曹富、曹明、焦保国、杜还吾、卜玉璧、王世重、刘清、乔殿重、耿正模等，因此，教学质量非常突出。

刘琳先生经常深入教室听课，对教师之优缺点进行鉴定，征求学生意见，转告教师，以资改进。如一数学教师，提问学生“二分之一是真分数假分数”？学生一时答不上来，该教师将一匣粉笔掷于地上，吓得全班学生面面相觑，从此不愿上数学课。刘琳

先生对该教师多次谈话，扭转了教学态度及方法，师生关系重归融洽，教学成绩上升。高年级设英语课，一位英语教师山西口音太重，学生给起了绰号“生铁蛋”。原来提问学生回答后，教师让学生坐下，把Sit down读成“生铁蛋”了。为了赶进度，上了十几课，学生还不会写二十六个字母。刘琳先生耐心做老师工作，使发音基本正确，加强基础知识学习与训练，放慢进度，加多复习，学生对英语大感兴趣，升入中学后，受到好评。

对学生成绩优秀者，除期末发给奖状外，平日试卷、作业，择优公布于教室内，名曰“贴堂”，大大鼓舞了学生学习积极性。又如下午到校后之毛笔写仿，每天择优贴堂，故毕业后，学生之毛笔字，有的已能为商号写对联及写红白喜事之大字斗方。

六年级学生杨令德与几个爱好新闻的同学在教室用毛笔字出新闻小报。刘琳先生首先肯定支持，并鼓励说：“你们将来争取成为报社的主编，就不愧为托一高的学生了。”杨令德后来果然成为绥远新闻界的主编，又是大公报的名记者，在《塞上忆往》回忆录中，提起刘琳先生之鼓励期望，认为是一位好校长。

学生吴桐，回族，其祖父、叔祖父均为武术八卦拳之名家。吴桐自幼承家传，功夫甚深。刘琳先生对吴桐大加赞扬，特聘为本校课外武术指导，学生习武者甚多，受益非浅。吴桐升中学上体专，又习太极拳，赴南京打擂台获冠军。归来后任绥远国术馆长，解放后任内蒙政协委员，与人谈及个人成就时，念念不忘刘琳先生之因材施教。

当时，在孙中山先生提倡解放妇女、男女平等之政策下，反对妇女缠小足，但市民千年陋习，保守难改。特别是托城妇女，不是以貌取人，而是以脚夺标。凡妇女缠小脚三寸者，才有资格于四月初八庙会日，在院门前坐长凳“亮金莲”，达不到三寸者，只能躲在家中。男子选妻，首先论“金莲”。故托城妇女多患腰腿病，弱不禁风。

刘琳先生在校在社会大力宣传放脚，但听者寥寥，无人行动。为此，刘琳先生下决心，不怕自己大女儿刘朝霞嫁不出去，带头不缠足。这一行动，引起全城议论，反对者居多，观看者也有。不二年，政府命令成立妇女放足督察委员会，组织专人入户先劝后强迫放足，群众才对刘琳先生领首赞服。

当时人们迷信思想十分严重，天旱无雨，组织祈雨队到龙王庙烧香敬纸，并禁止妇女观看，黑河水涨，有淹没全城危险，也组织队伍向河神庙祈祷。凡月蚀、日蚀时，家家户户敲铜盘铁锅，焚香跪拜，名曰：救日救月。刘琳先生除在校进行科普教育外，还组织师生上街，吹号打鼓，召来群众，并手持地球仪，讲地球、海洋、国家；讲地球、太阳、月亮之关系，产生日、月蚀之原因；讲抗旱、防洪之办法。虽不能立竿见影，但也起到启蒙之科普教育作用。

在军阀混战中，托县教育经费支绌，常半年一发工资，且物价上涨。刘琳先生枵腹工作，积劳成疾，患肺结核吐血，少医无药，不幸于1927年6月逝世，享年只四十二岁。十年来之培养学生约五百余人，走向社会者多成文武战线骨干。噩耗传出，县政府及地方士绅立即捐赠棺木一具。托高小师生数百人前往吊唁，公推高材生杨令德拟祭文并宣读，全场呜咽，如阴云四合。杨令德回忆其祭文大意如下：“吾师传三民主义之道，授文化科学之业，解迷信愚昧之感。拓聋启聩，奠定学子报效神州之志，掌握建设祖国之技。吾师创业维艰，任人唯贤，以身作则，诲人不倦，惜贫病交加，中道而逝。在吾师鞠躬尽瘁，毫无怨言；在吾侪实意外不幸，诚教育界之巨大损失！呜呼痛哉！呜呼悲哉！音容常在，功垂不朽。受业者誓志砥砺奋发，继承遗志，有所建树，以期报达恩师之德于万一焉！”

刘琳先生有一女五子，由孀妻彭述祖抚养成人，其孙甥辈达百余人，均在新中国之各条战线上，为祖国之四化贡献力量，可谓后继有人。

著名武师王美

代 林

内蒙古武术界，提起王美，无人不知。

王美祖籍山西，生于公元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五日，在昆仲辈排行为四，小名银宽。童年时代，父亲王万金将他送到迦兰召（有人叫崑崙召，俗称可怜召，现址呼市回民区新民街小学）住在玉先生处，攻读私塾。玉先生山西人，是典型的老学究，对学生要求分外严格。王美在玉先生门下读了五年多书，颇有收获。结业后，他开始重蹈父路，操起屠刀。

王家在解放前，是归绥市有名的屠家。据说王万金出生于普通的农民之家，青年时，来到归化城为回族富户“福喜堂”的前辈杨发勇当屠夫。王万金聪明好学，主人对其格外照顾。他是汉族，但衣食起居都按伊斯兰教的有关规定，认真执行。民国七、八年，王万金已是响当当的屠家。归绥市的大饭馆、肉贩子，几乎都由他供给肉。王万金发迹后，住在旧城剪子巷，仍做“白纸幌子”（即回民）买卖。他富了没有忘记左邻右舍，尤其穷买卖人乐意和他打交道，只要有困难就来找“接运”（王万金小名）叔。王家做回民生意，处处尊重回民风俗习惯。一年，王万金的一个媳妇从娘家回来，未洗手进了货房（即煮肉房），被公公好一顿训斥。他一再告诫家人：“我们做的是回民买卖，不能有一点污染。”王万金就是这样，以身作则，用自己道德风尚教育子女。

王美受家风的熏陶，从十几岁帮工开始，屠家一套技术无所不学。青年时，他听说马莲滩（现回民区新民街）的戴永宏，请

来满族武举吴长庚，教儿子戴俊。于是，王美和几个朋友一起拜吴先生为师，开始学习武艺。吴长庚是清末绥远省八旗营中的最后一名武举人，文武双全，功夫炉火纯青。在吴先生精心点拨下，打下了坚实的功底。王美谦虚、好学，尊师重道，并能吃苦，每当冬季来临，屠家生活节奏骤然加快，一天劳作毕，浑身精疲力竭，但他凭着恒心和毅力坚持习武，深得吴长庚喜爱。师傅先教其拳术，后传刀枪剑棍，使王美武艺初见端倪。

后王美又从师马正英、吴桐、柴连升、吴耀等学习武艺。一九三二年，王美参加了绥远省国术馆的活动，更是如鱼得水。国术馆里，各种流派并存，少林传宗，武当献技，不同风格共同发展，群峰并峙。王美博采众家之长，在武术的道路上越走越宽。不久他去上海参加了国术表演赛，面对强将如林的局面，丝毫没有却步，受到武术界的好评。

一九三三年，王美又参加了在青岛举办的国术表演赛，同年，古城南京荟萃了全国各路武林高手，第二届武术擂台赛（也称国术国考）将要举行。绥远队的王美、白怀礼、刘恩绶、潘德元、张海摩拳擦掌，欲决一雌雄，显露舞姿。战幕拉开，高手林立，风起云涌。王美精装上阵，气度不凡。在徒手比赛中，他眼明手快，实中有虚、虚中寓实，虚虚实实难以捉摸，几名外省选手纷纷败在手下。在枪术角逐中，险象迭起，惊景环生。对手持枪一个猛攻，王美轻轻一拨，身体全部躲过，但搭拉的袖口被扫住一个边，裁判马上判对方胜利。原来他上场时忘了系袖口的扣子，一点疏忽，酿成终身憾事。

一九三四年，王美代表绥远省，又去天津参加了华北运动会。在屡次大型比赛和表演中，他都表现突出，引人注目，成为一个蜚声武坛的国术俊秀！

王美自己的人生水准：行百里者半九十。他凭藉谦虚好学和努力实践，不断取得新突破。武术上他尝到了甜头，也吃到了

苦头。天天闻鸡起舞，对月练功，从不间断。

盛年时的王美，练功之余又担负起传播武术的光荣任务。在省立第一小学、省立第五小学、新城乡村训练所等地执教时，他对学生技术上的一点微小缺陷，都耐心指出且授以正确方法。学生练得起劲，他教得卖劲，每到一处，都能圆满完成任务，博得赞扬。

一九四七年八月，绥远省国术馆又恢复了活动。武林志士，摒弃门户之见，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共同研习武技。红火的场面吸引了无数热爱武术的人。王美被从学员提到教练。看到那么多人云集起来，想在武术上有所发展，他激动万分，毫无保留地把全身武技都奉献出来。每到学员艺有寸进，他都乐在心中。

新中国诞生后，武术同其它事业一样，如雨后春笋。王美想到曾培养自己的武林前辈，都希望弟子将技艺发扬光大。现在，有社会主义的沃土，他决心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

一九五四年，内蒙古武术巡回队成立，王美成为正式队员。在各地的表演中，他演练的套路具有细腻、准确、精到的风格，令目睹者称奇。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六日，王美再次被自治区选派到北京参加了在北海体育场举行的“全国射箭锦标赛、武术评奖观摩大会”。他在观摩大会上表演了八法拳、梅花拳、仙鹤剑、五虎枪，以功夫好，气质纯，速度快，动作准等特点，深得广大观众的喜爱。

返回青城后，他和挚友、回族跤师白老八，经多方努力，于一九五七年成立了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业余武术摔跤锻炼站。他俩为教练，活动场所设在白老八院内。这个锻炼站自创办之日起，热火朝天，闻名青城。爱好运动者天天从四处涌来，学武的学武，摔跤的摔跤，好不痛快。这里为塞外古城单调的业余生活带来了活泼气氛。王美品性端庄，待人真挚热情，对后生倾心培植，从学者甚众。他在技艺上不染时尚，一再要求学生学艺一要勤，二要苦，来不得半点虚假。他十分注意对学生基本功的磨

练，力争让每个学艺者，做到技术扎实、全面，刀、枪、棍、剑、拳、脚样样精通。作为武术教练，王美崇尚武德，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他的锻炼场地，师生感情融洽。晚上在白老八院内活动到夜深人静，早晨王美又进了人民公园。这里的学艺者更多，有各行各业的人。他从不对学艺者偏三向四。对干部有礼有节、不卑不亢；对平民百姓的子弟也平等对待。王美是呼和浩特武术界最富盛名的教练之一。他执教最大的特点是，因人施教，因材施教，根据每个人的具体身体条件和接受能力，传授不同风格的套路。他的学生每次参加比赛或表演，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他兴奋之色溢于言表。回来后，总是提醒学生：夺冠之路无坦途！

王美还创编了不少武术套路。早晨，送走一批批学艺的人们，他常独自在静谧的公园里，寂然凝神，陷于深深的思索。王美创编的套路，结构严谨，朴实无华，重于实战，造型雄美，防身健体；腿法，步法、手法独特，风格统一和谐。尤其他创编的对练套路，如棍进枪、匕首进枪、空手夺刀等，战斗气氛逼真，充分调动了运动员勇敢、机智、敏捷和互相协作的精神，受到行家里手的赞誉。

一九六〇年，王美担任了中国武术协会委员，并兼任呼和浩特市武术协会副主任。

王美是重武德的楷模，他从不向弟子灌输门派的封建糟粕思想。有一年，在教授的人中，有一个中学生，生活较苦，为感激王老师的精心培养，在学艺的人们走散后，把几年积攒下的一元钱，递到老师面前，想让王美买几盒烟，意极恳挚，但王美当场婉言谢绝。还有一次，他的学生白文亭，从包头棉纺厂回来探亲，为王老师买了几斤点心送去。王美高兴地说：“你生活不宽裕，心意我领了，礼物给你父母拿去。孝敬了他们，也就是孝敬了我！”肺腑之言，使在场的人深受教益。看到自己呕心沥血

换来大家的情意，王美心情激动，力量倍增。另外，王美只让学生自己领悟武术的精髓，不准许他们轻意出手。他确实也忠于此道。一年，连续有几个人到他的活动场滋事，提出要和王美比武过招，他屡次都好言劝走。武林中人潘××，为了生计，常向弟子传授技击，武林同行皆为不满。王美却对学生说，潘老师有他的难处，不象我每月有薪水，我们要看到他的另一面，他为传播中华武术也是有功劳的。

一九六九年四月，党的“九大”召开。这期间王美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让居委会看管起来，罚刨尿冰。王美出于对事业的赤诚，不顾一天的劳累，夜晚找一个清静之地继续研习武技。一天，王美在人民公园辅导学员练习一招“仙人指路”，不料第二天有人在活动场旁的大树上贴出大字报，质问他指的是什么路？为哪个阶级指路？满腔热情却招来了无情的打击。

后来政治空气稍有宽松，王美的锻炼场又热闹起来。为了迎接各种武术比赛和表演，他厉兵秣马，积极备战。王美一生讨厌人们说“知足者长乐”，认为紧张是一种享受，一种追求。他的活动场上，高峰时可达百余人。晚上，送走了一批批练功的人们，月儿升高，清辉洒荡大地，王美在自己的院里继续苦修武技。据他的老伴张福叶介绍，王美深夜一点上床，临晨四时起床，几十年如一日。他对事业的痴情，教育了后生。凡拜其为师者，都能在他门下，接受系统规范的训练，而且功底扎实。七十年代，他的高徒曾在内蒙名扬一时，有的还参加过全国性的武术比赛。看到自己辛勤耕耘的园地，茁壮成长起来一批又一批人才，武门后继有人，一浪接着一浪，一浪高过一浪，他欣喜不已。

王美作为一个人，有自己的不足。本来学武习技最忌伤身，他却染上吸烟的毛病，并且愈来愈凶，几乎到了不能自拔。终因多年患有的肺气肿再次发作，于一九七八年二月十六日，溘然长逝。他临逝前几日，躺在炕上，还时常将腿放在大柜上，练习腿

功，欲待身体好转后继续在武苑大展宏图。可谓壮心不已！

王美一生正直、执着，对武术精益求精，为传播武术技艺，发展武术事业，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



旧城名水井

早年的旧城有无数口水井。颇有名气的，有史家巷南口外东狱庙（孤魂庙）内的水井和大召（无量寺）前的玉泉井，海窟井，十王庙外的水井，小西街西口外靠扎达海河河沿的水井，大南街北端路东巷子里的四眼井。

玉泉井享有“九边第一泉”之美称。据史志载，这一水泉是清圣主康熙（玄烨）皇帝的御马踏出来的。具有雨涝井水不增，天旱井水不减，多用井水不降，少用井水不升，喝多了也不会胀肚的特点。井台上有石制旗杆和木制小庙，是“御泉社”集资所建。归化城郊景致中，有“石头旗杆木头庙”一语即指此处而言。在附近，最多时有“荣升源”、“庆春源”等十来家茶馆；都以玉泉水招待顾客。

东狱庙的井水泉味清甘，可名列全城首位。只是人们疑神疑鬼怕不吉利，很少有人问津。

水最旺的是海窟井。有不用带麻绳柳条水斗，拿上瓢往水桶里舀水之说。前来取水的茶馆不少都较远。取水方法是用牛拉车，车上放一只特大木制水桶，有注水口和出水口。来取水的茶馆，有兴隆巷南口外的“德丰源”，小东街的“双德源”，大南街的“广和源”、“上三源”，小什字附近的“中和源”等。

其它几处水井，也都为商号、居民的饮用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记新）

郭长清其人其事

张尔杰

一

郭长清，字松山，乳名才狮子。一九一二年出生于萨县（现土右旗）三和马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由于生活折磨，父母早逝，从小即被姑母董郭氏抚养。其人生得眉头低窄，颧高鼻直，厚唇大咀，粗喉大嗓，体态修长，龟背蛇腰，膂力过人。他在孩提时就粗野顽皮逞强好斗。稍长以后，因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姑母苦口劝说，恶习难改，终于恚恨以歿。由于姑母的弃世，郭长清失去了食宿依赖，光棍一条，人起家空。恰值“华洋义赈会”于一九三一年成立了“华北公司”（即萨拉齐新村农场），郭即投奔该场当上长工，被分配在油坊里工作。那时的榨油方法是楔挤，就让他抡锤打楔，这一苦力营生对于年轻力壮的郭长清来说，是胜任有余的，所以表现很好。场方认为他老实可靠，就调他赶了马车。

郭长清虽然有了工作，能够自食其力，但心高意大，反觉事事不随心，于是逐渐放肆，不守场规。每逢邻村庙会，他就勾引一帮哥儿们到会场起哄闹事，挑男戏女，打架斗殴，大出风头，为村民所不齿，因而公司只好把他解雇。郭长清又跑到萨县第二区区长贾海峰那里，补了一名区兵。没过几天，自觉大才小用，悻然离去，又到处游荡，恢复了无赖行业。

这时日寇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形势逼人，归（绥）、包（头）岌岌可危。萨县陈之的、刘盛五诸人号召萨县的知识分子及青年学

生，积极参加他们的队伍，奋起抗战，保卫家乡。此时，有一位外号叫“长腿羊”（真名杨玉川）的老土匪，早已洗手“从良”，为了要尽匹夫之责，就投效陈部被任为连长，驻在萨县善岱村。因为“华北公司”原来备有自卫武器，郭长清人地熟悉，即将该公司的步枪拧了十来枝，跑到杨连当了班长。

陈之的是文人，不谙军旅，全凭刘盛五、刘承邦等人协助。他们被日寇从萨县追到准格尔旗时，国民党政府上自中央，下至省县区各级组织系统，已经乱了套。陈派人分头持函去找傅作义、邓宝珊、门炳岳、马占山联系，请示以后归宿，但恐缓不济急，害怕被日寇歼灭，又虑一千余人的骑兵，粮饷无着，各自散伙，遂决定由刘盛五领銜暂投准旗伪司令奇凤鸣，藉以保存实力，等待傅、邓、门、马的指示（后与马占山取得联系，被改编为东北挺进军暂编骑二旅，任刘盛五为旅长，拉到黄河彼岸驻防）。郭长清认为他发展的时机已到，当晚即串通全班九人说：

“咱们是中国人，都只有一条命，为中国死是光荣的，替日本人送命是汉奸，咱们不当伪军……”。于是携械脱离，独树一帜，自称连长，到处打家劫舍，火併其他小股，袭击日伪据点，收缴敌伪枪马，很快便发展为拥有四、五十枝枪的队伍。善岱乡绅呼贵等人，见时局动乱，兵匪如毛，接应不暇，遂邀请郭长清率部驻在善岱，并公推他为五区区长，实则是认为公开摊派供应，胜于各股乱要滥索。未几，敌人建立善岱伪警察署，郭长清即率所部与老刘哥儿合伙了。

刘系萨县纳太村（现属土右旗）人，故称纳太刘，大名叫刘金山。他在年轻时，也曾闯荡江湖，后来洗手不干，在纳太村务农。日寇占领萨县初期，有一小队鬼子兵约廿来人，窜进纳太村住在老刘哥儿家，把刘的老伴、媳妇、闺女都眼对鼻子轮奸了。他咽不下这口“鸟气”，遂立即召集两弟二子，密议妥当，在深夜闯进鬼子兵的住室，用铁钎棍棒打死鬼子收缴了武器。刘的一个

弟弟，也被顽抗的寇兵当场击毙。“家嘛，不要了！”从此，刘金山离开纳太村，游击于萨县境内，自称独立师师长，与日寇展开了武装斗争。此次郭长清率队来归，自然极表欢迎。他任郭长清为第三团团长（第一团团长陈二拴、第二团团长张文彪）。三团合计约有三百多骑兵，经常给日伪以沉重打击。当时已经迁到大后方的《大公报》曾报导一则消息谓：“绥远沦陷后，群众自动抗日组织，如火如荼，有六十余岁刘姓老翁和十几岁的郭姓小孩，率领所部出没于归、萨境内，经常给敌人以重创”云云。这则消息虽欠具体翔尽，但显然指的是老刘哥儿与郭长清，可见其影响之深远了。不久，他们被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收编为暂编骑兵第三旅，任刘金山为旅长，陈庆（陈二拴）、张文彪（机米张）郭长清仍依次为第一、二、三团团长。

郭长清勇敢善战，成为刘金山的得力助手。他们与自卫军第三路第八团团长毛招财（郭玉林）磕头拜把，刘长毛次郭老三。刘金山为了拢络郭长清，把自己的义女指配为郭妻，因此，郭叫刘为“外父老大哥”。一九三八年三、四月间，马占山奉令配合傅作义先生反攻归绥，进行绥南战役。马与他的副司令邵某（名失忆）率刘桂五、井得泉两师和刘盛五旅，由高龙渡口过黄河，挺进敌占区游击，刘金山旅在敌区担任向导，以大青山为根据地的自卫军第三路参谋长王有功，第四路副指挥邱明星，同时奉电率部迎接，在苜芄梁（现属土左旗）、陶思浩一带与日伪激战一昼夜，一度克复察素齐车站。旋因敌人由大同派莲沼兵团驰援，各部都被迫撤入大青山内。郭长清驻在庙儿沟。他恨刘金山老是命令他打头阵，不断地促他“上！上（前进）！”认为是“外父老大哥在唆憨狗咬狼”，故意催他送命，遂不告而别，只身出走，另起炉灶。

马占山在配合绥南战役被莲沼兵团逼向后套移转时，而邵副司令在自卫军第四路团长王德宝向导下，挺进到凉城策反慕新亚

反正后，经清水河过黄河，返防伊盟，马占山本人率一部退至阴阳红油杆子村，为敌人包围，刘桂五师长殉国；刘金山仍以骑兵第三旅番号留敌占区游击，因与伪保甲团边老五（名不详）激战，不幸牺牲。郭长清适已自树一帜，即将刘部溃散之众收容起来，约计三、四百人，继续战斗。

某日，郭率部驻在善岱区属的大水圪洞村（现土左旗大水桥村），他奸污了一个十三、四岁的幼女。次日午前，发现日本骑兵（大马队）协同步兵向该村合围，郭急令所部向东转移，先头部队已进入西淖村（距大水圪洞五华里），后卫还没有出村，遂被敌人击溃。除死的、伤的、跑散的、被俘的而外，郭长清只带领卅来骑，奔突到小韩营子村。

小韩营子为教堂所在地，筑有城堡炮楼，易守难攻。郭长清独霸小韩营子村约十四、五天，萨县伪公署派人劝他归顺日本，编为萨拉齐“靖安团”，维护地方秩序。他当面大骂道：“日他祖宗！我郭长清只要有一杆枪也要打日本！”他在炮楼上竖起一面当时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显示着炎黄子孙的骨头，也激励着家乡人民不当亡国奴的志气。因此，所部又聚集到七、八十人。在此期间，高全营子（现属土左旗）伪保甲团长张科娶老婆，为了多收婚礼，把请柬送遍萨县所属各区署、大乡，惟独不敢给郭长清下帖。郭却借题发挥，致函张科责难，说是“论私看不起我郭长清，论公看不起打日本队伍，我将相机率部到高全营子陪礼……”。所谓陪礼就是要刀兵相见问罪，张科自然能够理解，为了保证平安无事，多次央人送礼送款，才算作罢。郭长清也怕日寇围歼，从小韩营子拉到大青山的六道坝歇马。

二

一九三八年秋，郭长清吉星高照，官运亨通。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从驻地哈拉寨派人到敌占区委郭长清为暂编骑兵第

三旅旅长，但要他把部队拉过黄河彼岸的准格尔旗应点；与此同时，北路军总司令傅作义也让驻在河曲的自卫军总指挥张钦，设法招抚郭长清。已进入大青山根据地的自卫军前方总指挥于存灏，即派中校参谋于维欧（字铭西、萨县大岱村人、北平辅仁大学毕业）与郭长清联系。郭长清部被收编为自卫军第五路，郭为指挥，史宜亭副之，于维欧为参谋长，旅因史宜亭阴谋夺权，被郭长清逐走，由张文采继任副指挥。郭长清结束了流窜生涯。

一九三八年九月一日，李井泉、姚喆同志率领一二〇师一部挺进大青山，组成大青山游击支队，改变了自卫军孤军对敌的处境，形成了八路军、自卫军两种力量联合，共同打击日伪力量的新格局。由于党的统一战线的贯彻，在大青山根据地出现了国共两党部队联合抗战的黄金季节。起初，八路军的指挥机构设于萨县、武川、固阳交界处的把总窑子，但在开展工作中，引起了日寇的极大恐惧。日寇调集松井旅团及驻包头的伪蒙古军第一师、驻厚和（现呼市）的第二师、驻四子王旗的第五师、驻武川的第八师，合计万余众，并有飞机四架助战，由萨县的水洞沟、武川的哈拉合少、固阳的大榆树滩、归绥的黑牛沟分进合击，“围剿”我大青山根据地。时值十二月中下旬，天寒地冻，大雪飞扬，敌伪首先与驻在六道坝的郭长清部接火，夜战之中该路副指挥张文采与卫士多人当场牺牲。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周旋，终于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证明大青山游击支队与自卫军联合对敌，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战后，郭长清部驻坝眼村，与小壕赖村相距很近，仅一丘之隔。一九三九年农历三月廿八日晨，日寇奇袭了驻扎在小壕赖村的自卫军前方总指挥部，郭长清始终按兵不动，未发一枪，故作壁上观，致使于存灏几乎被俘！

郭长清既当上少将指挥官，说话时就想文雅一些，要摆点官谱，怎奈幼年没有上学条件，急切又用运不好词汇，因此不免闹

出许多笑话。例如有一次与毛招财（郭玉林）会晤，由于家小人多，室内闷热，使人难以透气，郭拟到室外风凉一下，就边下炕边对毛说：“二哥：这家里太热，我出去聪明聪明去呀！”又如他到陕坝首次晋谒自卫军总指挥张钦时，张鼓励他说：“长清，你青年有为，好好打日本！”郭马上道：“不敢当，不敢当！还是总指挥老奸巨猾，能打日本人！”陪见者忍俊不禁，郭还正色说：“笑什么？人老成精嘛！”诸如此例很多，无庸详举。后来于维欧劝他每天认识三个生字，以开眼界，增长知识。

一九三九年秋，傅作义电令郭长清部移防黄河彼岸的张义成窑子、海流素一带。这时部队问题很严重，首先是土匪成性，军纪荡然，不象个队伍；其次是武器与服装食粮，上级不给补充，官兵薪饷更是无名无实；第三是军粮只能就地征食，这就必然招致民怨。郭长清为了摆脱窘境，召集有关人员作了反复磋商，制定相应解决措施。此时，副官长张万瑞与副指挥辛裕如为他献谋筹划，献策良多。

当郭长清向张万瑞询及整顿军队纪律问题时，张即向郭俯耳道：“必须如此这般的才行。”次日，郭长清要给指挥部卫士及特务连官兵讲话，好半天才算集合起来，但都是东倒西歪的不成队形。郭长清勃然大怒，厉声喊道：“副官长！”

“有！”张万瑞立正听训。

郭长清破口大骂：“没你这个副官长时，军纪不好，用上你这个副官长，连集合也站不齐队。”并随手拔出手枪来对准张万瑞，继续骂道：“告诉你副官长，再管不好兵，爷爷一坩旦就把你崩啦！”骂毕恨恨而去。

张万瑞在郭长清走后，对大家说：“你们都亲眼看见了吧？服从是军队的生命，到敌区让你刁，你不刁不行；在防地不让你刁，你要刁也不行。今后谁不听话，我也是爷爷一坩旦就把你崩啦。我是士兵犯纪律崩班长，班长犯纪律崩排长，排长犯纪律崩

连长。不信？你就试试看！”郭张二人的双簧腔演完后，第五路的纪律，的确比较好转了，但也仅仅是比较而言。从此，张万瑞威望日著，经常以副官长身份代理郭长清指挥各团，进入沦陷区游击，因能打能闹，被郭提升为第十七团团长的。

一九四〇年初，郭长清率部进入萨县境内活动，接得伪防共第二师参谋长马熙（字定远）转来一封亲笔信。因为在抗战初期，郭马二人曾携手杀敌，结为异姓兄弟。马以左脚负伤，愈后亦跛，又佐韩伍。马父时充章盖台村伪村长，为虎作伥，渔肉乡民，被自卫军第三路以汉奸罪名处死。马熙此信，无非向郭兄表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心迹，兼替乃父喊冤，希望得到郭长清谅解。此信没盖手章，且是文言叙事，经人讲解后，郭长清冷冷地说：“不盖手章的信，还算什么信？当汉奸就是当汉奸，何必哄人！”

一九四一年春夏之交，郭长清带卫士一班，由驻地到陕坝晋谒傅作义和张钦，被盘据在磴口（现东兴）黄河南岸的伪绥西联军师长陈秉义侦悉。陈即亲率数十人于中途截击，将郭部宿营地包围。郭在危急之中，顾不及指挥卫士，便手提轻机枪跳到房上，大骂道：“偷比陈（陈的绰号）！爷爷与你决一死战！你敢动一下，就把你一梭扫死，不要命的都上来！”他毛发倒竖，声若炸雷，使人慑胆，终于把陈唬退，安然到达陕坝。

五路元勋于维欧和辛裕如虽有芥蒂，但都顾虑舆论，尚未发展到互相倾轧程度，且因反共立场一致，都向郭长清灌输国民党的正统观念，影响郭的思想，所以郭长清在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并未与八路军接触过，但对共产党也是又怕又恨的！

三

自卫军第五路的武器、服装、薪饷、粮秣等，副司令长官部指示取之于敌（弹药有补给）。这种所谓“自力更生”的要求，

不啻明令进入沦陷区即可任所欲为，正合郭长清的意愿，且是所部老本行。因此，他为了解决上述困难，不时派队过河活动，伺机袭击日伪据点，向伪村政权摊派“抗日救国捐”，收抚或解决零星小股土匪。所到之处，以“救国捐”代替了赵半吊子（赵青山，土匪头目）的请财神（绑票）。真是郭部进村，鸡犬不宁，无论贫富，虏掠一空。特别是一年一度的鸦片收浆季节，沦陷区人民所遭灾难更甚。因伪政权要按亩征收，伪警察要逐户勒索，日特要借机讹诈，零星小匪要不时绑架，以致郭长清先后派出的大大小小各部，如不使用特殊残酷手段，就很难如愿以偿，不能敛烟到手。各部所得烟土，除一部分上交郭长清及自留吸食外，都向友军（如甘六师何文冕部）换取枪枝弹药，甚且专门派人到榆林作枪烟交易。因此，到一九四二年，郭长清的自卫军第五路，人马总数已急增为五百余人。

一九四一年约九、十月间，自卫军第三路李正才部与第五路郭长清部，被副司令长官部拨归军事委员会第一游击军张砺生节制。郭部改编为第二纵队，李部改编为第三纵队，旋又易番号为晋察绥边区挺进军。军令部长白崇禧从重庆派一名黄姓（名失忆）少将率领的四人点验组，在挺进军总司令部代参谋长冀家珍（字聘之）陪同下，到张义成窑子点验二纵队时，辛裕如诸人为郭长清编写的《部队创建史》上，把郭捧为“天生将才”。郭也以此自负，因为他经过数年的每天坚持认识三个字的学习，已能看懂一般例行文件，所以常对部众说：“我郭长清不论什么也比你们高一头，生活上我烟酒不动，打仗、识字，文武都行，你们呢？”“念书人不过就是识几个字吧，只说不做，又怕打仗，只能办文案，干点事务。”其实，郭长清对于知识分子是怀有戒心的，深怕他们伺机夺权，于己不利，所以态度暧昧，时近时疏，从不专信一人，惟辛裕如因有中统关系，久宠不衰。这不仅是因辛善于察言观色，更主要的是他想借助辛的作用，向国民党中央

扩大自己的影响。因此，五路官兵的若干战绩，辛每以平绥铁路特别党部下辖之爆破大队名义，径报国民党中央，骗取奖金。

一九四二年初，陈长捷任伊盟守备军总司令。他为了专权立威，杀鸡儆猴，于三月卅一日以“误会”为借口，派队击毙李正才，使所有驻扎在伊盟境内的各色游杂部队负责人，都觉得物伤其类，心惊肉跳。郭长清在惶恐之际，派兵收缴了第三路驻在公乌素村家属、卫兵的几枝枪后，立即派出他的军需主任李尚仁，以军法官的身份，代表他去东胜晋谒陈长捷，汇报军政情况，表示诚服。他本人却带领卫队星夜驰赴陕坝，面向傅作义哭诉道：“我跟副长官好多年了，副长官怎么就不要我啦？我不离开副长官，拨给谁我也不跟他……。”他哭得声泪俱下，活象孩子缠妈妈。因此，当五、六月间张砺生的晋察绥边区挺进军全部调到后套宴江县高柜一带时，郭长清的第五路成了直接归副长官部节制的骑兵挺进第二纵队，并仍驻守张义成、海流素一带河防，可谓没有白哭荆州。就在此际，早已为郭长清猜忌的第十七团团团长张万瑞，也想另辟蹊径。他直接去见陈长捷，表示向陈靠拢。陈因自己没有部队，当然更愿收编。待张返防后，郭长清当机立断，以擅离职守为借口，即夜便将张万瑞的武装解除，清洗了张在五路的亲信官兵，并悉数驱逐出境，不准滞留防地以内。但在半月以后的一个中午休息时间，张万瑞突然出现于郭的司令部大院门外。郭长清瞥然看见，速放手枪一发，将他打翻在地。经仔细辨认，原来不是张万瑞，抢救过来询问，才知道被击者是东北挺进军的一位连长，因坐骑走失，特来寻找，遭此不幸。郭长清派医务人员一路护理，用担架把他抬到哈拉寨，给了许多大烟及钱财，也仿效陈长捷击毙李正才的说法，以“误会”为名，上书马占山将军致歉。这位连长虽经治愈，但已残废！

自卫军三路参谋长王有功，继李正才为司令。他于一九四三年四月，以晋察绥边区挺进军别动队司令的番号，在菜园子沟建

立起司令部。次年二月黄河解冻前，王有功派司令部军需董然昌、连长王治国等率卅多骑兵，绕道伊盟，拟经马七渡口进入后套，与张砺生的总司令部取得联系。路经郭长清防区时，枪马统被解除，理由是“上级没有通知，王部不算队伍”。后经王有功亲自与郭面谈，又以“误会”为名，才发还少数东西。不仅如此，郭对其部下更是心狠手辣，全凭武力镇压，如发现哪个言行不满，或应付命令时，不是公开处决，就是秘密暗杀。因此，人各自危，无不畏俱。

郭长清为了扩充实力，每到敌区，不择手段，残民白肥，薪饱贪慾。他特别规定一条奖惩办法，即不管任何人，只要能缴获枪枝，或招抚零星小股者，按其价值多少，作用大小，给予物资奖励以至提升晋级。这不仅调动了所部官兵残民以逸的主动性，而且形成一个争相比坏的恶劣风气，故到一九四四年，郭部已发展为拥有一千四、五百人的乌合之众，他的连长以上的实力派人物，都是牛羊满圈，骡马成群的大户。排连长们大多从沦陷区抢掠民妇民女，作为自己的太太。郭长清本人积有多少黄金、白洋、大烟，很难估计其准数。不过自这年下半年起，就流传着“郭柜有，郭柜富，王柜瘦”的话。因郭友三有求必应，谓之有；郭长清聚敛很多，但不轻易给人，所以富；王有功积蓄虽少，且又贪吝不拔，故曰瘦！

四

郭长清自一九三七年十月至一九三九年之间的抗日活动，前文已略述梗概，毋庸详赘了。计自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中，他的部队先后越过黄河北岸，袭击了银匠窑子、三盛公、五牛惧窑子等日伪据点，摧毁了敌人的阵地；同时一度攻克萨拉齐火车站，给日寇以沉重打击；俘获日酋平仓义一并解送陕坝，受到副长官都明令表扬；配合第十七师郭景云部收复了磴口和黄河南岸

的敌伪前沿阵地新城，以及配合马占山部攻克了党山窑子对岸的新召，迫使驻在新召的伪西官府一个团退回将军窑子，从而粉碎了日伪驻军黄河南岸，长期威胁伊盟的企图。

因此，日寇把郭长清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全歼而后快；认为不肃清黄河南岸的自卫军第五路，黄河以北的萨、托地区就无法“强化治安”，故在每年黄河封冻后，必然进行一次所谓“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郭长清的部队。但郭长清每当黄河结冰前，即把非战斗人员及官兵家属，转移进后方的沙梁里分散居住，同时动员驻地居民也都随军迁走，只留少数轻骑应敌，在日伪大举“扫荡”时，略示抵抗，便撤到沙梁以内，隐伏在险要沙丘，凭隘诱击，倘或攻防激烈，立即调动沙梁内主力及时增援，找打犯敌的弱点。日伪因地势生疏，不敢贸然深入，坦克又在沙地无法行驶，只好用飞机临空滥炸，以大炮远距离轰击，结果一无所得，遂纵火焚烧滩地民房，惨败而退。待春暖花开前，郭部官兵及滩地居民，又都返回原处，搭房居住，老乡开始耕作，部队过河游击。

一九四三年，郭长清部的官兵给养，已奉令由东胜兵站按月供给，不再直接就地征食，故与驻地军民关系大有改善。一九四四年初冬，参谋长于维欧调职，受荐为萨县游击县长。有人问及郭长清：“请谁来当参谋长呢？”郭随口说：“这好办，蒋先生（蒋介石）那里来的人受权；阎先生（阎锡山）那里来的人爱钱，谁来也行。”不久，副长官部派山西人杨星甫任参谋长。杨为北方军校毕业生，抗战初期充李服膺部连长，因恨阎锡山枉杀李服膺，率部独树一帜打日本，旋与自卫军合伙，担任六路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八年冬，他挑选精骑数百人，成功地夜袭了伪厚和市（现呼市），声名鹊起，为人所称道。而今任他为参谋长，自然是内外翕服，都无异言了。但郭长清部队的纪律问题，是先天不足，积重难返，比杨星甫本领再大的人也无能为力！

一九四五年初，傅作义准备抢夺胜利果实，同时委派了绥远的各县游击县长。后来为了统一事权，傅任鄂友三为武、固、包萨、陶、凉、归七县行政督察专员；任郭长清为托、和、清绥南行政督察专员。

五

一九四五年四、五月间，山西应县人乔日成（字化文），率他的雁北支队到达自卫军五路防区。郭长清带着两个勤务兵，亲自赶着两只绵羊送去，表示慰问。二人前在陕坝相识，当系老友。寒暄之后，就说明来意。不料乔日成却说：“老弟盛情，我心领了。但不知这绵羊是你家自养的，还是从别处买来的？”郭长清回答道：“是向驻地老乡征索的。”乔听后马上正色说：“那我就不能收你这份礼！”接着又说：“你是司令，你带头这样搞，部下的纪律如何维持？再说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在自己的防地随便征索，民心积怨，为己树敌，群众将不支持你了……”。郭长清立正站着听乔说毕，马上就说：“老哥！我感谢你对我的开导，我现在就让把羊送回去！”乔即说：“对！咱们毕竟是好朋友！”

其实呢，乔、郭都是一样“毛色”的人，甚至乔比郭有过之而无不及。难兄难弟互吐衷肠以后，商定了今后行动计划，合兵出发，直奔所谓“黑城、甲赖、点勤素，除过洋烟没庄户”的绥远著名鸦片产区。

此时，第二次大战已近尾声，出现了日军在占领区无力控制点线；伪军不敢出面作战的局势。郭长清除留少数文职人员仍驻张义成、海流素一带办公外，所部全部挺进绥南地区，东闯西扰，横行无忌，摊款派捐，征收大烟。在托县境内，郭长清发现两个小媳妇合意，便要她们“待寝”。公婆、丈夫及本人都不愿意，郭却发怒道：“愿意得来，不愿意也得来！”遂令护兵强架以至。

因他财大气粗，有权有势，后来竟弄的小媳妇不愿意和男人过活了。郭即派兵把妇婿韩寿、郝华先后枪杀。

“八·一五”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乔日成率部急驱晋北，郭长清配合马占山将军收复了托县县城后，策军北上，直扑归绥（伪厚和，即现呼市）。先头部队到达市内大南街时，已近深夜。原驻小教场的伪蒙古军门树槐师，正与决心解放归绥的八路军激战方酣。郭长清立即指挥所部投入战斗，向八路军发起猛攻。时因连日大雨，山洪阻隔，八路军后援不继，只好撤退。天明即八月十六日，郭长清趁机为非作歹，混水摸鱼。他派兵打开伪“土业组合”、“大蒙公司”及“蒙疆银行”库房，夺取日伪遗留物资——烟土、现洋、绸缎、布匹等，用六轮大卡车连夜装运离城，然后率部撤出归绥市，回驻城南各村，并嘱咐所部道：

“你狗日们谁也不要进城（归绥）串游，看人家（长官部）抓住崩了你们的！”当时，国民党在各地的“接收”大员，多是用藏拙姿态发财的，惟有不是“接收”大员的郭长清，明人不作暗事，敢于公开“抢收”！

由于归绥城内秩序混乱，市民惶惶不可终日，战区第一纵队司令王有功在归绥商会会长阎瑛请求下，矫称奉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兼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密令，贴出三张安民告示，人心才算平定下来，街衢商铺，开始洗门窗，擦玻璃，准备营业。

战区高干随傅作义从后套回到归绥后，辛裕如向郭长清献计道：“要打深山猛虎，先安四邻‘土地’。现在猛虎已经到手，‘土地’尚未安抚，必将招致后祸。为今之计，应速分贿烟土，以堵众人之口。”于是郭长清即按十二战区所属党政军警各级领导人的地位、权力、人品、声望诸条件，分别馈送不等。傅部高干在抗日战争期间，蹙居后套，都非常艰苦。郭长清一旦进贡，无不笑纳。惟有财政厅长张遐民清廉自持，婉言谢绝，且亲书一函，将自己在抗日时所乘的一匹战马赠郭，鼓励他继续为国效力。

傅作义先生坐镇归绥后，责令李居义清点日伪遗留物资，发现绸缎、布匹、烟土、现洋丢失不少，即开具清单，行文郭长清责令交回。但所有大员及地方权绅都已“阻短”，郭长清有恃无恐，置之不理。傅作义也具体人具体对待，尤以反共形势需要，对郭未加深究，只令他火速回防整理部队。

此时，郭长清的部队，连同收编的伪军警已有两千人。郭万有、董占海、刘邦杰等五路元老，都拥资巨富，要享清福，不愿继续当官。因此，郭长清在所部改编为绥远省保安旅时，任魏岗、陈增福为第一、第二团长；任伪警归附者牛某（名失忆）及托县游击大队长肖得胜为两个预备团团长。傅派留学日本的凉城县人赵励师（曾充自卫军第七路指挥官，解放后任内蒙文史馆参事）接任郭长清的绥南行政督察专员职务。其后傅作义召开了一次奖励大会，分别授予鄂友三、郭长清、王有功、郭清云（郭四儿）所谓“民族英雄”称号，鼓励他们积极“戡乱”。

郭长清经过八年抗战，由无赖变成特殊将军，由穷光蛋变成富翁，名利双收。他先后在包头、归绥、北京置有房院多处，满拟终生享受，遗及子孙，不意就在他陶醉于民脂民膏筑成的安乐椅上闭目养神之际，驻在清水河县城的陈增福团，被八路军集中兵力，一举歼灭，除陈殒命外，副团长刘士鸿被俘。郭长清怒火三丈，恨气塞胸，亲率所有兵力，策马疾驰，前去报仇。他冒然直进，钻到八路军预设的埋伏圈里，顿时炮火连天，杀声四起。他见中计，心胆俱裂，顾不得指挥队伍，死命突围，才算没有当了俘虏。但检点人马，总共只剩二百来骑，只好自动辞职，给魏岗凑成一个团，自己去当富翁了。

郭长清本是马上起家的人，失掉兵权，甚觉无聊，更怕既得财产，保护不住，于是越过绥远省主席董其武，乘飞机到北平面谒傅作义，陈述覆军经过及“戡乱”决心。傅又让董其武给了他一个“救民先锋队”的番号，任他为指挥官，达到了纠集旧部，

东山再起的目的。可是，国民党此时已是垂死挣扎，故当郭长清的“先锋队”活动在绥南及山西平鲁一带时，狼奔豕突，到处碰壁。他发现向上级领到的轻机枪，由于后门没走到，有的竟然没有撞针。又去找董其武，虽然给他重新更换了，但仍无补于惨败。

一九四八年解放军围攻绥包时，郭率残部由绥南转移到萨县境内。解放军撤围后，他们即驻守萨县县城。迄一九四九年绥远的上层人士开始酝酿和平谈判时，郭长清觉得大势已去，遂又引退。他与骑十三旅旅长高理亭等人，集资合股，在狼山开设了煤场。绥远和平解放以后，让他到麻花板学习团学习，这本来是改造思想，悔过自新的好机会，但郭长清不愿去学习，所以当他在归绥最后一次面谒傅作义先生时，他向傅问道：“我不去参加学习行不行？”傅说：“学习是好事，你如不愿去，也可以吧。”因为郭长清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钱够花，觉够睡，吃不完，穿不穷，而且还有煤场可以营利，甚至蒋介石还可能回来，何必再接受什么改造教育！岂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一九五〇年郭长清被人民政府处决。他被镇压后，绥远省公安厅曾在报端启事大意谓：“该匪财物，散落各处者甚多，自登报之日起，限×日内主动上报交待，否则一经查获，即以窝赃论”云。

本文除笔者回忆所及外，承李尚仁老先生提供素材，顺致谢意。

席力图召及其属庙普会寺概况

扎木苏

席力图召（延寿寺）

席力图召位于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石头巷北端，西距大召约一百步，与之相邻，雄踞闹市，堪称召城（即呼和浩特市。因其旧时召庙众多，故有此称）双璧。

据《蒙古源流》及《阿勒坦汗传》等史籍记载，早在明代万历年间，达赖三世锁南坚错应土默特部主阿勒坦汗之请到呼和浩特地区宣扬佛教之际，西藏喇嘛希体图噶布鸠曾将藏文《般若经》译成蒙文，达赖三世遂赐之“班迪达固希巧尔气”的法号。

万历十六年（1588年）达赖三世在内蒙古圆寂。遵照他的遗嘱，希体图噶布鸠寻认阿勒坦汗之孙松木儿台吉的儿子为达赖三世的转世“呼毕勒罕”。这就是后来的达赖四世云丹嘉错。此后，在希体图噶布鸠的护持下，达赖四世举行了坐床典礼，并学习经典。于是，希体图噶布鸠获得了“席力图呼图克图”的称号，是为“席力图”一世。“席力图”蒙语为“法座”、“首席”或“有权坐座”之意；“呼图克图”意即“活佛”。其所居召庙亦即称为“席力图召”。据口碑所传，当时的席力图召即今日召庙中西侧的“古佛殿”。其面宽进深各三间，形制甚小，为汉式建筑，始建年代在万历九年（1581年）。另有一说，认为席力图召是在万历十三年（1585年）由阿勒坦汗之子僧格都楞汗所创建。两说孰是孰非，尚待考证。

万历三十年（1602年），希体图噶布鸠护送达赖四世到西藏

坐床返回呼和浩特后，即扩建席力图召，始改为汉藏混合建筑形式，奠定了今日形制的基础。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清人钱良择所见到席力图召已是“金碧夺器”（《书塞纪略》），成为一座七七四十九间的大召庙了。

此后，康熙三十三年至三十五年（1694--1696年），席力图四世在清廷的支持下扩修了席力图召。据《托音二世传》载，扩修后的席力图召为三进，最前面是可容一千喇嘛诵经的大“都钢”（经堂）；其次是十二丈见方的两层楼主庙，外饰彩绘；最后面是十间丈长的天堂楼房。都钢两旁各有三座小庙，后楼的两旁又各有两座小庙。1696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凯旋后，驻蹕呼和浩特，赐寺名为“延寿寺”。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在康熙的授意下，刻满、汉、蒙、藏四体文字记功碑，分立于席力图召和小召（各三通）。今碑石尚存。

咸丰八年（1858年），席力图九世又重修殿基，增高了数尺。大约与此同时，在经堂前的东侧跨院儿内修建了一座双耳浮雕汉白玉白塔。

光绪十三年（1887年）席力图召发生火灾，将庙仓和佛爷府几乎全部焚毁。十七年（1891年）才再次重修。

一九四三年，席力图召再遭火灾，原有佛殿和九间楼遂焚毁无存。解放后，人民政府在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九年三次重修席力图召。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席力图召又遭劫难。召中陈设被毁坏殆尽，建筑亦受到严重破坏。到一九七〇年其两侧的乃春庙亦遭火灾，整个召庙真可谓是“百孔千疮”了。

一九八一年，人民政府再次拨款重修席力图召。经堂部分现已修缮完毕，山门、过殿正在修缮之中。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席力图召占地面积为1316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整个召庙座北朝南。山门前有过街牌楼一

座，为三间四柱七楼式，楼顶皆铺绿色琉璃瓦，飞檐斗拱，脊端均有鸱吻；另有石狮子一对，雄踞于东腰座上。山门面宽三间，为歇山顶式建筑。两旁开二门，为砖砌仿木结构垂花门。门上雕工精致，刻有梵文图案。

入山门的第一进院，两侧有钟鼓楼和厢房，北端正中是面宽五间的歇山顶式提过殿。殿前有旗杆一对，矗立于方形柱基上。过殿檐前有廊，外有露明柱，两侧各开垂花门。

过殿以北的第三进院，有碑亭两座和大经堂，西侧为乃春庙。

席力图召的经堂建在一座九级台阶的砖砌高台上。其宽七间，前为藏式平顶，中间置一鎏金法轮于白塔基座上，两侧各立“角端”（俗称“独角兽”）；后连歇山顶，中有鎏金宝顶，两端为表面雕以云龙图案的巨型鸱吻。殿顶铺绿色琉璃瓦，四周为藏式围墙。墙外镶的蓝色琉璃砖，上部为两层横向饰带。整个经堂显得庄严肃穆、富丽堂皇，十分气派。

经堂前东侧有一跨院，内建白塔。相传由于席力图七世、八世早夭，故席力图九世特建此塔以供长寿佛。塔为覆钵式喇嘛塔，用白石雕砌而成，通高十五米，建在一个砖砌方台上。其下为束腰座，用白石条雕砌而成。束腰部四面正中雕有火焰，两旁分列二立狮，前爪撑起莲花座顶部，四角立盘龙石柱。束腰座为五级阶梯式，最下一级刻图案花纹，上面四级刻梵文六字真言。塔身为宽肩型，周围饰以缨络，南面正中有火焰形佛龙。塔刹有十三相轮，覆以宝盖，上置铜制星月。白塔的纹饰都采用五彩，色调对比十分鲜明，加之雕工精细，构筑灵巧，不愧为白塔中之佳作。它是内蒙古地区现存最完好的一座白塔。

席力图召规模宏大，建筑瑰丽，集喇嘛教寺院之大成。特别是大经堂的构筑，采用了藏式平顶和汉式歇山顶的巧妙结合，形成了一种汉藏合璧的建筑风格，从而被认为是喇嘛教寺院建筑

的典型范例，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和东方建筑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普 会 寺

普会寺，蒙语称为“好特劳尼鲁格勒其苏模”，坐落在呼(市)武(川)公路八十公里处，希日穆仁河南岸。希日穆仁——亦作沙拉木楞，俗称“召河”——是一处水草丰美，景色宜人的避暑胜地。

普会寺是席力图六世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奉旨修造的。建成后，乾隆帝赐名“普会寺”，为席力图召的属庙。

普会寺院沿纵轴线依次是山门(天王殿)、大经堂和九间楼。山门面宽三间，为歇山顶式，旁开二门。山门内院落空阔，正北即为大经堂。经堂前有石座幡竿一对(今剩其一)。经堂建在六级台阶砖砌台基上，面阔七间，两稍为迴廊，围以朱漆露明柱。殿身宽五间，中间为朱漆大门，上有楼间。殿顶前为藏式平顶，置法轮、角端；中及后均为歇山顶，脊中均置宝顶。前后相望，殿顶层次分明，给人以波澜起伏之感。整个建筑均用青砖青瓦，配以银白色的横向连珠饰带，在鎏金宝顶、法轮及角端的辉映下，显得庄严朴实，素雅大方。

寺院两侧有三进深之院落。其正殿为席力图六世“坐化”之处。相传席力图六世的真身曾供奉于经堂首席，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才毁于浩劫。

历史上，普会寺是席力图召历届活佛的行宫和避暑之地。近年来，国家拨款重修寺院，并在寺院前方修建了多处带有浴室的蒙古包，供前来观光的中外旅游者居住，以体验草原生活和领略草原风光。召河，现已成了名驰遐邕的旅游胜地，凡到呼和浩特的外国客人和港澳同胞都要到此一游，以饱眼福。

绥远教区圣母圣心婢女会初学院简介

罗 撒 张振英

一九四一年春，绥远教区主教穆清海（比利时籍），创立了一个中国修女会——圣母圣心婢女会，并在原萨县所属的小巴拉盖村修建了一所初学院，为专门培训国籍修女的机构。

小巴拉盖村位于现在的包头市东南六、七十里，是绥远教区下属的区堂。村里有一个规模较大的教堂和几个小堂，由一区长神父主持教务。全村百姓基本都是教友。教会的建筑占全村的一半，除婴儿院、贞女院、老婴孩院和比利时奥斯定修女院外，还有两所教会学校——培英中学和启秀女校，是培养教会人才的基地。

初学院于一九四一年建成，是由小巴拉盖教堂本堂顾克神父（比利时籍）负责施工建造的。它位于教堂的西北角，启秀女校的后面，四合院，占地一千多平米。正房有十多间带走廊的房子，东面是院长室和缝纫室；西面为寝室，里面顺北墙是一溜长炕，每人的被褥之间用三尺高五尺长的墙隔着，相互之间谁也看不见谁，床头还拉着一块白布帘子，一人有一小黄木柜，以放衣服和牙具等用。白天寝室的门常锁着，显得室内很阴森。西房有一所小圣堂，可容20多人，供初学者望弥撒、听道理和念日课等，砖地上有几排黄色的小跪凳，初学者在此看圣经或做祈祷。正面圣台的神龛上，高竖着一个十字架，白色的耶稣苦像闪烁着银色的光辉。另外还有更衣所、病房、大饭厅、伙房、洗衣间等。院的南面是堆杂物的地方，东南角有一红色的院门。整个院子是砖瓦结构，室内和走廊里粉刷得雪白，有白灰铺成的引道通

到房门前。庭院里还有十几棵葡萄树和几棵其它树木。这里尽管住着十几个人，却很肃静。偶然有个头披黑纱，身穿黑袍的人影，也是从这边房里出来，匆匆地又往那边屋里去了，没有一点嘈杂之声，显得冷冷清清。

圣母圣心婢女会初建之时，由绥远教区指定比利时奥斯定修女会代管，并派一名奥斯定修女为初学院院长，掌管经济、人事、培训和日常工作。初学者主要来源于贞女，也从启秀女校选拔一些中学毕业而有志于为教会服务愿当修女的教友女生。学生毕业的初学者，一般家里都是老教友。如第三期的张振英，出生于一个多年信仰天主教的家庭，从小在教会小学学习教会的要理、问答等，后就读于启秀女校，因父亲在世时许愿，让她也出家当贞女，所以毕业后，就去找当时的婢女会会长，要求进入所会。每个初学者入会时，必须交纳会费现大洋数百元，衣服被褥自理。这对于家境不好的人来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只好四处求借，分期付款。入院后除了自备的衣服被褥外，其他一切个人心爱的珍物连同会费一律由会长验收，私人不可存留一点。

初学院的生活有着严格的规定，每个初学者必须遵守。每天早上五点起床，洗漱后，进入小圣堂念早课和“默想”。大约半小时后，神师穿好祭衣，上祭台举行圣祭。初学者端端正正跪在一排排黄色的小凳上念经，把自己同耶稣当做祭品，由神父的手奉献给在天大父，然后由神父的手恭领耶稣的圣体到自己的心灵内，祈求耶稣保佑一天的工作和生活。初学者在跪小凳的技术上均有过硬的本领，尤其在冬天冰冷的砖地上，穿一件小棉袍，要同穿小皮套大袄的会长一跪就是一、两个小时，滋味很不好受。天长日久，她们膝盖上长出了一块块死肉。

上午有半小时的尽“本份”时间，做院长分配的工作，主要是打扫寝室、饭厅、厕所、走廊，每星期轮换一次。院长要检查。九点钟时，神师到初学院讲修会的会规、教会的道理。当时

讲授的神父有顾克、穆清和等。他们所讲的道理主要是贞洁、听命、神贫等内容，也叫“三愿”。“贞洁”就是使人完全脱离社会，弃世绝俗，以隐居、出家修行为楷模，终身过着独身生活，完全把自己献给教会；“听命”即服服贴贴地听会长之命，把会长的命当作天命，完全服从修院安排的工作和分配，没有个人的意愿；“神贫”即个人不得有任何财产，思想上不能有任何财产上的欲望。凡初学者的一切统统归教会所有。神师讲道理之目的，就是要把每个初学者调教成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个人意愿，完全服从于教会的忠实修女，为以后发“三愿”，从而终身为教会服务、献身打基础。

每日下午初学者定时回小圣堂念日课经。人人拿着本本，背靠墙，面对面，排成两行，由一人领，众人应，念时一律用假嗓子，发出尖细的女高音。日课经的主要内容是祈主保佑、感谢主恩。

初学者必须严格遵守初学院里的规矩。青年人本来是朝气蓬勃，爱说爱笑，既好新奇事物，又喜社会往来，但进入初学院后，就开始过上清心寡欲、孤僻寂静的生活。平时走路，低着头，不敢正视。碰见了人，不许先开口问好。连初学者彼此见了也不能说笑，只许轻声问候对方一句。每日除晚上就寝以外，初学者不可随便进入寝室（值日打扫寝室的除外）。初学者一律要到饭厅用餐，饭厅里有一个大桌子，院长坐在当中，两边坐着初学者，中餐西吃，用刀叉，一人一个盘子，由值班的盛饭。寝室、圣堂、饭厅不准随便说话。在“瞻礼”日（即礼拜日），虽然可以随便说话，但不能大声，更不能说别人的长短。如违反了这些规矩，轻者要受到初学院长的斥责，重者要受到处罚。

初学者的父母、直系亲属叩门求见，先得请示初院学长批准，在一人的陪同下，才能会见。会面一般在外面的会客室，因为初学院是“圣地”，除神师以外，别的人不许进入。会面后，要把和父母亲属所谈的话一字一句向姑奶奶（对院长的称呼）汇

报。往来家信，必须经过初学长的检查。在大避静期间（每年有一个星期专务神修），甚至连家信一般也不许看。

总之，“听命、神贫、贞洁”的说教成为初学者的主要课题。一日之内，初学者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望弥撒、听道理和念日课上，其余时间，有的洗衣服，有的缝衣服，有的在厨房做饭和从事其他劳动。听命守规、克勤克俭成了她们特殊的生活方式。

初学院培训期为二年。初学者首先要经过半年的保守期（入会前的预备期）。保守期满后，从第二年的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就换上正式的会服，脱离世俗，进入初学期，期限一年。第三年的三月二十五日，初学者向修会发“三愿”，成为修女。这次发“愿”为一年“愿”，以后一年一次，从第四年开始发三年“愿”两次，九年时发终身“愿”，表示终身为教会服务，一辈子遵守“三愿”。初次发愿后，初学者还得在初学院实习半年，完成二年的初学。

发愿仪式在圣堂举行，凡发愿者身穿会衣走上祭台，横排成一行，跪在主教或神师、本堂神父面前。主祭者给每个发愿的人右手无名指戴上一颗银戒指，表示把自己的爱献给了耶稣。戴戒指仪式后，发愿者匍伏在祭台前主祭人的足下，两个辅祭者用一块大黑布把她们统统埋盖起来（这块黑布表示发愿者决心脱离人间，死于世俗的意思）此时，发愿者把事先写好的“愿”念出来，然后会长收“愿”，自己再在上面签字。主祭者向她们念经，举手画十字，行视圣礼。礼毕，辅祭者把大黑布揭去，发愿仪式结束。

会衣是修女的法衣，发愿者在发愿期内经常得穿会衣，不得更换。外国修女的会衣多是白色的，头披黑纱，迎面看去头上好像有两个角。圣母圣心婢女会的会衣也大同小异，但分大会衣和小会衣。大会衣是一件无领无扣的套头黑色长裙，宽肥大袖，衣长

拖到脚稍，小会衣套在大会衣外，作大会衣的罩衣，也是黑色套头分前后两条，宽一尺多，长和大会衣一样。小会衣里面，腰中间有一条带子，穿上大会衣用这条带子把大会衣折叠均称，紧紧系在腰间，这样纤细的腰身下面好象系着轻盈、飘洒的长裙。头上披一块黑纱，眉稍脸颊微露着白边。脖子也用白布裹着，下面有一尺见方的白布牌子，端端正正悬着一个亮晶晶的十字架。右侧腰间佩戴着一串大念珠，沉甸甸地拖至膝盖。穿会衣的初学者走起路来，头微微垂着，两个脸蛋被白布包着，眉、眼、口、鼻显得小了些。左手轻轻放在胸脯前，右手不论念经还是不念经，总是提着大念珠。她们走动、站立或跪在十字架下，浑身上下发出“沙沙”地响声，一举一动均是一个模式、一个形态、一个风格。

初学院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五三年先后收了五期学员，共培训出三十八名修女。第一期初学者九人，主要是贞女，一九四一年进入初学院。罗德贞（奥斯定修会修女，比利时籍）为会长，但她在本期末发愿时，就调往非州。贾修女（奥斯定修会修女，比利时籍）为初学院长，实际负责修会和初学院的工作。第二期初学者十一人，除一人为学生外，其余均为贞女。一九四三年进入初学院。因为一九四三年三月二日本人把在中国占领区的敌对国家外国人全部逮捕，在小巴拉盖的比利时神父、修女也无一幸免，所以本期由比利时修女指定毕业于第一期的韩进珍为会长，南志英为初学院长。从本期开始，中国教会培养国籍修女上大学，所以发愿后，有两人就读于辅仁大学。第三期初学者八人，一九四六年进入初学院，会长韩进珍，初学院长苏修女（比利时籍），其中两名初学者被开除，原因是会长说其无“圣召”（没有天主召唤的意思）。第四期初学者五人，一九四八年进入初学院，会长韩进珍，初学院长为比利时史修女。这时正值绥远解放前夕，为了逃避解放，由南志英带领本期初学者和预备参加

第五期的学生共二、三十人迁往后套地区。一九四九年秋，绥远解放后，这部分人又迁了回来。第五期初学者七人，主要是学生，一九五三年进入初学院，会长为韩进珍，初学院院长为庄佩芬。这期初学者在进入修会前，就于一九四九年顺先到北京进行了培训，学习了三个月缝纫等技术。这是最后一期初学者，从此以后初学院的历史就结束了。

圣母圣心婢女会总会设在小巴拉盖，在二十四顷地、固阳、小淖和呼市各堂口成立了分会。修女们有的当裁缝，有的开诊所，也有的在教会学校执教。她们对工作认真、勤恳，为社会和教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第八战区战地工作委员会 与党政总队概况

靳卫国

一、战地工作委员会活动情况

1940年3月20日至3月底，傅作义将军指挥所部，袭击了五原县城内日军指挥部，将五原城内及其周围各据点之敌全部歼灭，收复整个河套失地，获得闻名中外的五原大捷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军的战斗力量，深入了解敌占区的日伪军活动情况，为在适当时机进行反攻做准备，1940年夏在陕坝成立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战地工作委员会（简称战工会）。其主要任务是：1.搜集日寇军事情报（包括日军驻地、兵力调动、防守工事构筑、通信设备、武器装备、指挥官姓名、日伪军之间的相互关系、敌区内的民众情绪以及其它方面的有关情报等）；2.在日寇侵占地区建立地方政权派遣游击县长，开展游击活动；3.指挥游击部队深入敌占区进行游击战，相机歼灭日寇有生力量；4.派员与伪军秘密联系，进行策反、分化工作，争取伪军早日反正起义，共同抗击日寇。

当时负责筹备这个组织的人为李英夫（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任三十五军参谋处长，绥远省游击军旅长）。后因李英夫调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戏剧学校校长，又由赵励师负责。委员会主任委员傅作义兼，委员中有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长鲁英麟、总参议张濯清、参谋处处长张副元、战区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李世傑、绥远省政府秘书长于纯斋、民政厅长陈炳谦、建设厅长曾厚哉、教育厅厅长阎伟、财政厅厅长李居义、绥远省党部

书记长张庆恩、绥远省青年团干事长赵仲容等人。由于委员会专职人员少，工作开展的不太好，1944年夏，傅作义长官为了积极准备反攻，加强和开展敌后工作，又将战工会进行充实改组，增设了一些常务委员和几个工作地区。常务委员除原有的一些人外，又增加了绥远省复兴委员会主任张钦、省政府委员张国林、省社会处处长常佩三、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谋李大超、高级顾问苏纪忍、第一游击区司令苏开元、第二游击区司令刘万春等人。傅作义长官指定张庆恩为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增设的工作地区及负责人有：绥远地区，由赵励师任主任，张国林任副主任；平津地区，由苏纪忍任主任（在天津法租界前西北军旅长刘厚通家中设有秘密电台一部）；东北地区，由李大超任主任，李英夫任副主任（二李均是东北人，在张学良属部关系较多）。另外，又增设特工处，由张庆恩任处长。

战工会经过这次充实与调整，各方面的工作均有大的进展。特别是对各地日军情报的搜集和游击区内的活动以及分化、策反伪军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效。其中尤以苏纪忍对平津地区日军的情报搜集，不仅及时，而且较为准确，对抗战工作确实发挥了不少作用。但中统分子张庆恩却借着秘书长的合法身份和特工处处长的特殊职权，抓着这个抗战组织机构，进一步发展其调统势力，开展其反共特工活动。他为了加强对战工会工作的控制，将其亲信王兰田调为战工会秘书室主任秘书，王黎生调为榆林站负责人，魏纯美调为安边站的主任，把特工处完全掌握在一人之手。同时他又施展其两面派手法，为博得傅作义长官的欢心，投其所好，假装忠顺服从，在关键时刻替傅作义吹嘘，尽量想法在蒋介石、陈果夫、陈立夫和傅作义之间建立密切的关系，骗取了傅作义对他的信任。

傅作义长官虽任张庆恩为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和特工处处长，但在执行业务上凡是关于日伪军方面的军事调动及对伪军分化反

正等情报，仍由所派地区搞军事及策反负责人员通过电台径向傅作义汇报，并交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处情报科负责处理。张庆恩在这方面插不上手。其次对各游击县长的人选方面也完全是由傅作义主席亲自审核任命派遣，张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权力。只是在政治上对共产党的斗争方面他可以用特工处的权力对他所指挥的中统特工人员发号施令，扩大中统势力，秘密渗透到各个方面，大搞其反共活动。

张庆恩之所以多方设法讨好傅作义，就是为了取得傅对他的信任，企图用战工会这个公开机构，打着第八战区副长官部抗战的幌子，开展中统活动，以扩大中统的影响。为此，在某些地方为一些人所不满，以致发生争吵。有一次召开委员会议，傅作义长官因事不在，由张庆恩主持。在研究讨论业务分工与工作细则问题时，苏纪忍和张庆恩大吵起来，最后不欢而散。自此以后，战地工作委员会即行结束。傅作义为了照顾各方，因人设事，将战地工作委员会改为战工处，由赵励师担任处长，张国林担任副处长。复员委员会独立存在，仍由张钦任主任委员，常佩三任副主任委员。张庆恩的特工处改为党政总队归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直接指挥。

二、党政总队的活动情况

战地工作委员会结束之后，有关平津和绥远地区等方面军事情报的搜集工作，即直接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处情报科领导。赵励师负责的战工处，只是在名义上搜集一些敌后游击县政府等地区的一般性军政情报。张庆恩负责的特工处仍然是搞反共宣传和搜集有关共产党方面的情报和侦察及破坏共产党的活动等特务工作。特工处在人事编制上比照第八战区副长官部其他各处的人员编成。处内设少将处长一人，由张庆恩担任；上校秘书一人，由王兰田担任；上校科长三人，第一科科长王兰田兼，第

二科科长为王黎生，第三科科长为杨格非。中校科员三人，少校、上、中尉级科员若干人，工勤人员数人。其中有张毓楷、谭觉民、夏江、王鹤勋、薛宝麟、王干造等二十余人。为了侦察搜集共产党方面的情报，又在陕北及其它地区设置了几处情报站，计有：榆林站（负责人为祁觉民）、安边站（负责人为魏纯美）、神木站（负责人为郝修理）、府谷站（负责人为刘毅美）、河西（黄河西岸）站（负责人为樊毓泗）、大青山站（负责人为王明中）。这些人虽也都戴着上、中校官级的符饰，但都是不在编制的黑官。

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特工处这个机构，是傅作义长官临时为照顾张庆恩组织的一个未经过国民党中央备案的黑机构，工作起来不怎么名正言顺。因此，张庆恩为便于开展工作又在傅作义长官的支持和同意下，以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的名义，以为适应战区工作的开展需要，向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请示拟成立一个“政治工作总队”（实际是以此来代替特工处的工作），并以张庆恩为队长。这一请示一报上去很快就得到军委会的批复。但为了和其它战区统一起见，要成立“党政总队”。总队长人选另行决定。其原因是“党政总队”这个组织机构是属于军统系统，其总队长人选均由军统局选派，张庆恩是中统分子，由他来担任总队长职务是逾越这个界限的。军统局在批复傅的请求时，即决定调现任某战区（记不清是哪个战区）党政总队长乔家材到傅部来担任此职（乔系山西交城县人和傅作义是山西同乡，估计傅会同意）。但傅作义不愿意让军统分子担任这个总队长。为此傅作义曾多次保荐张，认为张庆恩在绥远省党部书记长任内功绩显著，目前工作需要，又人地相宜，坚持以张任此职为宜。国民党军委会碍于傅作义长官的情面，不得已破例允其所请，让张庆恩担任了此职。但在张庆恩未正式批准任命为党政总队队长之前，乔家材已来到第八战区副长官部的驻地陕坝市（此时改为

市)。军统局的特务头子戴笠也曾借视察之名，来陕坝同傅作义长官商谈此事。经过协商后，乔家村在离陕坝二十余华里的大双成村一个大教堂内成立了一个“中美合作训练班”，由他担任教育长兼班主任。

第八战区党政总队约于1945年1月正式成立。它的全称为“军事委员会第八战区党政总队”，直属于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领导。总队设少将总队长一人，由张庆恩担任；少将（或上校）副总队长一人，由柴玉峰担任（柴字洽堂，山西省荣河县人，是跟随傅作义的老干部，曾任傅部绥远游击军上校团长，傅派他担任此职是让他从中监视张庆恩，必要时取而代之。）；上校秘书一人，由王兰田担任；中校秘书一人，由史其昌担任；少校上尉办事员三人，由周鸣、白公德、秦辅翼等担任。总队内设三科。第一科科长樊毓泗，第二科科长邵厚德，第三科科长杨格非。各科人员有武兆瑞、谭觉民、夏江、白自强等。总队部办公地址设在绥远省党部前院。总队部中除柴玉峰是新人外，其余基本上还是战工会特工处的那一班人。总队下属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因在人事上不好安排没有设大队部，只成立几个直属分队。鲁凤昌任雁北地区分队长；刘慧之任河套地区分队长；清水河由该县县长孔尉章兼任分队长；凉城县由该县县长乔汉魁兼任分队长。第二大队临时由赵大义担任大队长，活动地区为接近晋察冀边区附近一带地区。第三大队大队长为祁觉民。同时，安边情报站改为一个分队，分队长许仁山；榆林情报站改为一个分队，分队长王树滋；神木、府谷及麻地沟两个情报站改编为一个分队，分队长郭理修。

党政总队的主要任务，是为了配合抗日军事工作，在敌占区开展党政活动。但实质上并未做到这点，而是以反对共产党为其主要目的。如总队在雁北地区活动的鲁凤昌直属分队，表面上是专门搜集日军的军事情报，而其所负的使命却是在应县山区与乔

日成加强联系。乔日成的部队名为抗日，实则反共。鲁凤昌和乔日成两者互相依附利用，在反共活动中立了不少“汗马功劳”。又如在陕北榆林的第三大队所属各分队，执行的完全是中统特工处的那一套反共政策，工作对象是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侦察搜集解放区的政治、军事动态，开展宣传、造谣和分化、瓦解工作。此外张庆恩为了加强其特务活动，仿效军统局在大双成设立的中美合作训练班（此班曾培训出一批别动队武装特工人员），培养一批武装特工人员，以备随时派往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特呈请傅作义长官批准在绥远干部训练团，成立了一个“游击干部训练班”，由傅部各部队中调选了大胆敢干的优秀官兵三百余名，参加受训。训练班编为三个队。队长由三十五军新三十一师第九十三团副团长邢绍俭及新三十二师某团营长马玉麟和张庆恩特工处时的得力助手程又新三人分别担任。原计划训练半年，但训练尚未期满，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接受日本投降需要大批军事人员，该训练班提前结束，分别随部队东进。程又新所带的那个队，因编训时调选的都是善于搞特工的人员，即奉傅作义命令由程又新率领跟随党政总队向归绥前进。

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前，国民党中央为准备将来反攻时让傅作义将军率领所部沿平绥铁路线向平津之日军进攻，即任命傅作义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八·一五”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中央又任命傅作义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受降官，接受日军投降。傅作义任命孙兰峰为第十二战区受降官，并成立东进接收指挥部。接收大员中有陈光斗、孟昭第、王雷震、周钧、苏纪忍、张庆恩、李大超、李英夫等人。张庆恩即率党政总队全部人马跟随孙兰峰的指挥部由陕坝开抵归绥市。为便于工作开展，张又任命杨格非为第二大队队长，并在归绥市小西街某大院内开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招收了当地青年五十余人（其中有一部分当过日伪警察），由杨格非兼任班主任，负责主持训练

班内一切事宜。招收的这些青年，不明底细，看到第十二战区长官司令部招收所谓“党政总队训练班”学员，热情很高，认为有了为祖国出力报效的好机会，报名的人很多。由于录取的名额有限，好多未录取的人，感到非常难过，认为是一大憾事。训练班仅办了四个星期，就毕业分配到第二大队参加了工作。张庆恩随同孙兰峰到达归绥后，即将绥远省调统室的特工人员与党政总队合在一起，进行特务活动，每人都身着军服，以抗战有功和胜利者自居，每到一处都受到人们的恭维。尤其是给日本人做过事的那些小汉奸，对他们更是尊敬，馈赠财物，以便得到保护，逃避惩处。自1945年8月中到10月中，仅两个月时间，党政总队的队长和特工人员，都多少不同地接收了财物。其中如王兰田从后套来归绥时，只带有一个破箱子，仅两个月时间就箱柜罗列，用具一新，连厨子都有了。傅作义为整饬纪律，严惩贪污及不法分子，将包头市警备司令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马秉仁撤职关押（马是傅的早年保定军校同期同学，又是结拜好友，前游击军司令），将参谋长唐希舜撤职、副官处长袁荫农及王华亭与王××（大汉奸蒋辉若的副官长）等人执行枪决，并在归绥市枪毙了赵亚民，在政府部门掀起大惩贪污之风，党政总队的特工分子，才不敢再行胡作非为。

党政总队在归绥市小西街某院内驻扎期间，正值解放军围攻归绥和包头前夕，除在陕北榆林地区的第三大队及其所属各分队和在河套地区的刘慧之分队，仍在原地区进行活动外，其他大队和直属分队以及临时派到萨县、包头的秦辅翼、陈元夫等，全都调回归绥市。在榆林的第三大队队长祁党民，因事来绥不能返榆，也临时协助工作。在绥远围城战役中，张庆恩除负责党政总队和调统室的工作外，傅作义长官又命他为归绥市保卫工作队的负责人之一（当时归绥市各区均有一个保卫城市工作队），并将党政总队进入归绥市的程又新队，改编为铁甲车大队，由程又

新任队长参加了围城战役的多次战斗。张又将在归绥市招训的学员，大部分派到城市保卫工作队中工作；由后套带来的特工人员大都布置在归绥城内及郊区进行搜集八路军的情报活动。其中表现最积极的为鲁凤昌。鲁每天亲自带着便衣武装特工人员，在郊区各村庄如一家村、桥靠、复兴营子、麻花板、攸攸板、厂汗板、毫沁营子一带秘密监视、刺探情报，并发展一些情报人员，每天进城送情报，在解放军围城期间立了不少“功劳”，受到傅作义的嘉奖。后来鲁凤昌出任和林与兴和县县长，跟他在这次战役中猖狂反共，立功受奖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党政总队还在旧城小南街某商号内设立秘密工作情报站，经常派特工人员化装成小商小贩和外地商人接触，侦察、搜集情报，监视来往客商。在绥包围城战役中，党政总队在归绥城内外的侦察搜集情报活动，确实为城防部队和野战部队的作战发挥了不少作用，为张庆恩在傅作义部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解放军为战略上的需要，主动转移撤退，绥包围城战役即行结束。不久国共两党在重庆召开旧政协会议。出于当时的形势，这个不得人心的党政总队被迫撤消，所有人员由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作了有计划的安排。一部分仍回到绥远省调统室，一部分介绍到地方部队中搞情报工作。由程又新负责的铁甲车大队，因在绥远围城战役中，多次与解放军作战，得到第十二战区长官司令部的物质奖励，所以在战役结束后，程又新调为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部纪律科上校科长。程从铁甲车大队选调了三十多名有特工技能并愿为中统局效力的人员，携带着武器弹药驻在新城与旧城之间的姑子板。纪律科名义上看来好像是为了整个长官部所属部队的纪律的，实际上是在第十二战区长官部的掩护下，由张庆恩直接指挥着进行秘密特务活动的组织。程的具体任务之一，就是看管五塔寺内被捕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嫌疑人员。除此之外，尚有一部分人员通过关系转到北平去工作。如杨格非转到北平市

“平民日报社”担任编辑工作。这些人虽然离开，但在需要时可以随时召来。1947年张庆恩调到察哈尔省后，王兰田、王黎生、程又新、董叔明、王明中等调统骨干分子又都调到张家口市。王兰田担任张垣绥靖公署“青年建国训练大队”（简称青训大队）大队长。主要任务是训练在作战中被俘过来的解放军官兵，争取他们背叛共产党为国民党工作。程又新调到张家口市担任张垣绥靖公署“爱国青年招待所”所长。主要任务是把一些有共产党嫌疑的进步人士以及从各处扣捕的共产党人，用说服及欺骗手段，使其叛离共产党，参加中统局的工作，以此来哄骗社会各方人士。董叔明调到张家口市担任察哈尔省调统室主任，继续操他们的老业，搞反对共产党的活动。

竞选“国大”代表的丑剧

全慎修

大约是一九四六年九月的一天，我接到归绥市政府教育科的通知，让我担任归绥市工会系统“国大”代表投票管理所的投票管理员。到达投票所才知道，这个投票管理所的主任正是教育科的科长胡存信，难怪他从小学教师中寻找我充当工作人员。

投票管理所设在归绥市席力图召的大殿高台上。大殿的门关着，正中悬挂大幕布，幕布中央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并遗囑，像左右分别挂着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民国国旗。在旗的左右分别挂着黄纸黑字的候选人名字：吴耀庭，韩男。

台上摆着两排桌凳，后边一排是主持投票的主任、副主任以及临场监选的负责人的席位，前边一排是供选民填写选票时坐用的席位。桌上安放若若干砚台和毛笔。在桌前更远一点的地方（大台的中央）放着新油漆的票箱。

是日，天朗气清，殿前宽大的高台，洒扫清洁，略无纤尘，青砖墁地，大方干净。佛殿建筑宏伟壮丽，殿顶上的法轮映着焯焯朝阳，算得上灿烂辉煌了。作为当小学教师的我，在饱受日寇铁蹄蹂躏之余，面对这种庄严肃穆的情景，心里确实产生异样的激动：看来中国真的要实现民主自由，完成孙总理的遗愿了。

预定开始选举的时间是八点，可是不知怎的，延到九点时，别说高台下的可容千人的广场空无一人，就是在可容百人

的高台上，也是零零落落。管理所的主任，不停地看看表，在台上踱步，看得出他是有点稳不住劲了。勉强待到十点，已是红日高照，主任们互相低语之后，决定开始选举。

我注意了一下在场的人，有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分别负责投票和监察），投票管理员三人（包括我），投票监察员三人。前来参加选举的不过七、八人，他们陆续从台下踏着十数级的台阶走上了高台。就是这样，严肃隆重的选举仪式，只能冷淡稀松的表演了。司仪的人喊不成声调，读“总理遗嘱”、唱“国歌”都无法进行，只好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作罢。接着宣布投票规则，仅仅面对不足十人的选民，开箱验封，把票箱倒转，高高举起，拍打几下，加上封条。于是“至公至正至神至圣”的投票选举开始了。

“选民”拿出选民证，在簿上登记名字，领取选票，坐在桌后填写完毕，投入票箱。秩序也算井然。在这几个人走下台阶之后，主任突然想到，这些人的选票都写的是谁呢？他赶紧向所有的管理人员宣布：必须注意选票上的名字，保证都写吴耀庭，否则管理所就无法向上级交代。

从此以后，只要看到从台阶走上一个人来，那些负责人就假意殷勤地上前去。我这个管理员不仅插不上手，也插不上嘴，干脆站到一边当闲人。慢慢从他们谈话中得知，这个投票管理所应该投票的“合法选民”总在千人以上，参加这个投票所投票的工会行会组织也有好几十个。可是主任并没有当众宣布。我奇怪，为什么不见电灯公司、面粉公司、毛织厂，以及铁匠、泥瓦匠、木匠、各种杂色匠作的选民来投票呢？后来才听说，这里扯旗放炮地装模作样，其实有关方面早已明令不准各工会行会的成员停业，所谓的选民证也并不发给选民。只由指定的某人把选民证拿上，集体代办。因此，好多工会行会都不愿参加。至于个体谋生的各色匠作，不愿耽误时间，所以也不来。

按说，“国大”代表的选举，应该是直接选举，可是眼前的情况告诉我：在席力图召高台上的场面是为了骗人的。那些投票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是否事先知道，不得而知，也许是甘受冷落。我想我的学生还等我上课呢，不如回去的好。于是我向主任（教育科长）提出这个请求。他婉转地告诉我，不应该走、不能走。我只好强留下来，当旁观者。

一个穿着不很华贵的人走上台来，高傲的神情使我感到有点异样。主任们却立刻迎上前去，点头哈腰地让座递水。从谈话中知道，这位便是候选人之一的韩勇。主任向他汇报投票情况，语言间微露愿为效劳的诚意。但韩勇却谈笑自若毫不在意，似乎对他们的诚意并不接受。坐不多久，他挥手而别，使得在场的管理人员们不知该送不该送，十分尴尬。

一位头戴瓜皮帽的老者，身穿长袍，花白胡须，艰难地爬上高台，掏出选民证，领上选票，找到座位坐下来。他拿起一支毛笔，准备写他心目中的“国大”代表了。一位主任抢上前去，问：“你老人家想选谁呀？”老人严肃地说：“这是选举，不用你管。”这位主任又说：“我看你就写上吴耀庭吧！”老人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选举，民主嘛，由我自己吧！”那位主任还紧逼着问：“那你想选谁呢？”老人突然站起来，说道：“民主嘛，难道你不懂？”于是掉过脸，站着在选票上写了几个字，就送到票箱里。老人走了以后，几位主任苦笑说：“对这种人，真没办法。”有的人答讪着说：“就只一张，无关大体，何必计较。”主任还特别叮咛：“一会儿人来得多了，可得注意，不能再出差错。”我想这位老人为什么能拿上选民证，能“直接选举”呢？大概是由于“坚持民主”的缘故吧！

另一位老人家走上高台了。这人看上去一定是个耍手艺的匠人。当他领到选票时，一位工作人员就忙问：“你老不会写字吧？我替你写。”老人说：“行。”“那你选谁呀？”工作人员

问。“选韩勇！”老人说。工作人员拿起笔却在选票上写上“吴耀庭”。老人说：“我选韩勇！”工作人员说：“我写的是韩勇呀。”老人说：“韩勇是两个字，你怎写三个字？”急得那位代笔的工作人员没法，只好用笔把中间的那个字圈掉。老人毕竟不识字，就胡里胡涂地把选票放到票箱里。

这时，几位主任正在和一个工人模样的人争论。这位工人是人力车工会的代表，手里拿着二百多个选民证。他要领到二百多张选票的，几位主任加上几个工作人员都不敢松手。那位工人一手抓住还给他的选民证，一手去抢那两小捆选票。一位主任紧抓住选票，急着问，“这么多的票，你写谁呀？”那位代表说：“我想写谁就写谁。”“那不行！”几个负责人急着说。那个代表说：“选韩勇。”“那不行，必须写吴耀庭。”主任发怒地说。那位代表抓过选票来，一只脚踩在凳子上，拿起笔就在跷起的一条腿的膝盖上迅速地写：韩勇、韩勇……。主任一急，把笔抓住说：“必须写吴耀庭，实在不行，也必须一半对一半。”正在争吵不休时，从台阶大踏步走上一位，身穿衙门制服，左胸前佩戴一枚圆形徽章，听认识的人说是绥远省政府社会处的重要人物。

当几位主任向他汇报情况之后，他眼瞅着那位工人代表，走上前去，当胸把其佩带的工会徽章抓住，先看徽章是哪个工会，又翻看后面的号码，最后还是把徽章揪下来，弄得那位工人代表的衣服撕开一个大口子。那位工人双手正忙，来不及保护这枚徽章，就愤怒地大嚷起来。这位省政府社会处的要人就大喊：“警察在哪里？把他抓起来。”就在这样的争斗下，那位代表勉强答应“一家一半”的要求。可他手里拿着的笔还在写：韩勇、韩勇……。当几位主任围在他的眼前时，他才写几个：吴耀庭，以后就变成韩勇、吴耀庭，韩勇、吴耀庭。等写完手中选票时，那位代表迅速塞到票箱里，扬长而去。台上的负责大员们，又议论

了：“这家伙，真难办，说是一家一半，多数还是写的韩勇。”事后，我才想到怪不得韩勇上台时的神态，那样傲慢，大概这种争夺战是早有准备的。

太阳偏西了，席力图召的大殿和高台，都显出昏黄的色彩，黑暗的阴影就要笼住这个投票管理所了。孙总理遗像前的桌面上，还摆着百张一小捆、百张一小捆的选票。主任大概心中有数，不象上午那样紧张不安了。高台上，这时只有投票管理所的主任和工作人员了。胡主任略带神秘地说：“我们自己动手完成任务吧。”于是大家动手，每人拿起一小捆选票，放心地迅速地把“吴耀庭”三个字写在上面。我勉强地写完一小捆，再也不想为这位不知是什么样人物的吴耀庭卖这份力气啦。看着他们把一捆捆选票塞进票箱的情景，我想整个上午填写的选票，也不及五百张。现在，仅仅半小时的功夫，已经把三千张选票塞进票箱。看来，吴耀庭在竞选中是决胜无疑了。他们在毫无监督的情况下把票箱封严之后，不知运到什么地方去了。至于选举的開箱、计票这些工作都无须我们多劳了。

这场选举的丑剧，就这样收场了。这就是国民党高唱的民主自由。它不仅使我，也使更多的人民群众识破了反动独裁的真面目、真心肠。

鸦片在归绥

王再平

清代至民国年间

鸦片又名阿片，归绥（今呼和浩特市）地区俗称大烟、洋烟、烟土，是从罂粟的果实中提制出来的一种毒品。归绥地区的鸦片，被认为是“味好劲足”，称“西口土”。每到鸦片收获季节，归绥、包头及京、津、穗的土客都麇集于青山脚下；各地客商也带着各种物资在村镇、地头设摊出售，一般十几天，叫“洋烟市”。甚至说唱艺人、说快板儿的乞丐，也三三两两来到田边地头献艺，以换得一点儿“奶子”（果中浆汁）。平时刁猾刻薄的地主富户，此时也给长短工做出“好吃喝”，以防他们把烟“割塌”（即割一次后，再割不出奶子）。洋烟时兴时衰，在归绥一直延续到日本投降以后。

一、鸦片入绥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前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向中国不断扩张和深入的过程中，鸦片也随之从天津等沿海口岸输入归化一带。一九八三年五月七日在呼市大召内发现了一通“大清咸丰四年岁次甲寅菊月中浣谷旦”所立的石碑。碑文在记述重修玉泉井时写道：“由是，茶坊、酒肆、烟行以及各街铺户，大小人家，群相争取。”这里与茶坊、酒肆并列的“烟行”就是鸦片烟行。即早在一八五四年以前，归化城繁华的大召周围，已经出现了烟土行业。

鸦片在归绥地区的种植之始，据（日）江口圭一编著的《日中战争期阿片政策》所援引的史料，为清朝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托克托县从广东移来鸦片原种开始了鸦片的栽培。俄国旅行家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一八九三年三月十六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将近六点钟，来到了美岱村，并就在上次住过的那家客店里过夜。由于客店里的地方不够，我只好和一位汉族老头儿住在一个房间里。他是个专门贩卖鸦片的商人，刚去过周围几个县，向农民订购了明年收获的鸦片，现在正返回呼和浩特。据这位老人说，山西人染上吸鸦片的习惯最多不过是四十到四十五年前的事，而这里开始种植鸦片却只有二十五到三十年的历史。”一八九三年上溯二十五到三十年，即为一八六三到一八六八年间。

鸦片开始种植后，瘾者激增，毒害严重，清朝当政者也曾罚以重税（栽培税）极力压制，然而无效，很快竟至于全放任。到了光绪年间，鸦片在归绥地区的种植已十分兴盛了。

至于鸦片的吸食，在归绥地区有文字记载的，最早也是光绪年间。（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在那篇日记中还写道：“这些旗军的总数是五千人（指绥远城），……在当地居民的眼中看来，这些士兵都是一些最坏的无赖之徒，因为他们什么事情也不干，成天只是吸鸦片、酗酒，……”到了宣统年间，鸦片的种植及吸食情况就更为严重了。当时，有人在《各省禁烟成绩调查记》中描述这片著名鸦片出产地的情形：“遍地皆植鸦片，人民自种自吸，即妇女儿童无不吸食。”

近年来，笔者在呼市郊区走访过不少九十岁上下的老人，有的说，在他还是十来岁的小孩时，他的爷爷、奶奶就抽大烟成瘾了。大台乡一位九十高龄的老农说他“走路还跌跟头”的时候，他家的地里就种着洋烟。这和民谣所记述的：“咸丰登基十一年，口屯口外种洋烟，十亩田里八亩烟，留下二亩杂谷田”是相符合的。

二、大种鸦片

由于吸食人口的增加，种植面积扩大，到一八九〇年前后，外国鸦片在这里的市场上几乎完全绝迹。

光绪年间，税局已普遍设立起来。当时，罌粟栽培税以道为单位征收，不断增加税率，企图断禁。这样，当地产的鸦片有所减少，市价腾贵，依赖宁夏一带的鸦片倾向增强了。清宣统三年，政府发布禁烟严令，归绥地区大规模的遍布全境的种植断绝了，但僻远地区依然在种植。民国五年，卢占魁曾率一千余人在托、萨两县骚扰，社会秩序混乱，当地又萌生了种植鸦片的念头。当时仅托县就种了5000亩，鸦片价格为每两二元左右。民国六——八年，因为严禁，鸦片价格一跃为每两14.5元。

民国七年由于农业歉收，贸易滞销，绥远市面钱价涨落无常，全省收入锐减。绥远都统蔡成勋欲借此机会捞一把，因此想大种鸦片。将大种鸦片的办法密报北洋军阀政府后，迅即得到国务院总理靳云鹏及陆军部支持。遂于一九二〇年一月，密令绥远各县发动农民和其他愿种的人开始大种。光民国七年托县种植土地就已增至一万亩，为上年度的两倍。政府税收为每亩水地十元，旱地六元。

清末民初，鸦片在归绥城及近郊也肆意蔓延开来。旧城大十字南的街巷里，十家有六七家吸食。致于那些暗娼家，更是家家备有烟灯。“五·四”运动前，西菜园、南菜园、毕克齐、察素齐等许多水源充足、土地肥沃的地方都种上了罌粟；连土地较为干旱、贫瘠的攸攸极、大台什都种上罌粟了。一些老者回忆，夏天新城城墙内东南角的菜园子，也盛开着各色罌粟花。

民国五、六年间，归绥较大的“烟土店”，一家是“申义栈”（东顺城街，经理姓白），一家是“福和永”（通道街，经理姓夏）。两家各有“土客”几十人，从事烟土生意。烟土多从

甘肃凉州（即武威）及新疆由骆驼运来。一来即几十、几百箱，每箱一百——一百二十斤，全是压成的板子。这一期间，后山早已是大面积种植了，农民手头多有私存，不时少量运到归绥出手。

一九二〇年后，归绥西菜园一带选用上好的土地，大面积种植鸦片，罌粟高到齐胸。攸攸板是个极少有水地的村子，烟商也于一九二三——一九二四年间，较前多了起来。当时，归绥城外种植较多的地方是西菜园、桥靠、昭君坟一带；此外，象东门外离新城二、三里的奶奶庙一带，以及大台什、复兴营子、西龙王庙等地，也都或多或少地种植着。

一九三〇年左右，归绥的烟土店又出现了“德中和”（经理贺秉温）、“世义成”（托县翟世华开办）、“晋业祥”（山西人开办，以太原人居多）、“天生长”（座落在旧城小南街，1932年歇业），还有“垦业商行”等。

一九二〇年以后，烟馆已屡见不鲜。当时旧城的街巷，车站的南北马路，以及新城的四条街全有。到一九三〇年前后，旧城的小南街、小召前、西夹道巷、小东街、大东街、小北街，烟馆已数不胜数。鸠形鹄面之士，所见皆是。据调查，攸攸板村在日军占领归绥前，也出现了几家小烟馆，由较为贫困的农民，从烟土店贩来些“货”，进行小本经营。烟馆里盘着土坑，备有烟灯。有净烟、膏子烟，抽烟管茶水。零售的鸦片，先是棍烟，五分钱（铜子儿）一支，外面是纸，里边老竹叶包着。以后是片儿烟，有三分钱一片儿的，有五分钱一片儿的，由腊纸包着。

当时，本地的烟土商不仅收购本省的烟，还由宁夏、甘肃批购大量的“货”，再转卖给内地客商。鸦片运往外地，有两种方式，当时行话称为“走大路”与“走小路”。前者即以火车装运。以运到天津的花费计算，把沿途经过各地的税款缴纳完毕，每两运费约合六角左右。这种运法是很安全的，因为走铁路，所以绝不会有被贼匪抢去的危险。“走小路”的方法即是私运。全

用北方特有的载重大骡车起早运输。虽说是私运，实际也等于奉官，这种方法比较省钱，总计脚费及各地的“买路费”，每两一共只用四角左右。

三十年代，归绥一带装箱外运的鸦片，都贴着“稽查处”、“绥靖公署”及“绥远垦业商行”三种封条。稽查处专门征收鸦片的运销税；绥靖公署多少带点保键的性质；垦业商行本为半官式的营业机关，系晋绥最高当权者所办，贴上它的封条，亦即是“负责运输”之意。

三、所谓“禁烟”

民国二年，归绥曾施行过禁烟，民国五年又种。民国六年，归绥县谢知事明令禁止种植鸦片，民国八年又种。此后时种时禁。民国十六年（1927年）种植鸦片的浊浪再次掀起。就在这一年，归绥爆发了“孤魂滩事件”。导致这次事件的原因之一，是归绥县知事冯延铸公然开放烟禁，强迫农民种植鸦片。

民国十七年，国民党政府召开了全国禁烟会议，组织了“全国禁烟委员会”，民国十八年公布了“禁烟法”，二十一年改取“分期渐禁法”。二十四年特设“禁烟总监”，并定了“两年禁毒（1935—1936年底），六年禁烟（1935—1940年底）计划”。

绥远省也随之制定了“禁烟大纲”，拟自一九三五年起，按四年分区禁绝。同时制定了“禁吸鸦片办法”。计划在省会设立戒烟医院，县局设立戒烟所，乡镇设立戒烟分所。还搞了“禁种烟苗办法”，规定：“各县局限制禁种区内播种烟亩水地每亩罚征建设专款十一元，旱地每亩罚征建设专款六元六角。”

表面上看，绥远政府似乎也在归绥等地禁烟，实际是以戒烟为名横征暴敛。军阀及国民党政府把征收的烟税和所罚的款项，作为一项重要收入。特别是到一九三〇年左右，归绥城内各行各业，竟全靠鸦片来周转维持了。每当割烟时节，各级大员便分赴

归绥各乡，除以官家名义收税罚款之外，个人营私舞弊，接受贿赂的更多。据今郊区的老农讲：“当时他们来到烟地，只要给一笔钱，就没事了。”另外，可种鸦片的上等地多在绅士们手中，故绅士们种烟最多。但是无情的烟亩罚款，却大部分落在贫苦农民身上，因为地方政权在绅士手中。他们把自己的好地报了荒地，免去了粮赋和烟亩罚款。此外，地方上收款的人员是区村的“公事人”，由绅士们自己充任，他们在收款的时候，也要在农民身上想办法。

民国十——十一年前后，禁烟主要是禁铁路沿线，以防有碍观瞻。马福祥在归绥的禁烟是所谓“禁种”，但允许买卖，因为烟土是从他家乡一带运来的。在归绥，即使是在查禁的时候，暗中的烟馆仍没关闭，油筒中的买卖也没停止。一九三六年，傅作义先生搞了“除三害”运动（除烟毒、匪、盗）。计划第一步先令沿铁路线附近五里内禁绝种烟，以后再年年的推广下去，直到“绥远无烟”。当时，曾派出军队铲烟，学生上街游行，还雇了人，沿南茶坊的土路，用鞭杆打过烟苗。托县似乎搞得更“红火”些。不过象离城十几里的攸攸板村，“断烟的”竟然从没“光临”过。因而人们说，当年的禁烟，只是走走形式，明禁暗纵，越禁越厉害。

四、严重恶果

当时，甘肃凉州和宁夏的鸦片，为运到北平、天津等地，而大量涌入归绥，再加上当地的种植，使鸦片大量云集于归绥。由于鸦片的大量种植和贩运，吸食鸦片的人也多了。不仅富人们吸食，连“苦力们”也有很多的“瘾君子”。

鸦片的吸食，不仅摧残人们的健康，而且使之日益走向赤贫。围绕这个问题，笔者走访了攸攸板、大台什等村，听到许多血泪的诉说。一九二九年前后，攸攸板村周来运因抽大烟卖了房、典了地，后来穷得揭不开锅。乡亲们给他送去点山药、高粱、

莜面，他也是换了鸦片抽掉。最后把老婆、儿子卖给了口里的人贩子，自己也讨吃要饭，死在外村。大台什一户姓田的农民，因抽鸦片，把六岁男孩以三十元钱卖到口里。日军占领归绥前，刀刀板村任××，因吸鸦片，卖掉三、四岁的儿子。这样的事，在归绥几乎村村都有。一遇荒年，吸食鸦片的人家卖儿卖女、上吊跳井的更是举目皆是。早在三十年代绥远“新诗歌运动”中，对归绥一带吸食鸦片的情景已有所暴露。章叶频同志于一九三四年写的叙事诗《小玉子》，即以旧城一户普通人家为典型，描写了一个年仅十三岁的女孩儿“小玉子”出卖肉体，养活全家四口，还要供父亲抽大烟的悲惨命运。

日伪统治时期

一、从“土药公司”到“土业组合”

“七·七”事变后，伪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先后建立。为了麻痹人民，克服经济困难，日伪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布了“鸦片业务指导要纲”。以后三个伪政权形成统一机构，鸦片监督机构也进一步强化。一九三九年六月六日清查总署成立，下设张家口、大同、厚和（今呼和浩特市）清查署。其中厚和清查署下辖8个清查局，18个清查分局。与此同时，于六月二十六日还成立了鸦片专门收买机关“蒙疆土药股份有限公司”及配给机关，实行专卖制度及鸦片生产、配给两部门统制管理。其相互关系为：罂粟栽培者→土药公司→清查署→阿片配给人→瘾者。蒙疆土药股份有限公司本店所在地张家口，在大同、厚和、张北、崇礼、兴和、多伦、集宁、托克托、萨拉齐、包头、丰镇设有分店。

一九四〇年四月十七日蒙疆土药公司解散。同年，“蒙疆土业组合”成立。“蒙疆土业组合约款”中规定了它的组织形式是

“阿片收纳人的组织”，以收纳鸦片为目的。总组合设于张家口，厚和、托克托各有一个土业组合，蒙疆地域内，有的县镇设有土业组合，有的设“收纳处”。

厚和及托克托土业组合，归厚和清查署管辖。此外厚和清查署管内的还有丰镇、包头、萨拉齐。其中厚和土业组合中有组合员9名，托克托有11名，丰镇有14名，包头有9名，萨拉齐有11名。地区工业组合由组合员集资。

鸦片由蒙疆政府代行收买机关——土业组合收买，再由配给所按照统计的瘾者数、官定的配给人员数、烟土吸食能力及当年产量供给。

二、强迫种植与引诱吸食

日伪政府为了鼓励农村普遍种植鸦片，凡是种植并按规定交烟的，被认为是“良民”。多交的还给一些布匹等物资做为“奖励”。一九四〇年，绥远农民因食物不足，多种了些谷物，日本当局即派飞机在空中撒鸦片成品做为引诱。农民没有罂粟种籽，日伪就便宜地售给他们，以鼓励大量种植。

除了引诱之外，日伪政府还特别采取了强制手段，指定栽培面积，强迫农民种植。

日寇使用各种手段强使老百姓种植鸦片，目的有二：一是从收交鸦片中大量地榨取中国人民的血汗。敌人广设官烟局，曾以每两六元的低价强行收买民间鸦片，反过手来拿到市场上又以九元一两的高价出售给人民。还规定法令如：私有烟土十两者判十年徒刑，十两以上者枪决，以保证阴谋实现。二是引诱中国人吸食鸦片，使其堕落和贫困，达到灭亡中国之目的。

这样，归绥地区在原有基础上，便迅速扩大了鸦片种植面积。除水源缺乏的地区之外，西菜园、巧尔报、水磨、八里庄、倒和楞、太平庄、黄合少、讨什号、达赖庄、桥靠、东瓦窖、东

西乌素图、察素齐、毕克齐、前后三空、一间房、黑炭板等地种得都很多。正如民谣说的那样：“大小札楞碾子村，除了洋烟没庄禾”，“红城黑城大古城，遍地洋烟没庄禾”。当时，“肥美之田野中，以鸦片最为主要，每到收获期中，烟果林立，阡陌相连，农家妇女与儿童多在烟林中工作，辛辛苦苦，采此毒汁。”据笔者调查，现今西菜园村所耕的土地，当时约有1000亩种植鸦片（今有可耕地1300亩），故被称为“黑金厂”。一九八四年大台什公社大台什大队78岁老人杨海威回忆说：“日寇侵占时期，我给毕克齐一出西门一家富户扛活。这家有一顷三十亩地，洋烟就种了一顷。他们家磨房里放的全是洋烟，只留下个走人的地方。”那时候，毕克齐的一些大家富户，有的一家就雇一百来人割烟。

至于吸食者，已经比比皆是。下面以西菜园等五个村为例，做一个统计：

西菜园村，当时80%的户有人抽鸦片，总人口40—50%以上的人抽鸦片。

攸攸板村：当时总人口800多人，有300多人抽鸦片。

大台什村：当时总人口600多人，有200多人抽鸦片。

添密梁村：当时总人口470多人，有200多人抽鸦片。

刀刀板村：当时有300多口人，有100上下的人抽鸦片。

三、丈量烟亩及收烟收税

每年夏季，鸦片生长到一定程度，就要开始丈量烟苗。届时由厚和清查署派遣若干人员到各村丈量，确定烟户亩数，评定等级，作为将来缴纳鸦片和征收烟亩税额的依据。他们每到一村，先与各村保甲长和大地主互相勾结。凡能纳贿送礼的，地亩就可少算，等级可以压低；反之，就会多丈亩数，提高等级。到了收割鸦片时节，土药公司组成若干组分赴各处收购。每个组有主任、检定、会计、办事员若干。工资由公司按不同工种、职务发放。

公司还给收购人员发鸦片从业员证明书，按农村鸦片种植情况，在适中地点安设烟土收纳处，如大台什、八拜等就设有收纳处。每一、二十里还设个收纳点。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期间，大台什村的收纳处，常有一、二十人带枪保卫。一九四一年鸦片收买价格每两：一等品6元，二等品5.5元，三等品5元，次等品4元。农民收割大烟时，按照清丈员事先查定的数量，随割随交，送到收纳处。收纳时鉴定员用一条三、四寸宽的木板，伸到盛放烟土的罐内搅一下，然后取出木板，将带出的烟土刮入碗内，再用烟钎子烧煨，定下等级。如果农民拿来的是烟奶子，他们就用小铜勺盛上三钱，用火炒成硬块，以此折算水分的多少。这样鉴定长余下来的烟土，叫做“永长”，由他们内部分肥。

一九四二年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鸦片产量锐减，京津市价飞涨，于是派人强行征收。对不交的农民“检举”，对鸦片隐匿者严罚。为防止出问题，日伪政权还动员了军队，特务机关，宪兵队、兴亚院。而且制定“缴土工作要领”，召开乡镇区长会议落实责任数量，督促缴纳，强行收买。

种植鸦片，还需交纳“禁烟特税”。一九四一年度，厚和禁烟特税为每亩水地正税10元，附加税2.5元，计12.5元。交不够税不行，要四处托人情。当时归绥的日本占领军头目有叫大石和小藤田的，要烟税最凶，交不够烟税的农民送到他们手中，轻则毒打，重则砍手指。东瓦窑村老农周纪文有一个亲戚，当时住在八拜村，因没交够烟税，被日寇砍了小指头。倒和楞村（今和林乡宝泉庄）陈有财因为交不够烟税，被日本人毒打成病，第二年（1938年）死去。

四、土店与烟馆

在归绥，这一时期的烟土店除“德中和”外，还有“和盛香”、“茂盛升”、“晋益西”等许多家，光小南街就有四、五家

火土店。较大的土店，有十几个人，包括经理、晒烟的、煮烟的、灶上的。一些投机倒把分子，也见利忘义，纷纷起来开设土店。他们从农民手中低价收购鸦片奶子，经过搅晒加工，制成板子，一部分留当地各烟馆销售，一部分装箱外运。这样，以人名或店名为店名的土店，或某一地主、财主做股东，雇上三、四个人开的土店更多。一九三八年七—十二月，新开张的烟土店就达58家，而闭业的仅两家。小南街“茂盛升”的尤富山还担任了厚和市伪“商会阿片公会”的会长。

烟馆遍布于街巷村镇。有的土店本身也附设烟馆。如“茂盛升”（掌柜阎继宏），就在财神庙巷开有“阎记”烟馆。也有小商小贩、破落户子弟从农家赊上些烟土开办的。

据调查，当时美人桥旁康乐街有两个烟馆，每家约三、四个人。荞麦皮巷也有烟馆，大召西夹道巷、西河沿、东头起更多。车站塞北关附近的烟馆“子亭膏店”，店内还分“雅座”、“大铺”。“雅座”有专人侍候，打烟、倒茶、端烟盘，“大铺”即一个大炕上有好些烟灯，各抽各的。

开设烟馆，需缴纳保证金，领取鸦片零卖所许可证，才得从事开业。归绥、包头等地烟馆的经营方法，名义上是向“厚和市商会阿片公会”领回官棍烟零售，实际上是自己购买烟土，熬制成膏，用裁小的腊纸，挑成烟片，形似小膏药，然后把两个对称的角一折，合成个边长一寸左右的三角，每片售洋五分或一角。棍烟，长一厘米，黄纸、花纸拧住，如包着的糖块。私制的片烟，要是让鬼子或稽查官查获，那就糟了。所以，这些开烟馆的人，必须经常向他们孝敬钱财。

五、私卖与偷运

一九三二年九月，“满洲国”日伪当局成立了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公布《鸦片法》，一九三三年成立鸦

片专卖公署。在这个公署之下，设专卖署和分署，另设奉天鸦片烟膏制造厂和大满号、大东号两个公司。通过这些机构，进行鸦片交易，低价收购，高价售与瘾者。一九四三年春，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了鸦片会议。会上决定以伪满洲国和内蒙为生产鸦片的主要地区，负责供应亚洲全域的鸦片需要。日本帝国主义的企图，是把导致民族衰亡的鸦片政策扩大到整个亚洲地区。并把鸦片的生产与贩卖作为“以战养战”的手段之一，以达到经济搜刮的目的。

驻归绥的日军特务机关也用它占有的鸦片走私平津，牟取暴利，中饱私囊，获取军需，以此作为“以战养战”的一种办法。当时日军头目大海、石海就常把大烟装在公事箱子里运走。主子如此，底下的伪军、特务也都上行下效。小东街住个翻译，人叫“宋科长”，开有烟馆和“四龙商行”。他常私下收购，然后向北京等地贩卖。李守信的儿子，当时住在杨家巷，也倒贩大烟。北头起特务白玉也常贩烟，并通过北门外悻悻铺“隆兴元”灶上给他收购。

日军进入归绥时，随军带来几个朝鲜妓女。她们也往往身上带鸦片，用月经带扎住，往返于北京、归绥。

由于贩卖鸦片利润大，不少社会上的无赖、流氓以及为生活所迫的农民、市民，也从事这方面的投机、伪造营生。他们有的把馍馍烤焦，捣烂，用水和后，澄下；有的用白糖、冰糖、黄蜡、粉土子伪造大烟出售。

在日伪统治时期，还出现了“肛门队”偷运鸦片。那时，北京、天津、济南等地，鸦片烟土，价格很高。但是往这些地方贩运烟土，只有经过日本人的允准，官办的才是合法；一般老百姓，一点也不能带运。上下火车，搜查极严，若是谁带上一一点烟土，被日本鬼子发现，轻则毒打没收，重则把人弄去，死无下落。有些奸商为了牟取暴利，竟然想出了利用肛门队来搞贩运。

他们以较高的工资雇上一些吸食烟毒后落魄无法的男男女女，编组成队，在肛门内带运鸦片到外地销售。当时碱滩有个姓蔡的买卖人，参加了肛门队。据他说，往肛门里塞的鸦片，用保险套包成黄萝卜一般，长六、七寸，宽二寸，塞入肛门。上车前仅给吃鸡蛋，然后偷偷上了火车再不能吃不能喝，到了目的地，一吃冰棍就卸下了烟土。

六、“狐魂滩”与“断后草”

日寇统治时期，除大力倡导种植和贩卖鸦片外，最烈性的料面也风行一时。料面是提取鸦片里的“精华”制成的。它的毒性极为猛烈。其损害健康，亡国灭种，较之吸食大烟，厉害无比。

大烟和料面的公开销售，使归绥地区吸染上瘾的人越来越多。当时男子被鸦片烟抽得皮包着骨头，开口一笑，就好象僵尸复活一样狰狞可怕。许多人，长满疮疖，瘦如骷髅。还有的白天死睡，夜里爬起来吸食，颠倒了阴阳。有的甚至把自己的骨头也卖给做料面的人，死后用他的骨头做料面。还有的因此沦为流氓、小偷、骗子、乞丐。也常有冻死、饿死、倒毙街头的。

东瓦窑村有个姓戴的，已经退了烟，日寇退却时，他去外村走亲戚，人家给他抽了两上午，又上了瘾，回来后难受得不行，拉到裤子里自己也不知道。

笔者对西菜园村进行了调查，因吸食大烟而卖妻卖子的为数不少。如李四小，一九四二年把64亩土地卖光，之后又把老婆卖到茂林太，当时儿子仅8岁。任长锁卖了老婆。周满库，原本是富裕人家，小时候父母专为他这个独生子盖了“大仙庙”，结婚后因吸食鸦片，先后卖了院子、土地、老婆。此外，还有上吊跳井的。

另据笔者调查，攸攸板村的钮大福库老人，当时全家八口人，除了他跟老伴儿外，其他人全抽大烟。几个兄弟抽得一贫如洗，二弟日伪时期年仅三十多岁，就因抽大烟死去了。这一时

期，刀刀板村因吸食鸦片卖了老婆的有三家。

当年，每到冬季，南郊“孤魂滩”尽是丢弃的死人。其中多是冻饿病死的“烟鬼”。因此，郊区农民编了不少顺口溜：“谁种谁肥，谁吃（抽）谁灰”，“好人抽个病人，病人抽个死人”……他们把大烟称为“断后草”。

日寇投降以后

一、国民党当局禁烟禁毒的惨败

国民党当局，早在民国初年就吵吵禁烟，然而烟毒却无时不在归绥肆意滋长，其“两年禁毒”、“六年禁烟”自然化为泡影。到日寇投降，烟毒已嚣张到难以复加的程度。

早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绥远政府就规定，鸦片私犯案件均由军法室审理。一九四七年再次明文强调：由司法审判之吸食藏存烟毒案件一律移归军法审判。从一九四一年以后，烟土检查人员，每到一户，就可以检查箱、柜、什物。甚至还实行了什么“禁烟联保”，一户出事，治罪众人。

由于烟毒与反动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些法令全是一纸空文。顶多是间或捉一、两个替罪羔羊，搪塞上司，根本改变不了烟祸猖獗的大局。如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驻在“三空”的国民党101师官兵，就常常出来偷着“烫烟”（即烧根铁丝，卷个纸筒，用烧红的铁丝烫鸦片，用纸筒吸食）。

一着不行，另换一着。于是当局又逐年提高了缉查毒品奖额。下面以纯烟膏土为例：

绥远省政府公布的时间	查缉毒品规定奖额（每两）
1940年3月16日	2元
1942年4月24日	10元
1942年9月24日	16元

1943年10月16日	48元
1944年7月1日	160元
1945年4月1日	640元
1947年11月23日前	10000元
1947年11月23日后拟改为	150000元
经国民党行政院核定为	30000元

至于吗啡，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之前，缉获给奖每市两六万元。绥远当局拟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后提到九十万元，后经国民党行政院核定为十二万元。

缉查烟毒奖金的直线上升，一方面说明烟毒之剧，另一方面说明“缉查”的无能（当然，也有金钱贬值的因素）。

从禁烟、禁毒的惨败，也可以看出国民党政府的昏庸腐朽。

二、烟毒有增无减

日寇投降后，强制性的种植、吸食鸦片，又变为“查禁”。然而这种“查禁”，还是徒有虚名。县属的乡村里依然在“半公开”地、或多或少地种植。

当时，吸食鸦片的人，小的年仅十三岁，老的可达六、七十岁以上。据笔者调查，添密梁村喜牛、福生当时十四、五岁，也已吸食成瘾。除了鸦片，吸食料面业已成风（吸料面从1931年后在归绥已经出现）。此外，还有“扎鸦片”、“扎吗啡”的（扎：方言，注射）。甚至有“用罌粟花壳茎叶煎汤频服抵瘾”的。

这一时期，各地奸商不断从察素齐、毕克齐等地向归绥市、县偷运、销售大量的鸦片。一九四七年有个姓安的鸦片贩子，他一个人就向归绥偷运了烟土1339两8钱。至于乡间秘密串村卖鸦片的商贩，更是屡见不鲜。因此，在烟民中私存鸦片的现象十分严重。有的人家储存带皮大烟，多达十几瓮，上万两。一些国民党军政要员也参与了贩毒活动。如包头的一些奸商，前往归绥从一个国民党军长手中买回做料面的醋酸，每磅卖现洋1500——

1600元。解放初，归绥市三区人民政府仅六个月即从本区烟民手中，没收鸦片（毛重）525808两，料面5387两。

鸦片售价，在日寇投降后的几年里，竟高到惊人的地步。常需用粮二——三石换一两。攸攸板村有一位老农回忆说：“八路军第一次围归绥城时（1945年8月），我奶奶有病，我给她到什拉门更跟小贩换过一两洋烟，用两石四斗小米。这一两烟给瘾大的，一天就抽完了。”绥远省政府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民四等字第4164号”文中写道：“……本省烟土私价每两已达二十万元，……日前每两烟土竟涨至四十五万元左右。”又据绥远省政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成天支民四”号文所述：“每两烟土私价竟达银币12元，或折合金圆券150——160元。”

另外，从烟民人数上看，一九四七年归绥县极不完全的登记人数，已占绥远全省烟民登记总数134696人的十分之一强。解放后，一九五〇年全市开展禁烟禁毒的统计，南柴火市街十五到十八四个间，两千户居民，八千人中，吸毒的就有一千五百多人。据悉，解放初期有关部门做过估计，受烟毒之害的归绥市民，占市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多。鸦片如此之毒之贵，而归绥吸食者又如此之多，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导演出千万出悲剧。

回顾呼和浩特解放前近百年的历史，鸦片之毒几乎祸及每条街巷，每座村落，每个家庭。有的全家四代人吸食鸦片；有的刚出生就带着“胎瘾”。因此讨吃要饭、鬻儿卖女、典房押地、行盗求乞、上吊跳井的不计其数。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呼和浩特一直置于“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各级反动政权不管是公开提倡也好，明禁暗纵也好，或是走走“禁”的形式也好，其结果，都使这块塞外的土地，在鸦片的浓烟污淖里越陷越深。其间，也曾有一些有识之士奋起致力于禁烟，然而都未能改变这种局面。这样，彻底禁烟禁毒的艰巨历史任务，只能落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政府身上。

一九四九年种大烟

给托县人民带来的危害和灾难

白清良

一九四八年秋末，解放军东撤，绥远省政府任命李麟兆为托县县长，边守墉为副县长。当时我在绥远，李麟兆打电话，让我急速返托县（我和李麟兆在民卫总队是老同事）。我回托后就担任了民德乡乡长（乡政府设在官土天）。后又调民有乡。

日本投降后，托县再没有种过大烟。李一来托县就和我商量准备在四九年开烟禁。他说：“胜利后托县走向衰败，各行各业非常萧条，我们用种大烟的办法刺激一下，让它繁荣起来。这对我对你，对人民均有好处。你是我的老同事、好朋友，应该支持我。”我说：“上级有令禁烟、禁种，这样做是要犯法的。”他又说：“说和做是两码事。尤其现在兵荒马乱，有谁来管这些闲事？你年轻不懂，我们不明说让种大烟，我有办法，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在一次庙戏的讲话中，他对群众说：“有人打听让不让种大烟？这件事早有明令规定禁种。不过二八月过河，各走各的路吧！”实际上暗示：不但要种，而且要大种特种。有人知道我和李麟兆的关系，就来打听李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我说：“这还不明白吗？说话听音，锣鼓听声，你们就看着办吧！”

人们听了我的话后，心中有了底，全县城乡就忙着做起种大烟的准备工作。后李问我，群众反应如何。我说：“这下恐怕要闯祸了。”但他得意地说：“这就好了，可以说一切成功了。”接着他就在托县境内又唱戏又放赌。有时两班戏同时唱，从农历

二月十九日开始，直唱到“九·一九”起义前夕。

种烟初期各乡村还比较平静，到四九年农历六、七月间，各乡村就“繁华”起来了。县政府派出丈量组，成群结队分赴各乡。这伙人明吃暗要，连唬带诈，腰包装得满满的。否则种一亩就丈量成二亩，使种户有苦难言。紧接着各乡村的民团、自卫队（组成人员全是地痞流氓、二流子、无赖、大烟鬼）趁机也活跃起来了。名为保护乡里，实是地方土匪。他们明要暗抢，农民敢怒不敢言，不得不笑脸相迎，拿出最好的烟土，上等的饭菜来招待；走时还得赠送礼物（大烟土）表示感谢“保护”之大恩。随之而来的还有政府、警安局的头头，以及各科室有点名气的人物。他们或亲自下去或派人拿上几条香烟和别的不值钱的东西到各乡（保），名为送礼，实则是要大烟。有的分文不送，干脆白拿。各乡预先就做了规定按级别分送。如民有乡规定：县长100两、副县长70两、秘书50两、议长50两、警察局长50两；其余各科室小头目和有点名气的人，因人而异（各乡“进贡”的数量不一）。如不这样做，他们就以种种借口找你的麻烦。加之外地的杂牌军和一些正规部队也借抓兵之机，到处敲诈勒索，吊打种烟人。今天这个保来告状，明天那个保来诉苦，真有应接不暇之势。当时有个尚灵云团，一次其团内的六、七人窜来我乡（民有乡）永胜域村，因招待不周殴打了保长和种户两人。报到乡里后，我就将这六、七人全部扣捕（当时这几人只带一支手枪，被自卫队十七小队捕获）押送到县里。正值城内的城隍庙里唱戏，县长当场讲了话，定了罪状：每人五十大棍，限当日离开托县境内。更厉害的是凉城的赵厉师、乔汉魁和清水河县的栗兴汉经常带部队以剿匪为名来托县境内骚扰。他们以卖枪支弹药索取大烟，用少量武器换取大量烟土，还让你感谢他们支援武器保乡保村的“大恩”。闹的各乡鸡犬不宁，人民叫苦连天。这些“官土匪”每到一处，稍有不周，就任意吊打。伍什家村、大北天村就

发生过类似的事好几起。乡里束手无策，县长也毫无办法，人民只好任其蹂躏。因此乡里为应付门面，只好给种烟户摊派，每亩交烟十两，后因入不敷出，又增加了五两。当时到收烟季节，各乡村真的“繁荣”起来了。白天是官家到，晚上是土匪来，人民终日慌慌不安。住在城外的人家，一到晚上更是惊弓之鸟，离家躲避，到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紧接着，省里又派来禁烟专员征收禁烟罚款，县里又派出征收员征税。除种户交罚款外，还得招待来人。只要稍有不是，他们就说你错报种植面积，抗拒禁烟，加大罚款，将人治罪。以后实在无法应付，种户就用掺假的办法来支付（把面筋通过加工掺到大烟里）。种户经过多次盘剥，所剩也就无几了。

上述只是官匪的骚扰和经济上的损失，更大的危害和灾难是大部分人，染上了吸毒的恶习。就城关镇居民来说，吸毒的比比皆是。各乡村就更不用说了。有的妇女怀孕后吸食大烟，孩子一生下就有瘾，眼泪鼻涕常流，整天眼都不睁。只要给他喷上些大烟，立刻就睁开眼，很有精神地活动起来。有的吸毒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如城关镇南街居民周明、周之一家，原来的光景很好过，后因全家吸食大烟，生活没办法，只好走后套。有一些人家，由于吸食大烟，过着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日子。穷困潦倒，男的偷窃，女的卖淫是常有的事。这时候人民才真正体会到种大烟带来的危害，然而身染烟瘾，无法摆脱。

一九四九年，种大烟给托县带来的假繁荣，实际上是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思想起来，令人痛心疾首。今天把当时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惨状写出来，让下一代记住这惨痛的教训。

状告李麟兆

杨立中

托县的东沙圈子（即今黑城乡、新营子乡、燕山营子乡之范围）一带，在明清时期就有种鸦片的习惯，直到日寇侵占后更是广为种植。烟农收获烟土卖给烟土商人，价较昂贵；土商转运平津和太原，售价更高，获利更大。但凡吸食上瘾者大都倾家荡产。故地方上流行的俗谚说：“谁种谁威，谁吸谁灰。”

一九四九年春季，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为维护社会治安，强调指出：“绝对不准种鸦片。”并对机关行文，向人民张贴布告。李麟兆身为托县县长，却派大批工作人员，下乡宣传大种鸦片。他本人也利用唱戏的机会，多次登台进行宣传。在他的鼓动下，托县就大种起了鸦片。董主席知道此事后很气愤，派人赴托县铲除烟苗。李麟兆设宴招待来人，装出可怜老百姓的样子说：“农民穷了多年了，好容易种起些烟苗，由他们吧，瞒上不瞒下，我不上报，就算没事。”然后给来人送了些礼物，达成了“君子协定”。从此禁烟就算了事。

这一年李麟兆在托县开烟禁，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危害和灾难（详见《一九四九年种大烟给托县人民带来的危害和灾难》）。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九日，绥远和平解放，人民获得新生。托县各学校的师生也利用报纸积极宣传起义的通电和党的各项政策。然而，李麟兆却继续与人民为敌。他一方面在城里大搞赌博，大唱官戏，奸污有夫之妇，霸占名旦角武先梅，寻欢作乐，挥霍无度，危害地方和人民；另一方面与刘万春、乔汉魁、栗兴汉等反动势力相勾结，自兼托县清剿团团长，统辖全县各乡的自卫队，

并派其内弟武凤岐担任县保安大队长，把全县的武装力量掌握在自己一人手中，企图伺机反抗。与此同时，他还目无法纪，乱征税，逼收烟土，害的人民无法生活。他的所作所为，引起全县人民的愤怒。一些较大胆的农民，悄悄找到我们几个县立小学的校长诉说苦衷，并将李麟兆收烟土的单据集中起来交给我们。我们一核算单据，仅一部分就合计大烟土万余两之多。为了维护革命事业和党的政策之尊严，由担任托县县立第一小学校长的我，第二小学校长李培基、第四小学校长张正元和明德小学王继等人，冒着危险，秘密赴绥远告状。我们到绥远后，在托县同乡杨令德、李培业、李培才、曹明、耿正范、李永昌等先生们的大力支持下，在《绥远晚报》刊登了《托县各小学校校长来绥告状》一文。董主席很快召见了我们一行。我向董主席呈递了《申诉》。面阵李麟兆在托县大种鸦片，危害地方，贿送省政府禁烟委员二人大烟一麻袋，以及胡作非为等情况，并将李麟兆、边守墉收大烟单据数十张呈董主席。董主席十分震怒。他对我们恳切而果断地说：“托县种大烟我不知道，两个禁烟委员也没报告（后了解到这两人被拘押）。李麟兆这样胡闹，一定尽快处理。为了你们几个人的安全，再住几天，同新县长一起回县。以后有事只要写个二指宽的条子就行了。再不要登报，以免扩大事态，影响咱们新旧政府合并工作。”我们在绥等了三天，省府任命王志远为托县县长，王树声为副县长，翟亭石等三人为查办委员，和我们联系同回托县。

此时，李麟兆已觉事情不妙，对我们进行反扑。他一面派秘书乔步云带大烟板子一箱（约十块，每块100两），到绥远进行活动（乔见势不好，携带大烟逃跑了）；一面下令将我撤职。这样，激起了县立小校师生的反对。教师张应亭、耿耀成等还印发传单，声讨其罪。地方进步前辈霍亮生老人找到李当面大骂：“猴狗子的们，看见托县没人啦。”李见群起而攻之，形势不好，慌

了手脚，逃到绥远，住在南柴火市乔汉魁的办事处。我们同新县长和查办委员回托县时，李麟兆也随之回到托县。

董主席派新县长和查办委员到托县理事，全县群众鼎沸。农民要求进城请愿，各校师生要求示威游行。查办委员翟亭石再三嘱咐我们不要把事态扩大，以免打草惊蛇，问题很快就会处理。果然几天后就把李麟兆、边守壖二人押到公安局扣起来。第二天来了一辆满载武装人员的大卡车，把李、边二人押回绥远。一九五〇年春季，李、边二人被释放。李即到刘万春三十六军乔汉魁的骑兵旅当了参谋，后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

* * * * *

允和成毡坊

以生产毡帽、毡靴为主的允和成，座落在旧城大西街路南，是前店后作坊。始建于清代康熙二十三年（公元一六八三年）前后，亦有嘉庆中叶之说。民国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有从业人员七十名左右。

允和成除制作销售一般毡帽、毡靴外，还生产黄色童子帽、红绿色小礼帽、销往新疆等地的大帽，以及土耳其式、英国黑色、紫色山羊绒帽。由于包装牢固，制作精细受到顾客欢迎。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席力图召第十世活佛，都曾定制土耳其式帽和礼帽。毡坊年产量是各种毡帽约二万顶；毡靴约一万双。

一九五零年，允和成更名新生帽厂，仍生产毡帽、毡靴。一九五三年恢复原字号，经理李运章。一九五六年更名永和成后走上公私合营道路。

（赵兴）

平息祁祥叛乱

云 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托县农村政权建立之时，残留在城乡的土匪特务不甘心失败，继续危害社会治安，与人民为敌。他们到处抢劫群众财物，暗杀革命干部，妄想卷土重来，推翻人民政权。

一九五〇年，托县人民政府成立了，随即在农村建立了区、乡政权。此时，原托县伪保安队长肖宝山表面接受改造，但贼心不死，图谋反叛。他和武凤歧（原保安队伪队长，改编后任县中队长）暗地勾结，伺机进行叛乱活动。他们接受了匪特的秘密指示，派人送信，联络散匪、特务，串通了荒地天村民兵队长李功（当过保安团、自卫队）和乃莫营村惯匪祁祥，进行叛乱活动，组织了“反共自卫团”，任命祁祥为团长，李功为副团长，周兆为团副。为了扩充势力，将网罗来的匪特进行整编，任命了连级、文书等官职。并谣传：“日本兵已打进了山海关”，“公历六月十五日整个中国要大反攻”等。扬言要集合队伍打托县，以此蛊惑匪特叛乱。

六月十三日，祁祥、李功召集了已联络好的兵痞、匪徒王满正、郭仑等十余人突然袭击了荒地天、豆付天村，夺得民兵的枪支。此间，叛匪人数有所增加，野心也更大。当他们得知新营子村苗三家住有我工作团人员时，在十四日凌晨，叛匪二十余人窜到新营子村，越墙进入工作团人员住处，佯称是民兵，待开门后，将工作人员马继春、刘生瑞随身携带的武器夺去，捆绑起来，架到西门外杀害。尔后，又窜到缸房天、范成滩天等村夺了我民兵枪

枝。此时，匪徒已达九十余人。

十五日，他们到周兆家歇息，再次计谋扩充势力。是日下午，匪徒们来到荒地夭村西堰中坝时，被我二区区长高永珍、三区区长刘子云所带二百民兵拦截，双方当即开火。我民兵为民除害心切，子弹齐发，击毙匪徒一人，打伤一人，缴获一些武器。匪徒狼狈溃逃。随后，我民兵开到什拉乌素毫村侦察匪徒去向。被我民兵打击后的散匪，逃到高头夭村吃饭，翌日和匪首肖宝山、武凤歧所带叛匪在一间房村汇合。这时叛匪已达一百二十余人。匪徒张二丑向李功报告，县里来了十二名解放军，住在乃莫营村祁俊美院内，带大枪十一枝，手枪三枝等。祁祥、李功即带叛匪向乃莫营村窜来。在乃莫营村宿营的确系协助民兵剿匪的我县公安局长任泽同志带领的几名部队战士，因地理不熟，未赶到民兵居住地点，误宿该村。叛匪由张二丑引路，叫开村子大门，由李功带一部分匪徒进村，其余布防村外，趁我剿匪人员熟睡之际，将祁俊美院紧密包围。他们按信号，先在村外打枪。我方人员忽听村外枪声，急忙起身出门，遂遭匪徒射击，致使我公安局长任泽身负重伤（不久既逝世）。其余人员坚持抵抗，终因寡不敌众，多数战士受伤，被匪徒俘虏。匪徒将我方人员带到什家毫村，把侦察员崔小顺、段根锁活埋。

十七日在我解放军骑兵部队的追击下，叛匪由树林内逃窜，从河口村桥上过大黑河，在西岸的三座茅菴村停息。十八日我骑兵部队跟踪追击，在三座茅菴村包围了匪徒。在我解放军迎头痛击下，当场击毙匪首祁祥，打伤匪徒多人，活捉卅余人，只有少数顽匪漏网逃窜。解放军骑兵部队凯旋而归。自此，托县武装暴乱平息。

一九五〇年九月，托县人民法院判处周兆、郇仑等人死刑，其余判处有期徒刑。

黑兰圪力更村史录

(1927——1949)

孟 良

民国十八年，绥远地区遭灾严重，饥馑荒旱，民不聊生。特别是土默川托克托县境内的广大农村更是苦不堪言！黑兰圪力更村当时有150户农民，近600口人。到解放初期全村下降为110户，总人口减少到400人。这时年龄在六十岁左右的光棍汉就有48人。蒙古族共产党员云存厚说：“民国十八年，我们黑兰圪力更差点儿全村毁了。人们背井离乡、逃荒外出的，卖儿、卖女、卖老婆的，冻饿死的和自寻无常的无其不有。全村能生育的女人仅有五个了。清早起来，站在街上看吧，烟筒里冒烟的人家屈指可数。”黑兰圪力更村的凄凉记载，就是当时历史的见证。

—

民国十六年（1927年），先是冯玉祥带领的“国民军”与奉军作战，节节向西败退。绥西地区到处兵荒马乱，闹得人心不安。王英、杨猴小、赵半吊子等大股土匪（当时人叫“独立队”）此往彼来，乱抢乱刁。加之这一年初秋时节，本地出现了黄耗子。人们种的庄稼，一半被兵、匪践踏喂了马，一半被老鼠吃掉，秋后收入寥寥无几。

民国十七年（1928年）是个闰二月。人们说“多一个春月，加一层愁烦”。这年兵、匪更加混乱，又是春旱，人心慌乱无法生活。农民张吉小，儿子被逼迫当兵，不久就死去，为了生存又将老婆卖掉，自己到后套逃荒，饿死在他乡；刘石如和刘双如兄弟俩因饿不出去，在一条绳上吊死；安三小被官兵抓去带路，一

双脚被冻坏，造成终身残废，张心正和张忠在被土匪抓“财神”
带走，逼要银钱，打得死去活来，差点儿送了命。就是这一年，
入夏时，起了瘟疫，好多人被传染，时有死亡，人们哭声震地，
一片惨境。

俗话说，庄禾无牛立地死。村里有几头牛、驴被匪兵打死吃了肉，农民耕种土地十分困难。春天黄沙飞扬，夏至已过，田野荒凉。有的人拚死拚活地种了些糜黍、谷子，偏是七月霜降，庄禾冻死，仅收了些糝子，还让兵匪糟蹋了一半。这一年，经过天灾、兵灾的无情袭击，大部分农民已是风中之烛，摇摇欲熄了。

二

有民谚说：“大兵过后必有灾年”。民国十六、十七年的兵灾、天灾是黑兰圪力更村灾难的开头，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紧接着袭来。

民国十八年（1929年）是当地史无前例的大灾年。这年一开春，狂风大刮，黄沙漫天，一直干旱，河、井干枯。到七月初，又大雨连绵，连下五天。雨住天晴后，人们抓紧时间抢种了小糜、小黍和荞麦，庄稼长势很好。但进入八月中旬，黄河、黑河水大涨，护河坝被冲破无数口子，遍地成了一片汪洋大海。有少许高地，庄稼虽没有被淹，但月底降霜，将禾苗冻成荒草，农民的辛苦全部白付。没有粮食吃，只好挖野菜、草根，剥树皮充饥。一天一天的草根挖完了，树皮剥光了，便开始出卖家产、土地、房屋，直至卖老婆、儿女。真是“春天风沙卷屋梁，夏季无雨土焦黄，秋风吹散妻和子，冬寒死骨雪里藏。”“先卖地，后卖场，卖了老婆再卖房，小子姑娘妈带上，留下单身寻无常、死去！”当时黑兰圪力更村就处于这样悲惨的境地。

在这荒年恶月里，有少数富人和买卖奸商，看见此时是发财的机会，于是就趁火打劫，说什么“杀不了穷汉，就发不了富

翁”，用几斗粗粮、糠皮就买去大块好地。邻村一间房子的焦××就在此时买去好地近500亩。本村拍马应事的张三毛也趁机买地300亩，成为黑兰圪力更村唯一的富户（土改时被划为地主）。

夏秋之际，从山西、关南来了些人贩子，黑兰圪力更村便成了出卖人口的市场。李有枝卖了妻子、儿女共四口，自己无家可归，冻死在雪地里。蒙古族农民云高拴，卖掉妻子、两子，自思无路可走，二尺麻绳了结了一生。云二旦、云月海两家，都是卖掉老婆，带走儿子，以后绝户。赵威才家先把姐姐卖到关南，后父、母亲，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到关南找姐姐，沿路讨吃要饭，夜宿破庙，年三十，沿街讨吃要来几斤白菜，每人只能分吃些菜叶子，结果姐姐没找着，又把妹妹卖掉，但仍不能救活一家人，不久，爹爹饿死街头，娘、哥哥只好各奔逃生。

云存厚、云葡萄、张富拴老人回忆说：民国十八年，黑兰圪力更村有43户卖了人口，共76人。造成家破人亡，断子绝孙的有16户。冻饿死亡的90多人，逃到外地的40人。三年饥荒，全村只剩下400口人。当时的惨景是：“远瞭是个村，进村少见人；没有鸡犬叫，但闻哭泣声。”

三

民国十九年（1930年），一开春就下了一场好雨，是个风调雨顺的年景。但黑兰圪力更村的人民仍在困境中挣扎。在头两年灾荒中，农民把大部分土地卖掉了，现在一无土地，二无籽种，三无牲口，为了生存，百分之九十的人只好给富人当长工、打短工。刘二娃七岁死了爹，十三岁又死了娘，生活无依无靠，只好给人家当长工，一直到20岁。安忠厚在毕克齐给地主当长工，吃的猪狗饭，干的牛马活，力气卖尽，也挣不了几个钱。一次赶着粪车翻了车，骡子被压倒，掌柜的气势汹汹打了他一个耳光，并大骂：“骡子死了，你拿命也赔不起。”

这一年，雨水调匀，可算是个丰收年。但到了秋后，粮食大都归了富人，人民的生活仍是十分困难。城里的好商进村，一石五斗粗粮换一个老白布（3丈长、1尺宽），二升粮换一盒火柴。东西再贵，为了穿衣、吃饭，也得将仅有的一些粮食拿出部分换取。第二年开春，粮价大涨，没粮的人又得借高利贷，受人剥削。

四

民国二十年（1931年）后，绥西地区掀起大种洋烟狂潮。种洋烟对于地主、资本家来说，是发财的好机会；对广大劳动人民却是引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毒根。黑兰圪力更村自从大种洋烟以来，地多的多种，地少的少种，没地的租上也要种，实在无法种的也要给别人割洋烟。这样一来，很多人便开始吸食大烟，时间一长上了瘾。特别是那些卖了老婆的光棍汉，没有其它精神寄托，只能抽口洋烟解解闷，精神一阵少一阵，结果上了烟瘾，扎下穷根。

大种洋烟，除吸食成灾外，更可怕的是引来兵匪横祸。白天官兵要，晚上土匪刁。人们劳累一天，夜晚不得安然，听见狗叫，心就直跳。当时的大股土匪有“杨白皮”、“陈庆”、“二三黑汉”等；也有小股匪徒，十分猖狂，搅得人心不安，破坏了生产。本村的安楞憨、安楞丑被土匪抓住逼要大烟，被活活打死。

土匪前边走，官兵后边来。一进村，杀猪宰羊，吃饱喝足后，逼要大烟和摊派下的东西，拔锅，拆房，不亚于土匪的凶狠。王才小一家，先被土匪抢劫一空，后被官兵逼着拆房，闹得无家可归。当时人们说：“种洋烟惹祸成灾，兵匪扰无辜丧命。”

五

日寇侵占中国后，土默川也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日伪警察、特务、汉奸成天如狼似虎地进村敲诈勒索。不是抓劳工，就是要大烟，各种苛捐杂税逼得人们喘不过气来。无数农民被抓去修炮楼、筑城墙，从事繁重的劳动。就连外出讨吃，没有“良民证”也不得通过。那些伪军、汉奸，白天进村借口催要粮食、草料，逐户搜查，抢劫、奸淫、拷打无所不为。一次，一股不知名的匪徒在半夜进村，刘二旦一家外出躲藏，匪徒们把财物抢劫一空，放火把房屋烧成灰烬，致使刘二旦一家无家可归。

1945年秋天，日本投降，鬼子退走了，人们以为能过几天安然的日子里，哪知又来了国民党反动派。真可谓“送走了瘟神又来了恶煞”。1946年到1947年的两年间，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抓差、抓兵、加税、抢粮，加上土匪骚扰，害得人们家家土炕无席，户户少吃没穿。如社长生被抓去当壮丁，杳无音讯；张兵小被捆去当兵一去不还，丧身异乡，祖父被活活气死；吴成娃因交不起公粮，被乡兵常三娃抓去，活活打死；赵银蛇被土匪捉住逼要大烟把左手砍掉，造成终身残废；刘二旦为躲避土匪藏在柜子里，差点儿被闷死；他老婆由于月子里受惊吓，得了痲病死去。

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驱散乌云见太阳，黑兰圪力更村的人民才从苦难的时代熬了过来。从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黑兰圪力更村人民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

民间社火——皇杠

李振富

皇杠是托克托县独有的一种民间社火。它起源于明末清初，据传说这种社火的形成是根据隋唐时期程咬金、尤俊达劫皇杠为题材而设想的一种民间社火。最初它的活动不是在每年的元宵节，而是在每年阴历五月十三。因而在活动时间上大致跟小说上描写的劫皇杠时间差不多。

皇杠的形状是上面一个庙宇顶子，当中是脊瓦，两旁是一对兽头；下面是一个箱子，中间用四根支柱支着。箱内是金银财宝，用封条封着，然后由两个人用一根杠子抬着走一些场子。

皇杠在表演上最初不是单一的表演，而是随着抬阁一起出场的，即抬阁在前，皇杠在后。皇杠最前面是一个抗旗的人，手拿一面大锣就走就敲，俗称鸣锣开道；紧接着是全付銮驾，即金瓜、钺斧、朝天灯、龙凤伞，四个龙头含珠穗；其次是十二付皇杠，一付比一付大，前面最大的称头杠，后面最小的称末杠。有一个骑独轮杠的跟在后面手拿大刀是押皇杠的，最后是一个人抗着一面大纛旗，后面跟着八面墩子鼓、四付铙、四付钹。由于当时的街道狭窄，因此表演多用于一路形式，有时一路变两路穿插走一些场子。走什么场子，如何表演，都由押杠人指挥。

皇杠的表演没有唱词，只有即兴的喊叫声。这些喊叫声多系一些下流的骂人词。据传说，这些人是代表当时的牲口馱的，因此尽喊些低极下流的词句。在民国初年，有一位县太爷带着夫人、小姐上街观看，叫抬皇杠的人骂了，这就激怒了县太爷，将这些人全都带到衙内审问，后由地方上的绅士等人出面讲清原由，说抬

皇杠的人是代表着牲口，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皇杠的服装分押杠者和抬杠者两种。押杠的人头戴凉帽，上面有红穗子，金脸，上身穿黄马褂，下身穿一条紫红色裤子，手拿一把大刀，由两个人用一根木杠抬着，表示骑马。抬皇杠的人多为十四、五岁的小孩，头戴紫红色小丑帽，上身穿黄马褂，下身穿紫红色的彩裤，红鞋，脸上化装成小丑，手拿一把小扇，脚腕上系一小串铜铃，走起路来有叮当的响声。

皇杠的鼓点分两部分。一部分叫皇杠鼓，走在皇杠的前面，用一面大鼓，一个手锣，一付铙，一付钹敲着鼓点；一部分叫墩子鼓，用八面中号鼓，由八个人各持一面打，四付铙，四付钹敲着。其鼓的打法与皇杠鼓不同。

民国初年，随着抬阁的消失，皇杠才改变了活动日期，由五月十三改为正月十五元宵节随同其它社火一起活动。

解放后的皇杠就比较简单了。它没有鸣锣开道的大锣，没有皇帝出门的全付銮驾，也没有了大纛旗。后面的墩子鼓、铙、钹也减成了两面鼓，一付铙，一付钹。衣服也比较简单，押皇杠人的衣服基本没变，抬皇杠的人上身改穿浅灰色的小褂，道袍领，手中的小扇，脚腕上的铃当，红鞋都没有了。原先下流的词句后改成了新式的口号。近二、三年，又将皇杠的形状也改变了，取消了原来的庙顶，改变成国徽、红旗等，失掉了原意。今年又恢复了原样。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六辑

作者 =

页数 = 179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